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屠格涅夫小說《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研究



研 究 生：黃 淑 胖

指 導 教 授：李 明 濱 教 授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屠格涅夫小說《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研究

研究生：黃淑彤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李明濱

鄭定國

陳章錫

指導教授：李明濱

所 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 論文提要

本論文分爲五章：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屠格涅夫創作《貴族之家》的思想淵源和根據

第三章：《貴族之家》主角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

第四章：《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在多餘人形象的地位

第五章：結論

本論文以《貴族之家》中人物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體現爲論述主題，探究形成多餘人的因素及性格上特點，旁及俄國多餘人形象系列文學作品，以確立《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地位。

第一章：敘述研究動機、目的及方法，研究範圍與內容，並對前人相關研究之論著作一回顧，建立小說《貴族之家》的初步脈絡。

第二章：說明屠格涅夫創作《貴族之家》的淵源，從作家生長背景爲主調，分析小說主要受其生長經驗中家庭、教育及感情生活影響，加上社會文化風氣轉變、寫作經驗累積而成。

第三章：詳細分析《貴族之家》中多餘人形象的展現，主要以小說的肖像描寫、主角性格展現、個人理想追尋及愛情中的表現來加以剖析，探究多餘人在文學中呈現的樣貌。

第四章：《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在多餘人形象中的地位，藉由與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一系列多餘人形象：奧涅金、畢巧林、羅亭及奧勃洛摩夫比較，確立拉夫列茨基在多餘人文學典型中承上啓下地位，並略述其對國外文學的影響。

第五章：總結前四章研究，多餘人是俄國文學中特有的文學形象，《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是多餘人系列的轉捩點，直至今日，多餘人仍具時代意義。

# 屠格涅夫小說《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3
一、多餘人的定義	3
二、研究範圍與內容	4
第三節 文獻的回顧	5
一、俄國的研究歷史與現況	5
二、中國翻譯屠格涅夫作品的歷史與現況	7
三、中國對《貴族之家》的評論與研究	13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方法	15
一、研究步驟	
二、研究方法	
第二章 屠格涅夫創作《貴族之家》的思想淵源和根據	18
第一節 生長經驗的影響	18
一、具人道關懷的性格	18
二、家庭成長環境影響	20
三、教育過程的薰陶	23
四、感情生活的歷練	26
第二節 社會的變革	29
一、西方文化的影響	30
二、俄國當代寫作風氣的轉變	34
第三節 創作經驗的積累	39
一、早期創作《獵人筆記》的啟發	40
二、中期創作多餘人系列短篇作品的經驗	43
三、晚期創作長篇小說《羅亭》的經驗	46
第四節 《貴族之家》成書的經過	49
第三章 《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	53
第一節 形成拉夫列茨基「多餘人」之因素	53
一、西方文化與俄國文化衝突	54

二、先進意識與階級地位衝突-----	56
三、歷史使命與現實環境-----	59
第二節 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體現-----	60
一、描寫拉夫列茨基的肖像-----	61
二、在性格表現方面-----	66
三、在個人理想的追尋方面-----	70
四、在愛情的追求方面-----	75
第三節 與小說中其他人物比較-----	84
一、果斷堅定的麗莎映襯懦弱逃避的拉夫列茨基-----	85
二、勇於追求的瓦爾瓦拉映襯畏縮怯弱的拉夫列茨基-----	88
三、急功近利的潘申映襯一事無成的拉夫列茨基-----	89
四、追求理想的米哈列維奇映襯言多行少的拉夫列茨基-----	92
五、一生潦倒的萊姆映襯一事無成的拉夫列茨基-----	94
<b>第四章 《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在多餘人形象的地位-----</b>	<b>96</b>
第一節 繼承奧涅金《葉甫蓋尼·奧涅金》自我覺醒的精神-----	97
一、厭惡人生的第一代多餘人形象——葉甫蓋尼·奧涅金-----	97
二、繼承自我覺醒的精神-----	99
三、超越冷漠的愛情態度-----	102
四、超越憤世嫉俗的自私心態-----	103
第二節 摒棄《當代英雄》畢巧林玩世不恭心態-----	105
一、孤憤淒涼的第二代多餘人形象——《當代英雄》畢巧林-----	
二、承繼厭棄功名的情操-----	108
三、揚棄損人利己的行徑-----	110
四、超越愛情的責任感-----	113
第三節 超越屠格涅夫《羅亭》以言代行的空想-----	114
一、為俄國革命搖旗吶喊的第三代多餘人——羅亭-----	115
二、對社會事業的滿腔熱情-----	117
三、超越愛情的怯弱-----	120
第四節 開啓萎靡不振的奧勃洛摩夫-----	122
一、萎靡不振的第五代多餘人——奧勃洛摩夫-----	122
二、延續拉夫列茨基善良本性-----	123
三、多餘人形象的悲歌-----	124

第五章 結論-----	127
附錄：屠格涅夫大事年表-----	132
參考書目-----	140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處於新舊文化交替的過渡時期。自十八世紀彼得大帝改革以來，西方近代文化如潮水般湧入俄羅斯，使民族文化注入新血液。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入侵俄國，促進俄國民族意識迅速覺醒，古典文化與西方相互激盪驚醒了具危機意識的貴族知識份子<sup>1</sup>。加上一八二五年發生反對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統治的十二月黨人武裝起義失敗後，俄國進入最黑暗的時期。激發出人民的反抗意識，使十九世紀俄國封建社會發生極大變化：農奴制面臨解體和民主思想的啓蒙、地主與農民階級矛盾、人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在社會改革需求及文學為社會影響下，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發展上現實主義逐步取代浪漫主義，成為文學界主流，擴展了俄國文學為國家前途、為人民自由與幸福奮鬥的傳統。而社會發展決定著俄羅斯具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擔負著最艱鉅的任務，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界出現許多第一流的名家名作，大放異彩，俄國文學一下子由「侏儒」變成了「巨人」<sup>2</sup>，正如高爾基所說：「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那樣不到百年間出現過那麼多燦若群星的偉大名字。」<sup>3</sup>這些作家的優秀作品反映俄國社會生活的發展狀況和人民的理想，也對全世界各國文學產生深遠影響。

文學與時代密切關聯，這是俄羅斯文學的優良傳統，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把這一傳統推向高峰。列寧在《俄國工人過去的出版事業》指出俄國解放運動的三個階段：（一）貴族革命階段，約自 1825 至 1861 年；（二）平民知識份子或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約自 1861 至 1895 年；（三）無產階級革命階段，約自 1895 至 1914 年。<sup>4</sup>十九世紀前半葉的俄羅斯，以其突出鮮明的藝術形式，

---

<sup>1</sup> 俄國知識份子不僅是指這個群體佔有的知識含量、受教育的程度、行為舉止的規範等綜合文化修養都達到相當的水平，而且主要指他們高度的道德水準和人文精神，即：對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對人民的責任感。（賈淑芬：〈俄國十九世紀的知識份子與人民解放運動——論屠格涅夫和他小說的主人公〉，《遼寧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02 年 7 月。）

<sup>2</sup> 李師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台灣：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頁 3。

<sup>3</sup> 轉錄自馬家駿：《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 2 月，頁 1。

<sup>4</sup> 王曉春：〈殘酷時代裡的悲劇——評俄羅斯文學中的四代“多餘人”〉，《外國文學研究》第 10 期，1990 年，頁 83。

反映社會現實，投射出尖銳社會問題，創造獨特的典型人物形象。在貴族革命的時期，文學由普希金、果戈理、赫爾岑等人創作抨擊統治者的暴虐和貴族地主的剝削，揭發專制農奴制度正是造成社會停滯不前的罪魁禍首，也塑造一批不滿於貴族社會又找不到出路的貴族青年——多餘人。而屠格涅夫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他一面激憤抨擊專制俄國的茶毒，尋找創造未來的革命者性格形象；另一方面卻因自己多情善感、意志薄弱、浪漫的貴族知識份子性格，在作品塑造懦弱的多餘人典型。在俄羅斯文學發展史上，屠格涅夫文學地位承上啓下，前有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以《獵人筆記》，登上俄羅斯文壇，並以《多餘人日記》為名，確立「多餘人」此一貴族社會典型性格的文學地位。

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偉大成就，對世界文學影響甚鉅。屠格涅夫更是俄國作家中馳譽歐美，獲得世界聲譽和影響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受到歐洲著名作家如法國梅里美、福樓拜、莫泊桑等人的高度評價和讚賞，且擴大影響了法國文學的局外人、中國的零余人。中國和俄國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更強化俄國文學對中國的滲入，五四運動前後，思想界和文學界的先驅，深感當時的社會黑暗腐敗，充滿不平，他們吶喊、反抗，並力圖喚醒千百萬陷入水深火熱及愚昧落後境地的人民，奮起抗爭。魯迅在青年時代，就知道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心酸、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燃起希望，和六十年代作品一同感到悲哀。<sup>5</sup>無奈政治的變遷，國家分化，立場的歧異，加深文學間的隔閡，在台灣的學術領域中，向以英、美等西方文學研究為主，俄國文學卻成遺珠之憾。筆者有幸在進入南華大學後，在指導教授李明濱老師指導下，能認識俄國文學的浩瀚，且深受感動激起進一步研究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典型形象「多餘人」的興趣。

「多餘人」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俄國文學史上出現的一組形象系列。這組形象系列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他們不僅使俄羅斯文學的面目為之一新，而且在世界文學中把現實主義推向一個新高峰。本文旨在全面評析《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及文學地位，並從屠格涅夫其人瞭解創作淵源，與多餘人形象對俄國內外文學的影響。

一、認識多餘人——從屠格涅夫寫作《貴族之家》的個人生活背景淵源，

---

<sup>5</sup> 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頁2。



了解小說的成書過程。再對《貴族之家》主人公多餘人性格有清楚認識，瞭解多餘人存在俄國的社會因素，從小說中主人公在性格、事業及愛情方面分析其多餘人的樣貌，並與其他小說中人物的比較凸顯多餘人的多樣性。

二、建立一個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典型「多餘人」的系列——以屠格涅夫小說《貴族之家》主人公「多餘人」形象為主軸，建立俄國多餘人代表作品的系列，確定小說主人公在多餘人文學形象中的地位，能進一步增進對一個文學典型的理解。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 一、多餘人的定義

「多餘人」誕生於十九世紀前半期的俄國，當時西歐各先進國家，已進入資本主義的時代，而俄國封建農奴制內部，新的資本主義關係已經萌芽，同時農民暴動風起雲湧，農奴制度的崩潰在所難免，專制政體的危機已漸露端倪。正是在俄國當時獨特的社會歷史環境才產生這樣矛盾複雜的性情的「多餘人」，為俄國社會生活、社會心理描繪出十分豐富的藝術形象系列。「多餘人」一詞最初見於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多餘人日記》。赫爾岑首先在《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一文中借用「多餘人」一詞來評價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sup>6</sup>。此後，俄國文學界和評論界便不約而同地開始使用這個名詞來評價與奧涅金近似的貴族知識份子形象，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賦予它更加豐富、深刻的內涵，準確簡明地概括俄國文學史上這一特有的文學現象，成為一個專有名詞。

赫爾岑給多餘人下定義時說：「在這個奴性的世界和卑鄙的野心的世界中感覺不到任何熱烈的興趣，然而他們註定生活在這個社會裡，因為人民和他們距離日遠，他們和人民也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他們「永遠不會站在政府方面」，同時也「永遠不能夠站到人民方面」。這種人民與沙皇政府都不需要的人，自然

<sup>6</sup> 參見郭秀媛：〈再論多餘人〉，《河北大學學報》第25卷第5期，2000年10月，頁107。

成爲社會的「多餘人」。<sup>7</sup>他們接受過西歐啓蒙思想，是「社會意識覺醒」的先驅。貴族階級的教育和生活條件使他們不可能成爲有理想、有行動、富有朝氣的積極份子。這些貴族階級的年輕人，他們年輕、強壯、聰慧、博學，本該幹出一番轟轟烈烈、造福於人類的事業，但是俄國沙皇的專制統治不允許他們去從事這種造福於人類的事業的。生活在農奴制度死氣沈沈的年代，看不到前進的目標，找不到出路，無所事事，尤其是在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在俄國貴族中流傳著的社會病——憂鬱、苦悶、空虛、怠惰。赫爾岑在日記裡曾對多餘人的心理差異進行過解釋：「慣於實際生活的人能夠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後結局。自我反省和空談理論的人卻不想越過他們自己所指定的邊界，而永遠停在那裡，他們在崇高的意向、絕對的真誠和才幹的條件下，阻礙事件前進，因爲山巔險峻會撞傷他們，像吉倫特派<sup>8</sup>之被摧毀一樣。<sup>9</sup>」他們性格是矛盾的、複雜的，是俄國文學史上獨特的文學現象，作家不僅勾勒出他們的外貌，而且準確地傳達出他們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即便在今日「多餘人」依然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 二、研究範圍與內容

多餘人形象的出現，是世界文學史上特有的，也是俄國社會生活的必然反映和現實主義潮流迅猛發展的結果。他們在精神上擺脫不了極度的空虛和苦悶，這種心情反映他們所生活的令人窒息的社會和具有自由思想的貴族青年絕望的心情。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文學類型首先由普希金名作《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塑造的奧涅金形象得到創立，由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畢巧林形象繼承下來，屠格涅夫塑造《羅亭》中的主人公羅亭及《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成爲「多餘人」形象塑造上的集大成者，奏出貴族多餘人的的輓歌，至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只剩下倒臥不起的寄生性，說明俄國貴族的衰敗與農奴制的瓦解。在一系列描寫多餘人作品中，要瞭解十

---

<sup>7</sup> 陳夢：〈新舊文化交替的悲劇典型——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惠州學院學報》第22卷第5期，2002年10月，頁85。

<sup>8</sup> 吉倫特派：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個反動派別，後被強大的革命力量所摧毀。

<sup>9</sup> 普斯托沃依特著 韓凌譯：《屠格涅夫評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62。

九世紀俄國文學中多餘人形象的特點與表現，當屬屠格涅夫的作品《貴族之家》，其具有承先啓後作用。

本文以屠格涅夫作品中代表多餘人形象的作品《貴族之家》為研究主題，闡述屠格涅夫創作小說的淵源，就主人公多餘人的形象，對照小說中其他人物的性格表現，來凸顯多餘人之典型性格。並由十九世紀俄國多餘人代表人物：從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裡的主人公奧涅金、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的主人公羅亭，到末代多餘人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藉以探討《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在俄國文學形象「多餘人」中的承上啓下地位。

### 第三節 文獻的回顧

#### 一、俄國的研究歷史與現況

赫爾岑稱屠格涅夫為「俄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對於屠格涅夫作品等相關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在蘇聯科學院高爾基文學研究所的學術討論會上，院士赫拉普欽刻在開幕致詞上指出：「屠格涅夫的文學創作具有極大的生命力。他的創作中的深刻人性對現代作家最有吸引力。」蘇聯文學界在屠格涅夫研究方面的成果是顯著的。以下分成四部分來瞭解俄國對屠格涅夫的研究概況：

##### （一）居首位的重要成果就是屠格涅夫的作品和書信全集：

蘇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組織編輯《屠格涅夫全集》，將屠格涅夫的手稿和信件作一次系統的整理。與全集同時出版的還有《屠格涅夫研究文集》和《文化遺產屠格涅夫專輯》、《屠格涅夫與奧爾洛夫斯基（目錄索引）》、《伊·謝·屠格涅夫作品目錄》這些資料為深入研究屠格涅夫者提供完善資料。

##### （二）關於屠格涅夫與俄國文學關係的論著：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出版幾部關於屠格涅夫與俄國文學的著

作。維尼柯娃《屠格涅夫與俄國》（一九七七年）一書以屠格涅夫生平和創作道路為基本線索，突出屠格涅夫與俄國這一主題，闡明作家對國家的愛國心與密不可分的關係。納扎羅夫的《屠格涅夫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文學》（一九七九年）論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及二十世紀頭十幾年俄國作家的作品中，對屠格涅夫作品的承繼與發展。庫爾良茨卡婭《伊·謝·屠格涅夫與俄國文學》（一九八〇年）一書中以比較研究法深入探討屠格涅夫與果戈理、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相互關係，論述屠格涅夫的創作風格，並指出「屠格涅夫的藝術思維方法是沿著普希金的方向發展的。所以人們稱他為『具有詩人氣質的散文家』」。庫爾茨克師範學院論文集《伊·謝·屠格涅夫與俄國文學》（一九八二年）探討屠格涅夫的創作方法和世界觀等問題。

### （三）探討屠格涅夫不同創作階段短、中、長篇小說體裁：

巴丘托《長篇小說家屠格涅夫》（一九七二年）在書中分析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的社會政治內容、美學觀點，揭示作家長篇小說體裁的特色。馬爾科維奇所寫的《伊·謝·屠格涅夫和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國現實主義長篇小說》（一九八二年）分析屠格涅夫的前四部長篇小說，探討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二年作家小說藝術體系的演變過程及寫作的藝術手法。另一著作《屠格涅夫長篇小說中的人》運用類型法對屠格涅夫創作進行研究，根據社會地位、心理狀態、文化教養，把屠格涅夫長篇小說中的人物分成幾個類型進行研究。穆拉托夫在《1867 至 1871 年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說》（一九八〇年）中透過分析《草原上的李爾王》等作品的民族性格與見解，論證屠格涅夫和文化歷史學派擁護者（泰納）有近似之處。

### （四）研究屠格涅夫創作的藝術技巧和寫作手法：

屠格涅夫的藝術寶庫極為豐富，探索它的奧秘是最近俄國文學史家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沙塔洛夫的《伊·謝·屠格涅夫的藝術世界》（一九七九年）著重從時代與性格、人物描寫與心理分析等方面探究屠格涅夫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藝術。<sup>10</sup>普斯托沃伊特的《伊·謝·屠格涅夫是語言文學大師》（一九八〇年）。這部分的研究仍有擴展空間，應包含作品的風格和語言問題，作家在創

<sup>10</sup> 以上據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5期，1983年，頁87。

作形象時所用詞彙功能、使用俄語熟語和外語熟語的特點、某些語言手段的審美作用。<sup>11</sup>

## 二、中國翻譯屠格涅夫作品的歷史與現況

俄國文學對中國近代文學界的影響由來已久，從清末流入中國的一批俄國政治小說開始，至二十世紀五四新文學運動，因對新文化的強烈渴求和俄國革命成功給予中國信心，形成一股「俄羅斯文學熱」<sup>12</sup>。何以俄國文學深受中國知識界的重視呢？梁啟超曾對中國和俄國在國情上作過比較研究，指出這兩個國家在疆域國土、民族性格、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類似。並明確提出應當「鑒俄」的主張：「中國與俄國相類似之點頗多。其國土之廣漠也相類。其人民堅苦也相類。其君權之宏大而積久也相類。故今日為中國謀。莫善於鑒俄。」<sup>13</sup>

因對於俄國文學有進一步的認識，俄國文學史上重要作家的一些作品陸續有了中譯本。其中，譯得最全、出版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屠格涅夫作品從主題、人物性格、藝術風格等方面深刻影響中國作家。以下將從五四新文學運動為起點，依序介紹中國文學界對屠格涅夫的研究概況。

### （一）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前

在一九一五年，屠格涅夫的作品即開始進入中國，劉半農是屠格涅夫散文詩的最早譯介者。《中華小說界》第二卷第七期中發表劉半農用文言文翻譯的《杜瑾納夫之名著》——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詩：《乞食之兄》（《乞丐》）、《地吞胡我之妻》（《瑪莎》）、《可畏哉愚夫》（《愚人》）、《嫠婦與菜汁》（《菜湯》）。<sup>14</sup>同年，《青年雜誌》連載陳嘏用文言文翻譯的中篇小說《春潮》，在前言對屠格涅夫的生平及作品的藝術特色作進一步介紹，在當時引起不少青年的共鳴。到一九一七年，周瘦鵑翻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在下卷的「俄羅斯之部」選譯屠

<sup>11</sup> 以上據普斯托沃伊特著 江文琦譯：〈現階段屠格涅夫作品的研究〉，《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報》第6期，1983年，頁80。

<sup>12</sup> 張淑伶：《魯迅小說受俄國文學影響研究》，淡大俄羅斯研究所 90年6月，頁49。

<sup>13</sup> 梁啟超：《飲冰室叢著》第十一種，合訂本，頁140。

<sup>14</sup> 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頁4。

屠格涅夫作品《死》中對屠格涅夫生平作詳細介紹，並談到他最有名的六部長篇小說。這三位作家是我國最早翻譯介紹屠格涅夫作品的人，也是屠格涅夫作品在中國文學中出現之始。<sup>15</sup>

這個階段，人們還是在泛泛地簡略介紹屠格涅夫的生平和主要作品篇目，對他的藝術風格已有初步感受和認識。

## （二）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和二十年代

「五四」以後，寫知識份子，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愛情生活，是小說的一般傾向，這一主題和反封建鬥爭有密切關係。而屠格涅夫寫知識份子題材的小說愛情佔有重要的篇章，而愛情往往成了檢驗主人公性格的試金石，因此他的《春潮》《初戀》《貴族之家》較早譯介到中國來。<sup>16</sup>到了五四時期和二十年代，屠格涅夫評介和研究進入一新階段，出現空前的熱潮。阿英指出，「五四時期，譯印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著作。」<sup>17</sup>

一九一九年，田漢在《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對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給予極高評介，認為《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是「通俄國文學史之各時代無及之者」。且最早指出他藝術才能的特點：「屠格涅夫之天才特色即對於社會大氣之動搖一種敏銳之感覺，其作物對於時代思想時代精神，如鏡之映物」。田漢對屠格涅夫作品的評介，標誌著這種評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五四時期和二十年代。他的評介已明顯地偏重於屠格涅夫作品的社會性和現實意義，這與五四以前對屠格涅夫作品的評論有明顯的區別。<sup>18</sup>

一九二〇年，沈雁冰在一系列文章裡都談到或論述到屠格涅夫。他不僅把屠格涅夫看做是一位富於人民性、人道性的作家，且把他看做是一位「詩才」，一位藝術才能「過人的藝術家」。同年，胡愈之撰寫《都介涅夫》一文，這是中國人撰寫的第一篇專論性的系統的評介文章。這篇文章較早且相當細緻、比較完整地介紹屠格涅夫的生平、著作、創作特色和文藝思想，對擴大屠格涅夫在中國的名聲和影響，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九二一年，沈穎翻譯長篇小說《前夜》出版，該書是屠格涅夫長篇小說

<sup>15</sup> 戈寶權：〈屠格涅夫和中國文學〉，《屠格涅夫論》，遼寧：人民出版社，頁1—5。

<sup>16</sup> 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頁12。

<sup>17</sup> 朱金順：〈巴金和屠格涅夫〉，《社會科學》第6期，1981年，頁91。

<sup>18</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頁101。

的第一本中譯本。耿濟之在該書的序文中指出：「我們介紹俄國文學也最注意於他這六篇著作，主意將他們次第翻譯成中文」，他希望這些書對中國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俄國社會因著這六種書而變更一部份的思想，希望中國社會也能因為這種書而變更其平時陳腐虛偽的思想！」

一九二二年，耿濟之的論文《獵人日記研究》發表於《小說月報》。這是當時評論界研究屠格涅夫作品的第一篇論文，他說：「我在俄國諸大文學家中最愛讀屠格涅夫的作品。因為他的作品能在高超的藝術內曲折傳出社會的呼聲，反映時代的精神。」同年三月，謝六逸《屠格涅夫傳略》，較早全面介紹了屠格涅夫作品的概貌（短篇、中篇、長篇、散文詩、論文）及其創作個性、藝術成就，對人們較系統、較全面地瞭解屠格涅夫的創作很適時、很有裨益。<sup>19</sup>

郭沫若於一九二四年翻譯屠格涅夫的《新時代》（即《處女地》），書中的生活、思想和主人公都使他感到親切。使他感興趣的是「這書裡面流動著的社會革命思潮」。他翻譯《處女地》就是要喚起中國民眾的覺醒，要中國青年從俄國民粹派革命家「到民間」去的運動的失敗中吸取教訓，振奮精神，開展新的中國的民眾運動。一九二八年，魯迅在發表郁達夫翻譯的屠格涅夫論文《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時指出：這一篇「是極有名的，我們可以看見他怎樣地觀察人生」。<sup>20</sup>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黃源編的《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一書，是中國評介者自己編寫的比較全面介紹屠格涅夫生平及作品的第一本著作。該書附錄中的三個項目——「年譜」中譯之屠格涅夫作品——附末有中譯之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研究書目」——亦很重要，對總結和推動屠格涅夫作品的譯介頗有意義。<sup>21</sup>

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屠格涅夫的長篇和中短篇作品大量地被翻譯成中文，其中包括趙景深和陸蠡先後翻譯的《羅亭》，樊仲云翻譯的《煙》，席滌塵、高湑翻譯的《貴族之家》（譯名為《一個虔誠的姑娘》）。在二十年代，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已陸續譯成中文，不少作家為介紹屠格涅夫做出貢獻，但譯本尚不夠完善。這個時期對屠格涅夫作品的評介、研究，極為活躍，出現了

<sup>19</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頁101--106。

<sup>20</sup> 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頁4。

<sup>21</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頁115。

「屠格涅夫熱」。人們爭相翻譯、出版屠格涅夫作品。這個時期對他的研究大都是以譯序的形式進行的，專題研究論文很少。人們大都著眼於中國現實的需要（文學的與社會的），既能注意到屠格涅夫作品的思想性，又能注意到藝術性。尤其對他的藝術才能，更是表現出極大興趣，並給以極高評價，認為在藝術描寫的手腕上，屠格涅夫要比托爾斯泰高，並且還不像托爾斯泰等人那樣偏重主義的宣傳。<sup>22</sup>

### （三）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屠格涅夫作品的研究進入一個比較深入、平穩的階段。

一九三〇年，鍾兆麟的論文《什麼叫做虛無主義》，這是比較完整地論述屠格涅夫《父與子》中主人公巴札羅夫的虛無主義思想的第一篇論文。胡適的論文《宿命論者的屠格涅夫》，作者對屠格涅夫作品中普遍存在著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基因——他的宿命論哲學思想——作了探討。

一九三三年是屠格涅夫逝世五十週年，中國的幾家文藝雜誌分別為此而設立紀念特輯或專欄，發表各種型的文章或圖片，來紀念這位深受中國人民愛戴的俄國作家。郁達夫為紀念屠格涅夫逝世五十週年，寫了兩篇文章：《屠格涅夫的臨終》和《屠格涅夫的〈羅亭〉問世以前》在前一篇文章裡，作者以簡短的文字介紹屠氏臨終時的痛苦情況；在後一篇文章裡，作者談到自己與屠格涅夫在情感上的共鳴及所受到的深刻影響。沈端先在《屠格涅夫》一文中，對屠格涅夫的階級侷限性作了較多的論述。他認為，在那群「有教養的自覺了的貴族青年」裡，「最能代表這個時代和他的階級的特徵，最顯明地不會逾越——同時也是不會逾越他的階級本質所規定思慮和行動範疇的一個」，就是屠格涅夫。劉石克在《屠格涅夫及其著作》一文中，對屠格涅夫精神上的兩重性及其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作了分析，同時指出他的主要作品與他的精神情緒之間的內在聯繫。

這個時期，專題論文開始陸續增多。這標誌著屠格涅夫研究在深入、專門、具體，帶有較濃厚的學術性。不少論文已經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和很強的分析力，對屠氏作品的藝術品味和領悟也較前一時期更為精細。<sup>23</sup>

<sup>22</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頁 115。

<sup>23</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年，頁 116—126。



#### （四）四十年代

四十年代，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屠格涅夫的六部長篇小說合編為《屠格涅夫選集》出版，對讀者領略這位作家的的小說藝術提供一個出色的譯本。巴金是我國屠格涅夫作品著名的譯介者。系統翻譯屠格涅夫的作品到中國來，則是巴金的功績，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藝文叢書裡，有一套屠格涅夫選集，把重要作品重新翻譯出來。巴金翻譯屠格涅夫的作品，是從一九三五年開始的。一九四三年，譯了《父與子》，同年十一月，譯了《處女地》，一九四五年，譯完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一九四九年，譯了中篇《蒲寧與巴布林》，一九五二年又譯中篇《木木》，除了翻譯出版這五本小說和散文詩。巴金的夫人蕭珊，她在巴金的支持和幫助下，翻譯出版《初戀》、《阿細霞》和《奇怪的故事》。後來又譯出《僻靜的角落》《雅科夫·巴生科夫》、《草原上的李耳王》，並修訂了《初戀》和《阿霞》，加入巴金翻譯的《普寧與巴布林》和《木木》，輯為《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於一九五八年出版。對於屠格涅夫作品在中國的傳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sup>24</sup>

#### （五）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期

一九七三年，巴金根據俄文原版重譯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在一九七八年《《父與子》新版後記》中，他寫了重讀這部小說的新感受：「……舊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發展，要壯大；舊的要讓位給新的，進步的要趕走落後的——這是無可改變的真理……重讀屠格涅夫的這部小說，我感到精神振奮，我對這個真理的信仰加強了。」屠格涅夫揭露俄國黑暗的現實，鞭撻封建制的罪惡，嚮往光明的未來，以及對祖國的熱愛，是引起巴金共鳴的基礎。<sup>25</sup>

一九八一年黃偉經從俄文翻譯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八十二篇，這是屠格涅夫散文詩第一個完整的中譯本。一九九四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屠格涅夫全集》，內容集合眾多俄羅斯文學翻譯的作家作品，為讀者了認識屠格涅夫創作提供極有參考價值的譯文。<sup>26</sup>

<sup>24</sup> 朱金順：〈巴金和屠格涅夫〉，《社會科學》第6期，1981年，頁91。

<sup>25</sup> 以上據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頁8。

<sup>26</sup> 黑龍江大學俄語言文學研究中心編：《俄語語言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431。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國舉辦紀念屠格涅夫逝世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這是我國首次專以屠氏及其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討論會。學術論文探討範圍廣泛深入，涉及以下各個方面問題：屠格涅夫和中國、屠氏的世界觀、屠氏的政治觀點、屠氏的現實主義觀點、屠氏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屠氏和他所處的時代及同時代人、屠氏作品的思想及藝術特點、屠氏各個時期及各種文體作品分析：早期的詩歌；其後的戲劇、長篇小說；晚期的浪漫主義中短篇小說等。近年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者注意到，屠格涅夫的著作在我國的傳播在外國名作家中屬於佼佼者，特別是在知識份子中受到廣泛的歡迎。<sup>27</sup>

#### （六）近十年來對屠格涅夫研究的新發展

進入八十年代對屠格涅夫研究進入更廣泛與深入境界，主要表現為幾方面：

1、全面、多角度的研究，以及新觀點的提出：既研究作品亦兼論作家思想，更加重視屠格涅夫世界觀與創作關係。如：智量《論屠格涅夫思想的兩個主要方面》，高文風的《屠格涅夫晚期的政治觀點》，朱憲生的《論屠格涅夫的現實主義特徵》及《屠格涅夫的美學思想初探》等。也開始把視線投向中短篇小說、詩歌及戲劇，對作品整體研究，較具特色是智量的《屠格涅夫散文詩評析》。另外也注重作品思想內容分析，且重視作品藝術特色探討，如：羅嶺《屠格涅夫愛情小說的悲劇特點》，李嶺的《〈貴族之家〉的美學分析》及智量《“小說家之中的小說家”——屠格涅夫小說藝術特點散論》等。

2、新的理論及研究方法的重視與運用：如盧兆泉的三篇文章《意在象外、哲理詩情——屠格涅夫六長篇的象徵》、《從格式塔看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蘊藉美》、《屠格涅夫六長篇的敘述藝術》，運用新的理論從不同角度對屠格涅夫的六部長篇小說作新的詮釋。

3、出現有影響的研究專著、論文集：一部被視為「我國屠格涅夫研究的新成就」（陳桑語）的專著——朱憲生《論屠格涅夫》：以豐富而詳實的第一手材料對屠格涅夫及其創作作全面的研究，探討屠格涅夫創作個性、現實主義特點、美學原則及分析其不同時期的創作。<sup>28</sup>

<sup>27</sup> 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頁 8—13。

<sup>28</sup> 蔡偉清：〈近十年我國關於屠格涅夫研究的新發展〉，《汕頭大學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1994 年，頁 11-16。

近年來對於屠格涅夫的研究，在翻譯文學作品上已有相當成績，使我們對他的散文、小說作品有更多認識，但在針對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主題，如：多餘人形象研究，仍多著重於探討俄國十九世紀多餘人形象形成的悲劇成因、性格特徵，及這些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多餘人對社會發展、人類進步的社會和文學意義的範疇上，尚且缺乏一個系統性的討論屠格涅夫「多餘人」作品在他創作中所扮演的轉折點角色，在俄國多餘人代表作品中文學地位，及後來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的完整脈絡分析，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研究的要點。

### 三、中國對《貴族之家》的評論與研究

瞿秋白在他撰寫的《俄國文學史》中指出，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描繪農奴解放時代的俄國社會」；反映「貴族、地主、青年等的時代情緒」。<sup>29</sup>在二十年代，瞿秋白是在中國文學評論家中，最早明確地指出屠格涅夫作品中「多餘人」的性格形象問題，<sup>30</sup>並深刻剖析這一獨特的文學形象得以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歷史背景。他指出這些多餘人身上存在的通病和弱點，從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和發展性的角度看待「多餘人」這一特定社會階段所出現的性格形象：

從屠格涅夫和龔察洛夫的小說，我們可以看得出當時俄國知識界的通病，就是所謂「多餘的人」。「多餘的人」大概都不能實踐，只會空談，其實這些人的確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的英雄。這亦是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其間的當然現象。

他們的弱點當然亦非常顯著：這一類的英雄絕對不知道現實的生活和現實的人；加入現實的生活的鬥爭，他們的能力卻不十分夠。幼時的習慣

---

<sup>29</sup> 蔡偉清：〈近十年我國關於屠格涅夫研究的新發展〉，《汕頭大學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1994 年，頁 11-16。

<sup>30</sup> 關於俄國文學中「多餘人」的性格形象問題，早在 1897 年 6 月 30 日《時務報》上發表的《論俄人性質》一文中就已談及：「夫俄人之好憑空論爭，而少忍耐之力，詩人伯是斤所夙稱也。其言云，昔有稱埃務劇尼者，本多才之士，平生好為大言，聳動人耳目，崇論宏議，衝口而出，然胃腸實行其萬一，居常蠢爾無爲了一生。是為俄人之情狀也。余未見有沈溺空理空言如俄人者也。」所謂「伯是斤」者，極為普希金；「埃務劇尼」者，即普希金詩體小說《歐根·奧涅金》中的男主人公歐根·奧涅金。這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多餘人」的文學形象。（轉引自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年，頁 108。）

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難於戰勝，——他們於是成了矛盾的人。……魯定（即羅亭）辦一樁事，拋一樁事，總不能專心致志，結果只能選一件最容易的，——為革命而死；菲獨爾（即拉夫列茨基）鼓著十二分的勇氣，一遇著愛妻的變心，便心灰志墮。……俄國文學裡向來稱這些人是「多餘的」；說他們實際上不能有益於社會。其實也有些不公平；他們的思想卻是俄國社會意識發展中的過程所不能免的：從不顧社會到思念社會；此後再有實行。<sup>31</sup>

瞿秋白對於屠格涅夫作品中「多餘人」性格形象的分析 and 評價，顯示出他深刻的眼光。

一九三七年，麗尼在《貴族之家》的譯者小引中，談到屠格涅夫作品的那種抒情主義和憂鬱，語言的成熟、洗鍊、富於詩意。他對拉夫列茨基和麗莎的形象作分析，並帶著很深的情感和精細的藝術感受力著重論述這部作品在藝術上所達到的極大成功：

不幸的婚姻，和幻滅的戀愛，詩和哀愁的調子，當然是使這小說得到最普遍的申訴的原因，然而，全體看來，以這作品本身底完美和諧，也就可以博得極大的稱讚。……以一貫的同情，家族史似的精細，平靜的流水似的場景和動作，和多一半是自傳似的實感和親切，《貴族之家》成功了一件非常的藝術傑作，在這裡，我們難得找出一個雖然極其細微的錯誤的音符，也更難發現一個極小的不必要的場面。每一個人物，……莫不出現於神奇的，藝術的光影裡；不僅這些主要的和次要的人物，就是每一個僕婢，甚至每一個動物，也都以美妙的形象在讀者底心裡留下不可磨滅的跡印。……小說中的每一段話，每一處背景，也無不精美絕倫，奇妙地增加著一般的效果，並且適宜地遵行著特定的任務。俄羅斯底風景，荒廢的地主底邸宅和莊園，沈靜的湖水，平和的夏夜，溫柔的私語和神奇的音樂，所有這些，只要和屠格涅夫底筆一經結合起來，就不知怎樣產生出來了不可思議的魅力。至於那有名的尾聲，則是除了應用音

<sup>31</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頁 106--109。

樂的術語以外，在文字中是找不出恰當的讚美的。<sup>32</sup>

現代研究俄國文學的學者孫乃修認為在屠格涅夫創作的六部長篇小說中，《貴族之家》以藝術的圓融、人生的思考、情調的哀婉、文筆的優美而佔有特殊地位。他的藝術氣質和個人性格在、這部題材和氣質十分合拍的長篇小說裡獲得極為出色的表現。<sup>33</sup>

台灣學者歐茵西教授在著述的《俄國文學史》一書中提及：《貴族之家》中的愛情問題有些不同。男主角拉浮列茨基的第一任妻子殘酷地背叛了他，是屠格涅夫作品中少數受到嚴厲批判的女性。婚姻破裂後，拉浮列茨基愛上麗莎，但與前述其他男子一樣，他太柔弱，以致於根本無力掌握新的愛情，未能建立新的生命。<sup>34</sup>

對於屠格涅夫《貴族之家》多餘人的介紹，影響到當時中國作家創作一系列和多餘人相似的「零餘者」形象。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作家們自己的出身、經歷、思想相近，創作出了一批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壇的「多餘人」典型大同小異的文學形像來。郁達夫第一個將屠格涅夫的《多餘人日記》譯為《零餘者日記》，且將「零餘者」名詞用於創作上，於是「零餘者」成為中國文學上多餘人形象的稱呼。中國二、三十年代文學史上的幾個主要「多餘人」形象是：魯迅筆下的涓生、巴金筆下的覺新、柔石筆下的肖澗秋、葉聖陶筆下的倪煥之、曹禺筆下的周萍這五位多餘人。從涓生到周萍，由於社會越來越黑暗，矛盾越來越激烈，多餘人也變得越來越寡廉鮮恥，正與俄羅斯的多餘人發展軌跡相同。<sup>35</sup>另外，郁達夫《沈淪》《南遷》《銀灰色的死》《茫茫夜》《蕩蘿行》《煙影》的主人公，以軟弱自卑、孤苦伶仃、一事無成的青年知識份子的不幸命運為寫作題材，真實揭露知識份子精神性格上的種種弱點，悲嘆自己是個「生則與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零余者」，揭示出五四時期剛覺醒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悲慘命運。作家筆下的零餘者形象雖在呈現上有差別，但本質是一樣的，

<sup>32</sup> 轉引自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頁125。見麗尼譯：《貴族之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

<sup>33</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157。

<sup>34</sup> 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台北：書林出版社，民國82年，頁150。

<sup>35</sup> 李子遲：〈淺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幾位多餘人形象〉，《湘潭大學學報》增刊，1998年，頁6。

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滲透著自己的愛憎情感與對未來的追求、願望。中國作家從俄羅斯文學中得到啓發，塑造一系列中國多餘人形象，與俄國多餘人形象大同小異，為中國文學的人物長廊更添風采。

##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方法

### 一、研究步驟

（一）文獻收集：至相關的學術機構如國家圖書館、各個學校圖書館及學術網站搜尋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屠格涅夫相關評論、《貴族之家》有關的專書、期刊論文及學術著作。請託指導教授李明濱師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及大陸各書局借閱或購買相關期刊及書籍，作為研究之參考。

（二）擬定研究大綱：本研究綱要之擬定，係以屠格涅夫《貴族之家》內容為中心，探究主角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體現，及在俄國文學史中多餘人系列作品中的地位，希望藉由本文可全面地認識拉夫列茨基此一多餘人形象的時代意義。

### 二、研究方法

屠格涅夫創作《貴族之家》反映當代社會中的典型人物，是現實主義的代表性作品。現實主義做為一種創作的原則，其主要特徵是：「藝術創作主體側重於從客體的角度來再現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式精確細膩地描寫現實；它要求作家具有清醒的審美理性，把握生活現象後面的深刻社會意蘊，力求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它同時主張人物必須再與社會環境交互作用中全面地、立體地展現自身的性格，並具有相對穩定、堅實的心理內容。」

<sup>36</sup>因此要全面分析《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須從小說的寫作背景及當代社會等現實環境著手。

（一）外在研究法：一個時期的文學，是蘊含當代社會心理和人心的感受，積澱著特定的民族精神和價值。一個人的文學理念或文學表現與他先天性格及後天的成長環境都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藉著對作者生平、思想形成的了解入手，再透過這些認知去理解作品中所呈現的主題，分析形成文學中多餘人形象的時代背景，並說明其表現技巧，甚至隱藏於其中的意涵。

（二）內在研究法：透過屠格涅夫本人的著作及各方文獻的記載，瞭解其人格、生平、婚姻愛情觀的轉變，以分析寫作拉夫列茨基此角色的意涵。

（三）彙集各方資料，運用歸納、分析、比較等方法。歸納出《貴族之家》書中主角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形成原因及特質，比較其他次要人物與主角的性格差異，以凸顯多餘人的特質。並從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多餘人形象系列作品中，分析《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所佔有的承上啓下地位。

---

<sup>36</sup> 楊春時：《文學概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288。

## 第二章 屠格涅夫創作《貴族之家》的思想淵源和根據

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年）是俄國十九世紀知識份子中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出生於俄國封建制度的貴族大地主莊園中，卻心懷人道主義，以批判的角度在作品中揭露俄國封建農奴制的弊端，塑造代表時代的文學典型，創作《貴族之家》中主人公的多餘人形象。推究其創作《貴族之家》的淵源，當從屠格涅夫成長環境塑造他關懷社會的熱情，當代社會改革風氣的引導，及作家個人累積創作經驗的助長，才能成就《貴族之家》的「多餘人」文學典型。

### 第一節 生長經驗的影響

屠格涅夫出身貴族，享受衣食無虞的地主生活，受到性格上天生多愁善感、家庭教養及教育過程中思想轉變的影響，對於社會不平等現象能敏感覺察，在作品中呈現社會真實的面貌。

#### 一、具人道關懷的性格

屠格涅夫在鄉間長大，和莊園中農民一樣從大自然中得到啓發，他熱愛自然，迷戀奇異的情境：池塘的白霧、樺樹林、遭雷劈的橡樹和鳥兒，對他而言都是興味盎然，在自然的薰陶下，他性情顯得溫文善良且酷愛自由。童年時代就表現出對浪漫情調的特殊喜愛，情感豐富、睿智過人，有敏銳的心思，善於體會人類情感，富有激情，無論是他能同情共鳴、或者他困惑或厭惡的人事物，



他都用心體會，以求了解；但另一方面卻意志薄弱、多愁善感，行事審慎、畏懼一切極端，處於危急時刻，容易畏縮逃避，無法承受激情的衝擊，常在面對澎湃情感時驟然退縮，在性格上具雙重性。他的詩人朋友形容他：「和氣而柔軟如蠟……性情似婦人……沒有性格」<sup>1</sup>。畢生容易受外在環境影響，容易順服於較強勢之人，小說《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性格上的軟弱正是作家個人性格的投射。

少年時的屠格涅夫心地善良，性格隨和，從不計較各種利益，在農民面前甚至感到內心不安。他好夢想，最喜歡讀書，對文學的迷戀已融入愛情的感覺，處在童年時期的屠格涅夫就表現出對浪漫情調的喜愛，他迷戀奇異的情境、崇高的事物、優美的格調，他渴望追求新知，對藝術敏感及對文學偏愛，嚮往自由平等，顯然與當時專制制度格格不入。

屠格涅夫是一位感情豐富、細膩又內向的青年，也是溫情、寬厚、和氣有著浪漫氣質的貴族知識份子。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和善的巨人——溫良、迷人、無限平易近人。<sup>2</sup>在他內心裡經常受著情感折磨，具關懷人的熱情，深厚人道主義精神，能體察社會的不平等，關懷下層階級的農奴，內向的個性讓他能深思，如赫爾岑在論述長篇小說時所指出俄羅斯人的精神特點：「在俄羅斯精神中有一種特徵，能夠把俄國與其他斯拉夫民族區別開來，這就是能夠不時進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過去，能夠以深刻、真誠、鐵面無私的嘲諷眼光來觀察它，有勇氣公開承認這一點，沒有那種頑固不化的惡棍的自私，也沒有為了獲得別人的諒解因而歸咎自己的偽善態度。<sup>3</sup>」但這樣的自省讓他覺察到思想和本身階級身份的矛盾，高爾基<sup>4</sup>說：「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是個極聰明

<sup>1</sup> Isaiah Berlin 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76 年，頁 343—348。

<sup>2</sup> 同上註，頁 342。

<sup>3</sup> 轉引自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9。

<sup>4</sup> 高爾基（1868-1936）俄國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主張文藝應有改造現實的社會使命，應像「報警的鐘聲」，在人的心靈中喚起恥辱、憤怒和勇氣。

的人，但是他有一顆模稜兩可的心靈，因此他常常嘲笑民主的思想和心情，而這並不妨礙他依然是深入骨髓的一個貴族。」<sup>5</sup>他譴責貴族、批判貴族，而在譴責批判的同時，又常常流露出「剪不斷，理還亂」的柔情。<sup>6</sup>造成他一方面批判貴族自由主義者軟弱自私，又對革命者的理想表示懷疑，顯現他性格中強與弱兩個方面，也反映他人道主義思想的進步性及階級侷限性。

貴族階級的不可改變的厄運使他痛苦，也令他惋惜，屠格涅夫就和他作品中的主角一樣，力圖探索出一條解救的路，但結果卻總是以失望告終。如杜勃羅留波夫所指出的：「屠格涅夫在描寫……他們的形象時，通常總是對他們懷著令人感動的同情，對他們的痛苦感到衷心的疼痛。」<sup>7</sup>屠格涅夫溫婉、充滿矛盾的人格特質，在他小說中呈現出鮮明、生動的多餘人形象，他立場上的雙重性，鮮明地體現在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形象中。「多餘人」的性格形象在屠格涅夫筆下有最豐富的刻畫，正因為他的性格與他們息息相關，正如屠格涅夫曾說：「我的傳記在我的作品裡。」<sup>8</sup>《貴族之家》中在介紹拉夫列茨基的親屬關係，幼時所受的斯巴達教育等許多方面，都帶有自傳色彩，形成他作品藝術上的一大特色。在《貴族之家》中讀者可看到主人公對莊園中農民的關心，他願意放下身段與他們交談，瞭解農民的痛苦，雖然他無力完全改變制度，但在情感上，透露出悲天憫人的情懷。而在屠格涅夫作品中所展現的優美女性形象，如《貴族之家》中的麗莎所體現的人道主義精神，正是作家人道主義理想的寄託。

## 二、家庭成長環境影響

<sup>5</sup> 見高爾基著，繆靈珠譯：《俄國文學史》，新文藝出版社，頁 307。

<sup>6</sup> 葉乃方：〈屠格涅夫的現實主義觀點〉，《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年，頁 65。

<sup>7</sup> 轉引自曹靖華主編：《俄蘇文學史》，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頁 337。

<sup>8</sup> 轉引自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頁 8。

屠格涅夫的父親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屠格涅夫是個窮軍官，終日遊手好閒，花天酒地，生活優渥卻胸無大志，他曾對兒子說他的人生哲學是：「你能怎麼玩就怎麼玩，別縮手縮腳，你是屬於你自己的。人生在世，就這麼回事。」<sup>9</sup>他對女人猛獻殷勤，對孩子卻冷若冰霜，對孩子的前途不放在心上，使孩子心靈缺乏父愛的溫暖，留在記憶裡的父親形象只有冰冷和威嚴。屠格涅夫雖羨慕父親在女人方面的成功，卻從未和他有真正的溝通，在缺乏男性形象典範可供學習的家庭中，屠格涅夫的人格形成產生缺陷，使得他在熱情的表面上常是深藏著冷漠。

母親瓦爾瓦拉·彼得羅夫娜·屠格涅娃因成長環境的影響，造成人格上不健全，情緒管理失調，可說是個殘暴的地主，以虐待家奴來發洩婚姻不美滿的情緒，她將農奴視為自己的子民，她常說：「我愛殺就殺，愛赦就赦。」並嚴厲管教孩子，常為一點小事懲罰他們。屠格涅夫曾經這樣說：「我幾乎每天都為小事挨鞭子。……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到處是耳光、拳腳和巴掌。」<sup>10</sup>他的童年沒有一點歡樂，只有孤獨和痛苦。嚴厲的母親、冷漠的父親，父母性格的古怪、任性，家庭中的暴虐與專制氣氛，讓年幼的屠格涅夫感受不到家庭溫暖，讓他深懷痛恨而又敢怒不敢言，日久天長，使少年屠格涅夫心靈蒙上一層淒慘和痛苦的陰影，這種性格上的自卑逐漸成為心靈上的悲切。對冷漠的父親及暴戾專制的母親，伊凡一生都懷著焦慮和崇拜的感情，他的身材像父親那樣魁梧，性格中卻保留了父親的柔弱天性，而母親殘忍、病態、乖戾的性格，也在屠格涅夫小說中刻畫出來，如《貴族之家》中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姑母格拉菲娜·彼得羅夫娜。

---

<sup>9</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4。

<sup>10</sup> 轉錄自法 亨利·特羅亞著，張文英譯：《世界文豪屠格涅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6。

屠格涅夫從幼年就瞭解貴族社會的種種腐朽慵懶的生活，對奴隸制的憎惡也導源於矛盾的生活環境，他說：「我很早就仇恨奴隸制和農奴制，我的仇恨是通過觀察周圍罪惡的環境產生的。」<sup>11</sup>自幼在家中目睹農奴的悲慘遭遇，農奴主的專制暴虐，激發他深深的同情心，認識到農奴制的腐朽，加深他對造成農人痛苦之源的仇視態度。他憤慨地說：「我見到的周圍的一切，幾乎都使我感到難忍、憤懣和厭惡。<sup>12</sup>」這些親身經歷和目睹的事使他心中漸萌生對罪惡的農奴制度的深惡痛絕態度和毫不妥協意志。他曾說過：「我面前的這個敵人有明確的形象，它的名字是眾所周知的，它就是農奴制。我已經收集了它的全部罪孽，決心與它鬥爭到底。我發誓永不和它妥協……這是我立下的漢尼拔<sup>13</sup>式的誓言。」<sup>14</sup>但在他身上也不乏貴族地主的習性，不能說他對貴族社會和以其為基礎的沙皇制度沒有某種眷戀情緒。

此外，莊園中農奴的孩子是他幼小的玩伴，充實童年生活，讓飽受母親壓制的他能得到一點尊嚴。加上其中有一位侍僕——農奴洛彭諾夫關愛他，教導他學習俄國文字，閱讀俄國書籍，加深他對農奴的善意。在成長的這塊土地和勞動人民們，培養出作家熱愛家鄉、熱愛人民的情感，他對溫順的忍氣吞聲的勞動者充滿同情，對壓迫農民的人充滿憤怒，對暴政充滿憎恨，為他將來創作社會寫實作品埋下種子。為實現自己改革農奴制的理想，在一八五七年，他在給托爾斯泰寫信時，曾真誠表示要率先放棄自己的貴族權利。他寫道：「以晚年全年的時間，同農民作最後的分離，即使把一切都交給他們也在所不惜，但我再不是老爺了。對這件事，我的決心十分堅定，不辦妥一切，我就不離開鄉村。」

<sup>11</sup> 轉錄自法 亨利·特羅亞著，張文英譯：《世界文豪屠格涅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6-7。

<sup>12</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8。

<sup>13</sup> 漢尼拔（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名將，他十歲時曾向父親宣誓，他將堅決抗擊敵國羅馬，終生不渝。

<sup>14</sup> 轉引自陳大夫：〈又偉大，又孱弱——從《貴族之家》看屠格涅夫世界觀的矛盾〉，《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42。

<sup>15</sup>雖然屠格涅夫將解放農奴的政策實際實行，但本質上，只要整個社會體制不改變，局部的改革或變化不過是無稽之談。

對一個人從生下來就毫無自由可言，屠格涅夫不僅生活在社會關係的範疇之中，同時也處於宇宙生活的超歷史的、永恆的自然現象的控制中。人在失去自由的同時，就連幸福和愛情也稍縱即逝，人生注定是個悲劇，一切奮鬥都是徒勞的，那麼等待著他只是死亡。從他的成長經歷來反觀《貴族之家》——整部作品篇幅並不大，作家在介紹拉夫列茨基的親屬關係、幼時受的斯巴達教育等許多方法，帶有自傳色彩，且用了整整四章（第八至第十一章）的篇幅來描寫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家譜，作家的用意在於通過對拉夫列茨基貴族世家醜惡歷史的披露，來表明貴族地主是如何逐漸背離人民，也被人民所拋棄。

### 三、教育過程的薰陶

屠格涅夫貴族的身份讓他在受教育過程中更順遂，優越的經濟地位保障最優秀的教育，國外留學吸收西歐啟蒙主義思想的營養，成為創造十九世紀燦爛文化的主力。父母為了讓他接受頂尖的貴族教育，全家遷居莫斯科。在寄宿中學及家庭教師指導下，接受當時典型俄國貴族子弟的教育：學習歷史、地理、俄語、法語、英語、繪畫等，其中西歐文化的薰陶佔極重要的地位，這些對西方語言、文化的廣泛學習，為屠格涅夫的知識累積奠定良好而堅實的基礎。但這些西化的教育內容，忽略俄國本國語文的教育，以致他父親在回覆孩子以法文或德文書寫的信時擔憂地說：「為什麼你們輕視我們自己的語言呢？……你們不

---

<sup>15</sup> 同上註。

僅要講好俄語，還要用俄文論述問題——這是一定要做到的。」<sup>16</sup>這裡，他的父親顯示出眼光。屠格涅夫後來能用流利、精美的俄文從事文學創作，與父親的叮嚀有極大相關。教育過程中，他對知識的渴望、對文學的偏愛，對自由平等及民主的嚮往，使他自然地在精神上與殘暴的專制制度格格不入，對他在創作的風格上產生深遠影響。

屠格涅夫十五歲入莫斯科大學文學系就讀，莫斯科大學這個當時被稱為思想神殿的地方成了未來作家意識覺醒、思想逐漸成熟的搖籃，使他質樸的情感漸進入理性思考階段。十九世紀初，廣大人民群眾反對農奴制壓迫的訴求在大學裡有了反映。沙皇政府千方百計加強對大學的控制，於一八三五年取消大學自治，教授要服從政府任命的督學，以控制學生思想，正如當時人們所說：「不應急於教育，使平民在他們瞭解的範圍內不致提高到國君的水平，從而不圖謀削弱國君的權力。」一語道破沙皇政府的愚民政策。<sup>17</sup>這樣的壓制不能抑制學子狂熱思潮，在三十年初的大學校園，正是各種小組傳播先進思想最劇烈的時期，年少的屠格涅夫也參加關於政治、文學和哲學的爭論聚會。這些年輕人自稱是革命者，他們研究哲學、揭露沙皇制度的腐敗和罪惡。大學這段時期，濃厚的革命氣氛和精神力量促使他思考問題，產生對哲學的興趣，大大發展屠格涅夫的民主思想。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沙皇尼古拉一世傾全力鎮壓青年知識份子的自由傾向，凡懷疑宗教法規，不敬政府，批評專制制度或提議國家改造的任何作品都在禁止之列，作為知識大本營的莫斯科大學首當其衝，不少學子因組織學術小組和秘密團體而被捕流放。雖然學校當局和專制政府勾結對思想傾向不良的學生加緊剷除，但知識本是思想啓蒙和民主的搖籃，政府的鎮壓激起一批有良知學生的憤怒、深思和迅速的覺醒。屠格涅夫在事件中雖做過一份「與

<sup>16</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 12。

<sup>17</sup>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年，頁 113。

任何秘密團體均無往來」的具結，但在心靈深處已被俄羅斯知識界的自由思潮浸潤了。

二年後，他到母親認為智慧之光的德國留學，一方面滿足自己對先進社會科學知識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因對俄國專制制度的痛惡。一八六八年，他在《回憶錄》的序文裡寫道：

……我才十九歲；我早已夢想過這次遠行了。我相信在俄國只能學到某些預備性的知識，真正的學問的源泉是在國外。……那種生活，那種環境，特別是其中的一個區域——我所隸屬的地主農奴區，簡直沒有一點使我留戀的地方。相反的，我在自己周圍看到的一切，幾乎全在我心中引起羞愧和憤怒的感情，最後還引起了憎惡。……<sup>18</sup>

在德國留學屠格涅夫加入以斯坦科維奇為首的俄羅斯青年圈子，他們聚集在一起共同學習哲學和歷史，爭論著黑格爾哲學，認為人類是歷史真正的主體，世界是朝著一個神定結局有邏輯地前進著，依此原則，反抗君主專制政權是正義的。<sup>19</sup>黑格爾強調，一切存在的事物皆有合理性；因此文學不應空言理想，而應表現事實與真實的人生。<sup>20</sup>在柏林求學的屠格涅夫是西方學者歌德、黑格爾的崇拜者，和這些青年的交往，使屠格涅夫的知識、性格和修養大受裨益。他開始超越自我，突破文化和政治諸問題，使他意識覺醒，思想逐漸成熟，讓他逐漸進入理性思考的階段。從這些富有崇高理想的俄國青年身上，看到俄國光明的未來，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sup>21</sup>對這些志向遠大的青年做這樣的描述：「大

<sup>18</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 20。

<sup>19</sup> 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台北：書林出版社，民國 82 年，頁 131。

<sup>20</sup> 法 亨利·特羅亞著，張文英譯：《世界文豪屠格涅夫》，頁 17。

<sup>21</sup>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馬克思稱之為「一個偉大的學者和批評家」。堅持和捍衛文學人民性和現實主義原則。

家對於自己的高貴的願望，都充滿著信心，對於美好的將來的到來，都充滿著希望。……這些人完全只以哲學為主，當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就夜以繼日地談論它，他們從哲學的觀點來觀察一切，解決一切。……這些青年自覺自己有責任作一個在我們國家中還沒有人知道的真理的預言者。」<sup>22</sup>開啓他對自由民主的視野，體悟到俄國封建農奴制的不平等。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屠格涅夫自然要為農民代言，他是如此愛戀俄羅斯的土地、俄羅斯的人民，儘管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他確信自己從精神到肉體都屬於這片廣袤的土地。因此，在往後的文學創作中，關懷農民及社會的內容為其寫作主調，作品充滿社會寫實性。

長期居留國外，異國文化的開放風氣，讓這位敏感的青年對自己國家越感到陰鬱、絕望，加上俄羅斯人對他身份的誤解：既不完全是俄國人，也不完全是外國人；既不是革命派，也不是保守派。而他自己清楚，在故鄉以外，只有手中握筆時，他才是俄羅斯人。這樣的矛盾情懷，讓他在創作《貴族之家》等一系列多餘人形象作品時，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在對理想的嚮往中，伴隨心靈深處對國家的悵惘與憂傷，及在實現自我和理想道路中經歷的心理危機，與社會間的隔閡和農民間的距離，正是作者自己成長的寫照，多餘人的無奈是屠格涅夫能感同身受的。

#### 四、感情生活的歷練

屠格涅夫在情感世界中，極易動感情，常主動地表示熱情，一生中的感情生活多采多姿，他自己曾在福樓拜家的晚宴上，向朋友透露：「我的生活裡不乏女人。無論是書還是別的，什麼都不能替代女人的位置。怎麼說呢？我覺得只

---

<sup>22</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 25。



有愛情才能帶來某種生命的綻放。」在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莊園避暑期間，屠格涅夫認識一位溫和秀麗、舉止清柔的女裁縫，這樁貴族少爺與平民下女之間的愛情，儘管雙方那麼濃情蜜意，但一開始即種下悲劇的基因。少爺的風流韻事傳到專制的母親耳裡，她將那位平民姑娘趕出莊園，懷著身孕的姑娘在莫斯科獨自生下一名女嬰後，即嫁給一位平民，女嬰則送到屠格涅夫的莊園。屠格涅夫始終忘不了這段愛情，每年都給她一筆生活費，直到她一八七五年去世。在屠格涅夫年少稚嫩的心靈中，在他對女性的愛戀中，帶有濃厚浪漫情調和詩意的經驗。在《貴族之家》裡，屠格涅夫在描寫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父親伊萬·彼得羅維奇和農奴姑娘相愛的故事時，深情地記述自己內心深藏的這段難忘的人生插曲。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經由朋友介紹認識了女明星歌唱家波麗娜·維亞爾多，他完全被波麗娜的歌唱天才所迷醉，和她相識是屠格涅夫情感生活中重要的事件，正如他寫給她的信中說：

在我生命的旅途中，遇到您，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的忠誠與感激之情沒有止境，只能隨我一起死去。<sup>23</sup>

實際上，屠格涅夫的夢中情人——維亞爾多並不漂亮，她以自信、性情、才華征服他，對他而言，在她身旁即使不幸，遠勝過在另一個情婦身邊的幸福。他對朋友安年科夫坦言：「她（波麗娜·維亞爾多）是我唯一愛過的、而且將永遠熱愛的女人。」<sup>24</sup>這種深摯情感，一直伴隨他走完人生的旅程。他終身期盼維亞爾多夫人深摯的愛，礙於現實無法成真，只能守候她身旁，聊解相思之情。

<sup>23</sup> 轉引自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 63。

<sup>24</sup> 引自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 63

對於其他感情插曲，面對著熱情似火的姑娘，多只是一時的心動，無法終成眷屬，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無法承受強烈的感情，僅習慣不會有任何結局的無花之果，所以終身未結婚成家。

在給巴枯寧娜的信裡，屠格涅夫經常提到崇高的、理想的、肯於自我犧牲的愛情。對於才貌雙全的女子，他常常熱情地展開才華上的進攻，那時他真是一往直前，像戰場上的拿破崙，恨不得彈指一揮間拿下堡壘；但當心愛的姑娘一旦被打動，喚起同樣的熱情時，他卻驚慌失措，亂了陣腳，在異性的大膽吐露和強烈感情面前退避三舍。對於屠格涅夫這樣一種敏感、纖細、表面上熱情洋溢，實際上含蓄蘊藉的男子，是無法承受主動積極的愛情。雖然屠格涅夫終身未娶，但他的婚姻觀帶有濃厚的貴族情調，他曾對朋友說：「我不結婚則已，要結婚只能娶一個受過貴族教育的姑娘，因為這是我一家安樂的最好保障。如果我的妻子態度粗俗，我就會成為不幸的人。婦女受了貴族教育還有一個好處：即使她們在生氣，也能保持嫺雅優美的風度，而且永遠不會用粗野輕狂的舉動使你冒火，我對這類舉動抱有一種不可克制的反感，跟這樣的女人共同生活是我不能想像的。」<sup>25</sup>由此可知，他最心愛的還是那種舉止優雅、教養良好的貴族少女，與平民姑娘的愛戀，只是年輕時的一時激情罷了！對於上流社會婦女的偏愛，在他日後的創作中的美好女性形象塑造，可看到他理想的原型。

綜觀屠格涅夫的一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位博愛而勞心者，從少女到少婦，從平民女性到貴族女性再到年輕漂亮的女農奴，他都真實地愛過。從愛情和與女性的關係上，最容易看出一個男性的感情特色和性格。屠格涅夫的情感特色、心理特點及對愛情的追求中，已顯露出他的性格和創作個性。在每一次感情的歷險都可以在他的小說中找到軌跡，歸納出他的愛情觀：肉體的愛和精神的爱是相分離的，因而他更趨於柏拉圖式的愛情；愛情的力量是神秘的；泛

---

<sup>25</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 40。

愛眾人：世上所有美好的女子都應當為他所愛。但屠格涅夫這一系列的愛情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悲劇性的令人遺憾，也許正是他憂鬱氣質形成的原因。屠格涅夫這樣的感情生活正是他的藝術生命力延續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愛比死，比死所帶來的恐怖還更強有力，因為已有愛，只因為有愛，生命才能支持住，才能進行。」<sup>26</sup>他感情的寄託對象——維亞爾多是一位不能和他有完美結局的夢中情人，他一輩子只能在別人的安樂窩中生活，共享一分愛情的幸福甜蜜感受，這樣的愛情是無奈的；而另一方面，屠格涅夫對主動示好求愛的女性帶有一份畏懼，不敢放心去愛，這種情感上的矛盾掙扎充分顯現在作品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中。在屠格涅夫筆下的愛情故事題材中：「不能實現的願望，未成功的戀愛，悲痛地過那種已經失望的生活」<sup>27</sup>正與他一生在感情上終不能開花結果的悲劇息息相關。作家終生過著獨身生活，對於戀愛中的不幸和痛苦有著深切體驗，那種由於感情幻滅而帶來的失望和悔恨，深深印刻在他心上。《貴族之家》中拉夫列茨基與麗莎真摯的愛情，理當開出美麗花朵，卻無法有情人終成眷屬，徒留遺憾，多餘人在愛情的歷練中一切成幻影，正如作者本身愛情的一事無成，也可體察屠格涅夫一生感情上的缺憾。

## 第二節 社會的變革

十九世紀初的俄國正處在封建農奴制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形成的時期。俄國的改變，深受歐洲當時進步思潮的影響，戰爭的接觸，更加速

<sup>26</sup> 張堅強：〈試論屠格涅夫的抒情小說〉，《華東船舶工業學院學報》第一卷第3期，2001年9月，頁66。

<sup>27</sup> 默語：〈優美而哀傷的歌——兼論屠格涅夫小說中的愛情主題〉，《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2期，2001年6月，頁33。

文化交流活動。有識之士覺悟到俄國的落後，紛紛以批判的角度呈現社會黑暗落後的真實面，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成爲主流。

## 一、西方文化的影響

十七世紀後期，封建制度在西歐國家已瓦解，而沙皇俄國還在極力維護和加強農奴制，使俄國生產力發展受到阻礙，農業落後、工業品靠進口，軍力薄弱、政治腐敗。至十八世紀初，沙皇彼得一世試圖打破閉關鎖國的局面，輸入歐洲文明，推廣西化運動。而後有凱薩琳二世推展啓蒙運動，建立開明君主專制，使俄羅斯在政治、社會及文學各方面，受西方文化影響加深。但凱薩琳二世在政治上爲換取達官顯貴支持，把大批土地連同農奴賜給貴族，形成封建農奴制的全盛時期，貴族與地主世代不須付出義務，又享受經濟與社會特權，導致許多政治與社會弊端。俄國從十七世紀以來都實施農奴制度，俄國的經濟全都是依靠農奴的勞動而來，農奴除了義務外完全沒有任何的權利。

農奴被強制固定在地主莊園裡，世代依附於地主，沒有人身自由，地主可以把他們買賣或轉贈。農奴從地主那裡領取一小份地，必須爲地主服勞役、耕地、割草、修築住宅等各種雜活。此外還必須向地主繳納各種實物，不服勞役者繳納代役租。<sup>28</sup>

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間 1801—1825 年）即位後，曾試圖實行改革，以適應當時的形勢，緩和社會矛盾，對內進行政治革新，放寬言論與出版自由，廣泛增設學校，推行地方自治，鼓勵地主解放農奴、禁止地主濫用權力蹂躪農奴

<sup>28</sup> 王榮堂 姜德昌：《新編世界文化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0 月，頁 86。

及公開買賣農奴；賦予貴族特權，所以一方面受貴族擁護，同時民間自由思想亦甚活潑。<sup>29</sup>但在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五四年期間，俄羅斯發生七百一十二次農奴動亂，動亂原因係因農奴聽信獲得解放謠言造成的，而一八二一年「十二月黨人」事件——俄羅斯史上知識份子第一次政治革命——也是以廢除農奴制度為政治訴求。可見得農奴制度已是俄國的封建制度下的一顆不定時炸彈，威脅著貴族的特權。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入侵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給俄國社會極大的震動，隨之西方文化大量湧入，並與俄國傳統文化發生激烈碰撞和融合，十九世紀中葉，一種兼融西方又保持俄羅斯民族特色的文化結構已經定型。探究俄國貴族接受西方進步的自由思想之因，其中拿破崙給予他們的影響最大。拿破崙戰爭將俄軍帶往柏林、巴黎及其他西歐文明世界，與西歐的思想家、作家及貴族接觸，使俄國貴族青年大開眼界。他們將俄國的文化、社會、政治與西歐相較，發現自己黑暗、閉塞、落後，遂一方面燃起吸收西方文化的慾望，另一方面有改造俄國的理想，這兩種意識匯聚成一股改革的強力，推動著社會思潮前進。

總括而言，西方近代文化與俄羅斯傳統文化的關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八世紀西方文化對俄國的輸入與俄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模仿、學習時期；第二階段是十九世紀上半期俄羅斯近代民族文化的崛起與西方文化發生劇烈撞擊與衝突的時期；第三階段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俄羅斯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匯時期。<sup>30</sup>在這歷史的演進中，處與先鋒地位的俄國貴族先進份子認識到廢除專制農奴制的必要性，發起以廢除農奴制和專制君主政體為目的的十二月黨人革命，不料起義失敗。新任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後，為防止十二月黨人革命歷

<sup>29</sup> 歐茵西：《俄國文學史》，頁 127。

<sup>30</sup> 于勝民：〈俄國多余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 4 期，1992 年，頁 25。

史重演，決心實行專制統治，以獨裁方式管理國家，限制人民言論和文學作品的內容。推行「正教、專制制度、民族性」三項基本原則，把宗教迷信、專制思想灌輸到人民頭腦中，使俄國民眾長期陷於服從命運、順從沙皇、安分守己，任憑統治者胡作非為擺佈的愚昧狀態。史家稱尼古拉一世黑暗統治的三十年（1825—1855）為「專制制度的頂點」<sup>31</sup>，他以殘暴手段統治俄國，人民累積的不滿情緒與日遽增，社會危機日顯，農奴制度成爲阻礙俄羅斯商業貿易及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由農奴制危機發展到農奴制改革已呈歷史趨勢。

在沙皇長期專制制度桎梏下，俄國人民處於蒙昧狀態，彼得堡與莫斯科的知識份子仍秘密傳播自由思想，十九世紀早期思想史中一位令人矚目的思想家恰達耶夫在《哲學書簡》中以痛心疾首的愛國主義激情，對俄國歷史和現實進行了批判，提出走西歐道路的未來社會構想，激起三四十年代思想戰線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大論戰。<sup>32</sup>經過一段時間後，這些知識份子分裂爲兩派：斯拉夫派和西歐學派，前者認爲只有在純俄羅斯的、東正教的啓示中才能找到藝術、哲學和政治的出路，應關注國家的歷史與傳統，擔心新思想的影響會改變傳統，這主張是傳統的和鄉土的；後者宣導外國的優點，認爲俄羅斯應向世界、向進步開放，與西方文明接軌，文化融爲一體。他們見解雖不相同，反對沙皇封建政府的立場則一致。沙皇專制制度對人民和知識份子的思想壓迫，遠超過西歐專制國家對人民的控制和對思想的扼殺，把俄國陷於讓人絕望的牢籠中。長期以來形成人民的麻木、愚昧、和具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的孤獨感、失落感，在這樣死氣沉沉的社會現實背景下，以社會改革爲使命的知識份子，就不能不顯得孤獨、「多餘」，造成俄國文學產生一種憂鬱的悲哀情調。

屠格涅夫生逢動盪的年代和矛盾叢生的社會，處在俄羅斯社會歷史發展的

<sup>31</sup> 李明濱：《俄羅斯文化史》，頁 76。

<sup>32</sup> 賈淑芬：〈俄國十九世紀的知識份子與人民解放運動——論屠格涅夫和他小說的主人公〉，《遼寧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02 年 7 月，頁 41。

一個關頭：棄舊圖新，學習西歐。在國外完成學業後，他幻想藉由學術活動為祖國服務，希望在大學教授哲學，但在尼古拉一世教育當局運用專制政權壓迫學術，關閉高等學校哲學研究之路後，屠格涅夫的計畫受到阻礙，於是走上文學之路。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〇年居留法國，經歷過一八四八年法國成立共和國的革命運動，俄皇尼古拉一世疾呼：「正直的公民起來反對法國大革命」，以強硬的態度要求僑居法國的俄羅斯人返回祖國。<sup>33</sup>從此事件中，他體驗到：無秩序、謊言、無謂犧牲及有秩序的屠殺是可怕的。喜歡思考、愛好和平的屠格涅夫在這樣時代動盪中，身為知識份子及貴族的雙重優勢身份下，肩負著改革社會的使命，心懷人道思想的他幻想以非暴力手段實現人類條件的改善，但傳統封建勢力不是一夕可推翻，於是他將自己的理念化為文字，在作品中呈現出時代的樣貌及社會的趨勢。

屠格涅夫的創作活動主要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時期正是革命民主主義活動經歷從發端到沒落的全部歷史過程。在一八五五年，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慘敗，沙皇在國際的擴張政策暫時收斂，國內的反應中暴露俄國專制統治的腐敗，加深民眾對沙皇的不滿，更凸顯農奴制的危機，加深他對農奴制的痛惡。沙皇懼於革命形勢，不得不於 1861 年宣布自上而下地實行農奴制改革，簽署農奴解放命令，但實質上農人的利益遭受雙重剝削，造成各階級間激烈的思想角力戰，在文學上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更活躍。在寫作《貴族之家》的時期，俄國本以危機四伏的農奴制，經過克里米亞的戰敗後更加風雨飄搖，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虛弱。文學是歷史的紀錄者，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不論是描寫人物、事件或自然現象，都是源於社會生活，作品呈現的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是人生的反映，它的偉大價值就在於通人類感情之郵。」<sup>34</sup>在這歷史

<sup>33</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 63。

<sup>34</sup> 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年，頁 2。

轉折點時候，屠格涅夫以個人獨到手法寫下社會百態，在作品中揭露貴族的衰頹沒落，農奴制的人性，新生一代的崛起，及民主改革的趨向，國家封建制度的可悲與墮落，令他感到痛切的恥辱與熾烈的義憤，面對不公、愚蠢與腐敗當道，他又自感無能為力，因此，將鬱積的想像力與道德感發洩在文學中，而《貴族之家》這部作品正是完整呈現貴族知識份子成為多餘人的寫照。

## 二、俄國當代寫作風氣的轉變

十八世紀中葉，俄國古典主義成為文壇主流，創作作品歌頌君主和主張為國家而犧牲個人利益，尊崇理性，尊重格律和「三一律」，即一個劇本只能有一個情節，劇情只能發生在同一地點，時間不超過一晝夜（24 小時），諷刺性突出，爭取文明與進步，並宣揚啓蒙思想。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感傷主義<sup>35</sup>文學描寫普通人內心感受的小說風潮雲湧，取代古典主義。接著在十八世紀末流行的是現實主義文學，要求以按照生活本身的樣子反映生活，真實描繪事物現象，對社會生活進行客觀的、冷靜的觀察和精雕細刻的藝術描繪。拉吉舍夫《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開現實主義風氣，內容描寫俄國農村一片淒慘的景象：農奴什麼都被地主奪走了，只留下「無法奪走的空氣」；地主與農民之間，「一方幾乎擁有無限的權力，另一方卻是毫無保障的弱者，因此地主之於農民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他自己所下判決書的執行者。」<sup>36</sup>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浪漫主義占文學主導地位，強調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描寫作家認為可能有的或應該有的生活，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至普

<sup>35</sup> 感傷主義：十八世紀後期歐洲出現的一種文藝思潮，因英國作家斯特恩的小說《在法國和義大利的感傷的旅行》而得名。它排斥理性，崇尚情感，亦稱「主情主義」，作家注重內心情感，強調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張細緻刻畫人物心理活動和不幸遭遇。

<sup>36</sup> 李明濱：《俄羅斯文化史》，頁 61-63。



希金、萊蒙托夫及果戈里作品題材、內容及文字風格的改變，清楚顯示俄國文學已由浪漫走上寫實的道路。果戈理的創作《欽差大臣》及《死魂靈》真實地描寫俄國社會，暴露和批判社會弊病，深受別林斯基讚譽果戈里寫作題材創新，也受貴族知識份子推崇，形成「果戈理學派」，也稱「自然派」，學習和繼承果戈理傳統，藉描寫具體的社會問題與傳統的「高度藝術化」作品對立，給俄國黑暗的社會問題與社會制度一大痛擊。這些論調引起知識份子迴響，使知識份子對政治問題的興趣提高，以社會的現象為寫作題材，推出一系列現實主義作品，如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屠格涅夫《前夜》《父與子》，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等小說，造成五、六十年代俄國文學的繁榮，使俄羅斯文壇在十九世紀後半葉正式邁入寫實文學時代。加上十九世紀俄國文壇極具影響力的文學批評領導者別林斯基，賦予藝術與文學非藝術性、非文學性的任務，強調每一位作家、藝術家都應是時代忠實的反映者。他強調作家創作的任務在描寫真正的人類世界，不必刻意去美化或醜化它，特別是長篇小說作家們，必須對真正存在的問題，有深切體會，加以真實描寫，將真實感情明確表達出來。杜勃羅留波夫在文學評論中捍衛和發展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指出作家的主要價值在於描寫真實，真實地描寫勞動群眾的生活是文學的首要任務。他提倡「作家去找人民生活新鮮、健康的幼芽，幫助它們正常、順利地成長和繁榮。」<sup>37</sup>在四十年代以後，多數作家都遵循此原則，俄國的寫實文學大盛，作品幾乎皆具兩大特色：「社會性、平民化」。<sup>38</sup>

俄國批判現實主義<sup>39</sup>文學形成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隨即迅速走向繁榮，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趨於沒落。它是資本主義逐步興起，封建制度開始走向崩潰的產物，將近一百年的俄國文壇，描寫人民苦難的作家人才輩出，批判封建農奴

<sup>37</sup>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164。

<sup>38</sup> 歐茵西：《俄國文學史》，頁132。

<sup>39</sup> 批判現實主義：它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批判這種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按照某種改良方案去改造社會為主要任務，後來高爾基將它稱為「批判的現實主義」。

制，反映現實黑暗的作品不斷湧現。<sup>40</sup>這些作家深切關懷著祖國和人民的現實命運，以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濃厚的倫理意味和熱烈的社會理想與追求，寫作社會寫實文學。他們把自己的深刻情感和銳利筆鋒深深探入充滿人生苦難的俄羅斯大地，對冷酷、悲慘的社會現實真實地予以描寫，上至驕奢淫逸、專橫暴虐的封建官僚、莊園地主，下至忍氣吞聲、飽受屈辱的小公務員、農奴，無一不在作家的視野之內。<sup>41</sup>他們著力表現人物性格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善於選取典型的生活現象，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成功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高爾基論及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時說：「西方任何一國的文學在生活中出現的時候，都不曾具有這麼大的力量和速度，發出了這麼強烈耀眼的智慧光輝……讓世界都驚訝於它的美和力量。<sup>42</sup>」這種文學的轉變，與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政權轉移並行發展，因此一般認為，當時的文學演變與政治有密切關連。俄國經過和西方戰爭的洗禮，在進步西歐文化傳播之下，封建農奴制度的深刻危機已清楚暴露出來。在農奴制度崩潰之前不久，關於俄國歷史發展的今後的道路問題，關於俄國社會的主要力量問題，及由此而來的四十年代的進步貴族知識份子活動的歷史意義問題，在俄羅斯的政壇與文學中引起熱烈的爭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針見血地提出舉國關心的「誰之罪？」和「怎麼辦？」問題。「誰之罪？」就是指俄國這樣一個地域廣闊、資源富饒的國家而經濟和社會制度卻相當落後，是誰之罪？國家的財富或者被白白浪費掉，或者被騙子、寄生蟲揮霍殆盡，而人民受盡地主、富人的壓迫過著貧困痛苦的生活，是誰的罪？怎麼辦？就是應該怎樣改變現狀，建設新的生活。<sup>43</sup>

屠格涅夫在文學理論上和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有許多共同之處。他主

<sup>40</sup> 李明濱：《俄國文化史》，頁 143。

<sup>41</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年，頁 7。

<sup>42</sup> 歐茵西：《俄國文學史》頁 127。

<sup>43</sup>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年，頁 163。

張準確、有力地描寫真實，指出生活的現實對文學來說是最大的幸福。也認為：「生活是一切藝術永恆的源泉。因此，他一貫堅持作家深入觀察和研究生活，積極參加社會實踐。」<sup>44</sup>當代影響力極大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曾為屠格涅夫解釋政治上獨裁的恐怖和文學上現實主義的必要：「如果有人問您流派的真正價值所在，我們可以回答：就大自然和人類生活的最高理想而言，這個新的流派要轉向應稱之為大眾的對象，以它為主人公，深入地研究它、揭示它。」別林斯基認為，文學不能離開民族的土壤，來源於生活，「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詩歌」，文學和藝術創作的本質在於「再現全部真實的現實」<sup>45</sup>，作家的責任乃是「在人民中間喚醒世紀以來都埋沒在污泥和塵芥中的人類尊嚴」<sup>46</sup>。使屠格涅夫更加注意到社會脈搏的跳動，對時代的變動有敏感的體會，他在發自鄉間的信裡中提到：「生活在逼人，在推動，在挑戰，在召喚，.....平靜下來，對當代作家，尤其是對俄羅斯當代作家來說，是困難的。無論外界、還是內部，都不能使他感到平靜。」隨著自己思想逐漸成熟，他感受到文學滲透人心的力量，自己該為社會盡一些責任。屠格涅夫認為：「詩人應當是一個心理學家，而不是隱蔽的心理學家：他應當知道和感覺到現實根源，但是表現的只是興盛和衰敗的現實本身」。<sup>47</sup>因此他的小說一直在探索俄羅斯社會和國家的出路問題，小說社會思想內容容量巨大，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鮮明的連續性。屠格涅夫最感興趣的是社會環境對人的心理的影響，社會思想衝突的心理反映，情感與行動的關係。屠格涅夫談到自己的世界觀：「我主要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最感興趣的是人的面貌的生動活潑的真實，對一切超自然的東西我都持冷漠的態度，任何絕對的東西

<sup>44</sup>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164。

<sup>45</sup> 轉引自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127。

<sup>46</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頁69。

<sup>47</sup> 王立業：〈屠格涅夫、妥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比較〉，《國外文學》第3期，2001年，頁67。

和體系我都不相信；一切人的東西對我都是珍貴的。」<sup>48</sup>正如別林斯基認定屠格涅夫是「我們時代的兒子，胸中懷有時代的全部憂愁和問題。」<sup>49</sup>他的作品有豐富的內容，成熟的技巧，真實地反映十九世紀四十到七十年代俄國的社會生活和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捕捉當時激動不安的社會問題，深刻痛切關懷國家的狀況和命運。高爾基說：「屠格涅夫是個優秀的現實主義者，我曾經不只一次說過，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不由自主地受著自己的印象所支配，便往往覺察不到：在描寫他所珍視和熟悉的東西的時候，他會把熟識的寫得恰如其實在的樣子——換句話說，——小說的素材的美或鮮明性不容許他去歪曲。」<sup>50</sup>茅盾稱屠格涅夫是「詩意的寫實家」。《獵人筆記》是一部「討論農奴解放的著作」；《羅亭》《父與子》《處女地》「都是活活地把俄國社會的形狀現出，寫新思想和舊思想的衝突，更把自己的靈感和觀察灌到新青年的腦裡去」。<sup>51</sup>茅盾寥寥幾筆，點出屠氏創作的最本質的特色。

作為清醒的現實主義作家，屠格涅夫有一個正直藝術家的良知。基於對貴族社會和農奴制腐朽本質的深刻認識，基於對俄羅斯祖國和民族的無限熱愛，對祖國未來命運的高度關心和責任感，他毅然拿起外科手術刀，對貴族社會的癰疽進行無情的解剖。屠格涅夫談到自己的創作時曾明確指出，從《羅亭》到《處女地》為止的漫長歲月中，他「竭盡全力和所能認真並不帶偏見地描繪和體現在相應的典型中的是莎士比亞所謂的 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形象本身和時代的映記）和俄國文明階層人士的變化迅速的面貌……」<sup>52</sup>他在創作中緊跟著時代車輪，關切時代召喚又及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追求的是客觀而忠實地反映出時代的特徵和塑造社會典型。小說家柯羅連科評論屠格涅夫「以苦心的

<sup>48</sup> 轉引自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頁351。

<sup>49</sup> 朱憲生：〈屠格涅夫的美學思想初探〉，頁30。

<sup>50</sup> 轉引自雷成德：〈論屠格涅夫小說的藝術手法〉。見高爾基著，繆靈珠譯：《俄國文學史》，新文藝出版社，頁296。

<sup>51</sup> 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頁4。

<sup>52</sup> 轉引自李兆林 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頁351。

手法觸摸當代重大問題最顯露的神經……而給人刺激」。<sup>53</sup>在《貴族之家》中屠格涅夫藉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描繪出農奴制統治下的俄國農村凋弊淒慘的景象，矢志重整莊園，但苦心的改良，認真耕作，仍不能解決農奴制統治下的農民的根本問題，就是屠格涅夫和他的主人公一起得出的結論。在這一點上，屠格涅夫是清醒的、明智的、正視現實的。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說的：「屠格涅夫是最明智的俄國人之一。」承認並接受現實，現實主義地反映這個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在篇末，作家用充滿哀怨的語調寫道：「這麼就完了嗎？」「拉夫列茨基以後怎麼樣了呢？還有麗莎呢？可是對於雖然活著，卻已經退出了人生戰場的人，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我們為什麼還要再提起他們呢？」這「雖然活著，卻已經退出了人生戰場」一句，不是絕妙地表現屠格涅夫對貴族階級的歷史命運的認識嗎？這實際上是關於貴族階級死刑的判決書。用恩格斯評論巴爾札克的一句話來評論屠格涅夫：「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sup>54</sup>充分顯示屠格涅夫作品的現實性。

### 第三節 創作經驗的積累

屠格涅夫有獨特的敏銳觀察力和傑出的藝術才能，如杜勃羅留波夫所說：「他很快就猜度出滲透到社會意識中的新要求和新思想」，並且在作品中描寫那

<sup>53</sup> Isaiah Berlin 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76 年，頁 344。

<sup>54</sup> 轉引自陳大夫：〈又偉大，又孱弱——從《貴族之家》看屠格涅夫世界觀的矛盾〉，《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第 4 期，1984 年，頁 44。

些已經到來並開始隱約使社會不安的問題<sup>55</sup>屠格涅夫認為任何一位作家，首先應當盡可能忠實地、生動地再現來自本人和別人的生活感受。他將一生的探索和追求，對國家的熱忱，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六部長篇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處女地》，記錄俄國大變革的真實情況，深刻描寫俄國社會運動從貴族知識分子革命到平民知識份子革命的歷史發展，被思想文化界稱為「俄國社會的編年史」。<sup>56</sup>在《貴族之家》塑造多餘人形象的作品前，作家累積豐厚的寫作經驗，已有《獵人筆記》《羅亭》及短篇小說描寫社會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才能在創作《貴族之家》時筆法更為純熟。

### 一、早期創作《獵人筆記》的啟發

屠格涅夫文學創作是從一八三四年模仿拜倫的《曼弗雷德》寫成的長詩《斯捷諾》正式開始的，此後十年間寫過二百首左右的詩與長詩，早期創作在風格上及題材上學習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為主要特點，其中《帕拉莎》描寫俄羅斯的田野、被初戀折磨著的年輕姑娘，近似《葉甫蓋尼·奧涅金》的主人公，是一首優美、歡快又憂鬱的長詩。別林斯基在《祖國紀事》發表熱情頌揚《帕拉莎》的文章，他稱讚這首長詩有堅實深刻思想：「由於潑辣的詩句，快樂的諷刺，對俄國大自然的忠實的描繪，主要的是由於對地主生活細節的巧妙的風貌素描，當發表的時候很被公眾稱道。<sup>57</sup>」他評價作者：「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從俄羅斯生活的細微處提取深邃的思想，優雅而細膩的諷刺隱含著強烈的同情心。<sup>58</sup>」

<sup>55</sup> 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 58。

<sup>56</sup> 賈淑芬：〈俄國十九世紀的知識份子與人民解放運動——論屠格涅夫和他小說的主人公〉，《遼寧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02 年 7 月，頁 41。

<sup>57</sup> 滿濤譯：《別林斯基選集》第 2 卷，時代出版社，1952 年版，頁 487。

<sup>58</sup> 亨利·特羅亞著，張文英譯：《世界文豪屠格涅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

作家的第一部小說《安德烈·柯洛索夫》內容中沒特殊人物，只有普通人；沒有壯麗的場景，只有日常生活的點滴；沒有狂亂的夢想，只有原始的真實。可見屠格涅夫早期的創作著重大自然的描繪，呈現社會真實面貌。處於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文學的過渡時期，他的視野漸漸伸展到社會寫實的關懷，透過文筆寫出俄羅斯自然真實的一面。延續這樣的情感，及自己背著獵槍實地深入村莊，見到許多農民和地主，對大自然的精妙觀察和對現實生活的深入體驗，為創作《獵人筆記》提供豐富生活素材。在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一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獵人筆記》，生動地塑造了一系列農民與地主的形象，深刻地描繪了備受壓迫、凌辱的農民的心理，表現了對農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對農奴制度進行猛烈的抨擊。當時以至今日的讀者，仍以此節作為古老而變遷中的俄國鄉村、為自然生命與農民生活的神奇描寫。另外，屠格涅夫自視此書是他對可恨農奴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抨擊，是一聲義憤的吶喊，專為灼痛統治階級的意識而發<sup>59</sup>。

十九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俄國頻繁的農民暴動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農奴制的深刻危機。廢除農奴制已成為首要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的進步文學中也有所反映，這就是屠格涅夫創作《獵人筆記》的社會基礎。《獵人筆記》短篇集是屠格涅夫第一部現實主義巨著，以高度藝術價值緊密結合著一種意圖，這種意圖是很崇高的，就是和作者所憎恨的農奴制做抵抗。他說：「……我社願意聲明，我在前面並不見有別的道路。我不能呼吸於一種空氣裡，而與我所嫉惡的共存，這也許是我缺少堅忍性質的緣故。我必須從我的仇敵那裡退後開來，使我能遠遠地一鼓作氣師猛烈的攻擊。在我的眼睛裡這個仇敵有一定的樣式，一定的名字：此敵為何，——就是農奴制度。我在這個名義底下集合我所有力量，我決定和他奮鬥到底，——這口憤氣我是發誓不肯平消的。……這是

---

27。

<sup>59</sup> Isaiah Berlin 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76 年，頁 348。

我終身的誓言，也不是我一個人在那時候起這樣的誓。我到西方去，也是爲著奉行我的誓言。……<sup>60</sup>」《獵人筆記》是屠格涅夫早期創作（一八四七——一八五二年寫）的一部優秀作品，採用筆記的形式，記敘一位獵人在俄羅斯山村和田野中打獵時的所見所聞，反映了農奴制度下俄國村鎮各階層的生活，筆鋒探向俄羅斯社會各階層：從貴族、地主、富豪到警察局長、管家、小商人、小販、農奴、車伕、農家兒童和少女，農奴制度下的一切人物都能在《獵人筆記》中找到。有困苦潦倒、痛楚呻吟在地主權威下的俄國農夫，就有充滿人道精神和同情心的俄國文學，也就有深刻描寫農人生活的獵人筆記。書中農民不再是頭腦簡單的牲畜，而是複雜的生命，他們熟悉季節的變遷，忍受著領主的暴行。不用超越現實的呼喊來表達農奴的痛苦，代之以寫實自然筆調呈現農民生活、地主的壓迫、農村凋零景象，從平實不做作手法來牽動人的內心。謝德林認爲：「《獵人筆記》爲從整體上描寫人民及其貧困生活的文學樹立了開端」<sup>61</sup>《獵人筆記》被赫爾岑稱爲「用詩寫成的對農奴制的控訴書」<sup>62</sup>從《獵人筆記》的內容，可以看出屠格涅夫正以他敏捷的思路、高超的筆法，以俄羅斯的平民爲主角，採用寫實的手法，記錄下真正屬於俄國人民的故事，向全世界展現國家的真實面，在作家筆下，農民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遠比地主、壓迫者要高得多。因而引起社會各階層的迴響，他的每一篇作品像箭一樣射向地主階級政權的心臟和憎恨的農奴制。

在寫作《獵人筆記》時屠格涅夫的筆觸已深入到社會中，延續關心廣大人民的情懷，在陸續幾部作品中，仍以社會寫實爲創作主調。在與農奴制抗爭的過程中，他採取巧妙戰法，不以宣傳家方式高喊口號，而採用藝術家的形象思維和藝術技巧作武器，以深刻、生動的藝術形象和有血有肉的具體人物來感染

<sup>60</sup> 屠格涅夫著，耿濟之譯：《獵人筆記》，台灣：漢風出版社，1991年，頁8。

<sup>61</sup> 轉引自曹靖華主編：《俄蘇文學史》，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333。

<sup>62</sup> 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56。



讀者，用不多的篇幅描繪顛沛流離的人們的苦難，寫得十分有力、熱情、真實。別林斯基在論述《獵人筆記》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時指出，「屠格涅夫的才能最顯著的特色在於他的創作永遠立足於現實的土壤。<sup>63</sup>」在《貴族之家》中創作前幾代拉夫列茨基的肖像時，屠格涅夫依靠了描繪《獵人筆記》中的貴族所積累的經驗。如安德烈·拉夫列茨基的性格在許多特點上像《小地主奧夫囊尼科夫》中獵人祖父的性格；彼得·安德烈伊奇·拉夫列茨基酷似短篇小說《總管》裡的阿爾卡季·巴甫洛維奇·賓諾奇金，這兩個人都是英國派，表面上相當體面，實際上殘忍到喪失人性的地步。<sup>64</sup>這樣的風格正是寫作《獵人筆記》的經驗累積。

## 二、中期創作「多餘人」系列短篇作品的經驗

屠格涅夫隨筆《希格雷縣的哈姆雷特》主人公華西里·華西里也維奇是一位能自我檢討但在生活中沒有給自己找到位置的俄羅斯哈姆雷特。從屠格涅夫對待主人公的態度可以明顯看出，這位作家譴責四十年代貴族知識份子的無用，他們在生活中的無能及其對黑格爾哲學的盲從。屠格涅夫不只是簡單地指出主人公這樣人物在生活中存在的事實，且對他進行尖銳的、諷刺的揭露，指出在俄國知識份子當中產生反省並弄得他們無能從事實際活動的社會原因和教育條件。旨在諷刺華西里·華西里也維奇這一類人自負於黑格爾哲學，卻沒有能力修理自己田莊裡已經倒塌的橋樑；善於用華麗的言辭議論「愛情、精神的永恆太陽以及其他一些遙遠的對象」但卻愚鈍地、萎靡地生活著，「好像是在羽

<sup>63</sup> 曹靖華主編：《俄蘇文學史》，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333。

<sup>64</sup> 高文風編譯：《屠格涅夫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頁191。

毛褥子下」，「以幻想的意向爲口實過著無聊的生活……等等」<sup>65</sup>嚮往新奇，卻始終是極端不新奇的人物。這個空虛、渺小、無能、平庸人物的愛情就是這樣，他的整個生活是對別人的全盤模仿，議論哲理時也是硬搬別人的意見。

一八五〇年，屠格涅夫寫了中篇小說《多餘人日記》，小說裡描寫貴族青年楚爾卡式陵病態地理解世界，一生尋找安身之處，可是總找不著容納自己的位置，處處碰壁，臨死前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爲自己沒能及時向少女利查表示愛情而終於失去她而感到終身遺憾。他感到自己是多餘的，愛的女人背棄他，不太老練卻堅強勇敢的人排擠他，使他更顯畏縮而不斷檢討自己：「他把自己分析得非常細緻，拿自己比別人……忽然笑起來，忽然又悲傷、洩氣，陷入可笑的沮喪中……」脆弱與神經質的生活態度導致楚爾卡式陵的絕望與死亡。他由此對自己做出這樣的評價：「我須得承認一點，我是這世界上完全多餘的人，或者也可以說是完全多餘的傢伙。」<sup>66</sup>「多餘的，多餘的……這是我想出來的一個絕妙的字眼。我越是深刻地探究我自己。……在我這一輩子裡面我老是發覺我的位置給人家占去了，也許因爲我找的位子不是我該坐的地方。」<sup>66</sup>屠格涅夫將這位家道中落、身世飄零、性情抑鬱的貴族青年稱爲「多餘人」，初步勾畫出「多餘人」形象的輪廓，是他塑造一系列多餘人形象的發端。從此，多餘人的名字開始出現在俄國文學中。

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的西歐文化原型是哈姆雷特和唐吉訶德。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作爲一種文化典型產生於以理性爲特徵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當它們被移植到十六世紀俄羅斯封建文化中，自然會產生變異和走形。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一文中，依據俄羅斯文化傳統與時代文化發展的需要對這兩個西歐文化典型加以改制。自我反省型、思辨的巨人哈姆雷特被描

<sup>65</sup> 普斯托沃依特著 韓凌譯：《屠格涅夫評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9月，頁57。

<sup>66</sup> 參閱劉久明：〈郁達夫與屠格涅夫〉，《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頁100。

寫成只關心自己，蔑視群眾，與人民對立的利己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而執著於某種美好幻想的行動型的唐吉訶德則被描寫成一個勇於自我犧牲地、反抗一切「敵視人民力量」的戰士和革命者。在《希格雷縣的哈姆雷特》與《多餘人日記》中，屠格涅夫塑造兩個俄羅斯式的哈姆雷特，在他們身上，哈姆雷特所具有的一切偉大的悲劇性的品格都變成了渺小的喜劇性的因素，哈姆雷特作為人的楷模的巨人性格蛻化為「空虛、渺小、無能、平庸」的侏儒性格，哈姆雷特的富有智慧、嘲諷的思辨變成鸚鵡學舌、生搬硬套、空洞無物的誇誇其談。<sup>67</sup>這種性格的退化，其根源在於腐朽反動的俄羅斯專制農奴制度扼殺一切健康的人性，毒害了一切健康的思想。

一八五四年在《現代人》雜誌上發表的中篇小說《僻靜的角落》是他早期「多餘人」形象作品中較有影響力的創作。貴族青年威列季葉夫是一個優秀的貴族青年，才華洋溢，具有吸引人的魅力，擁有古道熱腸，卻和他生活的貴族環境格格不入，無法逃脫階級牽絆，又沒有明確追求的人生理想，遠離平民社會，不理會人民疾苦，白白浪費自己精力和才幹，虛度了一生。緊接著《僻靜的角落》，一八五五年初，屠格涅夫寫了《雅科夫·巴生科夫》這篇傷感的中篇小說，描寫的是最後的浪漫主義者雅科夫·巴生科夫，作品充滿哀婉氣息，主人公是一位喜歡幻想的人，終身無所作為，死於意外疾病之中。『雅科夫·巴生科夫對故事敘述人說：而我，朋友，就不能成為一個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嗎？不能做你將來要做的事情嗎？我生來就是個幻想家、空想家！』屠格涅夫在表達未來的羅亭思想。<sup>68</sup>和屠格涅夫同時代的評論家杜勃羅留波夫在他的論文《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中指出：「雅科夫·巴生科夫基本上和羅亭、拉夫列茨基一樣，同屬於多餘人的類型。」<sup>69</sup>在談論屠格涅夫作品裡的多餘人的發展時寫道，

<sup>67</sup> 參閱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92年，頁29。

<sup>68</sup> 普斯托沃依特著 韓凌譯：《屠格涅夫評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9月，頁63。

<sup>69</sup> 陳恭懷：〈試談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8期，1991年，頁21。

「巴生科夫代替了楚爾卡士陵，同樣地，羅亭和拉夫列茨基又代替了巴生科夫。  
70  
」

一八五七年在德國修養身體期間，屠格涅夫寫下《阿霞》這部中篇小說，故事中阿霞是位體態纖弱、心靈純潔的少女，是貴族和女傭人的私生女，受到同父異母哥哥加京的照顧，日久生情，阿霞對哥哥陷入愛情的依戀中，向他表達後，男主人公卻驚慌失措、害怕、退縮了，留下無盡的追恨和惆悵。在對待愛情問題上，貴族知識份子的種種表現，證明他們不配享受真正純潔的愛情，更不必說讓他們承擔改造社會得重責大任了。主人公的性格延續多餘人的形象塑造，《阿霞》主人公的無能為力，他的言論與行動，崇高的理想與十分缺乏的意志與性格之間的矛盾明顯地表現在他對阿霞的關係上。

屠格涅夫在創作長篇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寫出中篇小說《春潮》、《阿霞》及短篇小說《希格雷縣的哈姆萊特》等作品中，塑造一系列多餘人形象，巧妙地運用筆法塑造出扣人心弦的形象，使每篇簡短的故事中流露出憂鬱的筆調。這一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雖常有令人遺憾的結局，但在其中顯現出作家所欲描寫的貴族知識份子成為社會「多餘人」的過程。涅克拉索夫指出，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一個任務：「描寫某些人物的典型，這些人物在不久前還領導著智力與生活運動。由於他們的熱情，使這種運動逐漸抓住我們社會中最優秀與最清醒的部分中得越來越多的一群人。」涅克拉索夫總結說：「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義，他們留下深刻而有益的影響。即使他們都有弱點或可笑之處，但不能不令人尊敬。」<sup>71</sup>這些作品顯現的是時代的悲歌，透過屠格涅夫寫實的筆法，愈顯得歷歷如繪。

<sup>70</sup> 普斯托沃依特著 韓凌譯：《屠格涅夫評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9月，頁63。

<sup>71</sup> 彼得羅夫著 張耳譯：《屠格涅夫》，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1957年3月，頁24。

### 三、晚期創作長篇小說《羅亭》的經驗

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爲果戈理的死發表悼念文章，遭到逮捕和拘禁，之後遭軟禁在家鄉史巴斯科，回到故鄉，他埋頭讀書，讀了果戈理全部作品、俄國史、各種編年史、古代敘事詩及神話傳說，深入地研究俄羅斯人民的民族性格、精神心理及生活風俗，並在自己莊園裡從事改革，解放部分奴僕、辦學校及救濟貧苦農民。在這一段孤獨、離群索居的讀書歲月中，他開始思索到自己未來的路及創作生涯等一系列問題。他覺悟到自己已三十五歲，不能只因爲寫小文章就感到滿足，若要留下不朽作品，就應走更不平凡、更難行的路，應邁向新的起點，拓展新領域，深入社會現實中，去寫大篇幅的東西。他曾寫道：

應該換條路走了，要找到這麼一條路，永遠拋棄舊的寫法。我花了很大力氣想從人們的性格裡提取精華，以後可以把他裝在小瓶裡。……正因爲這樣，我幾乎對我冬季的隱居生活感到很滿意，我會有時間沈思默想，尤其是目前我正遠離一切文學和新聞的影響，處於孤寂之中，更能聚精會神，全力以赴。只有當我身上不再有文人氣息時，我才會成爲一個有所作為的人。<sup>72</sup>

他體認到自己應拋下舊題材和形式，轉寫具社會廣度、心理深度及思想的題材。斯拉夫派的朋友認爲他應當去應將創作中的主人公集中到農民身上，深入研究農民題材，屠格涅夫不同意那些朋友的看法，他既不願昧著良心討好專制政體，爲農奴制度歌功頌德，也不願因受專制壓迫而膚淺地描寫農奴制的黑暗。他再給朋友的回信中指出：

---

<sup>72</sup> 轉引自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89。

在文學中，農民把我們煩惱得夠嗆了，這倒還沒有什麼，但是我開始懷疑，我們為他們花了那麼多力氣，可還是一點也搞不懂他們。而且由於某些原因，<sup>73</sup>這一切開始帶有優哉游哉的田園情調了。<sup>74</sup>

既然真話講不得，說假話昧於良心，於是他選擇將自己社會思考和藝術筆鋒轉向俄國社會的菁英階層——俄國先進的貴族知識份子身上。加上作家正值盛年，又累積豐富的創作經驗，而這段時期的屠格涅夫清楚看到貴族地主的頹廢，他憂心祖國前途，在創作中竭力找尋能解救國家的正面人物。

一八五六年，屠格涅夫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問世，是他對於多餘人形象更進一步的描繪，這部作品在主題深刻性和人物形象刻畫上十分精湛，為他贏得廣泛的讚譽。書中主人公羅亭的生活，不再侷限再對個人命運的關注和幸福的追求上，而是把主人公的思想生活、社會理想和實際活動的種種經歷進行全方面的描寫和分析。「羅亭不僅具有多餘人形象的共同特徵，且更具思辨性和行動性。羅亭的話充滿人道主義，但不是民主主義者的憤怒與抗議的人道主義，而是貴族的人道主義」<sup>75</sup>。儘管他的想法不夠成熟，他的行動多少有些盲從，但他顯然比屠格涅夫早期作品塑造的多餘人形象更高一層。《羅亭》以高度的真實性反映俄國貴族知識份子中的進步者在那個時代必然要成為「多餘人」的發展趨勢，從而引起強烈的迴響。當《羅亭》寫成的時候，俄羅斯生活開始新的時代，屠格涅夫認為革新與改造的時代已經到來，長篇小說《羅亭》的主要思想，就是認為俄羅斯生活中知識、文化、熱愛自由的情緒應該與改造活動結合起來的時代已經來到。同時也表示善於體察時代脈動的屠格涅夫在五十年代新的歷

<sup>73</sup> 這裡指俄國的書刊檢查及專制制度的壓迫

<sup>74</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106。

<sup>75</sup> 彼得羅夫著，張耳譯：《屠格涅夫》，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1957年3月，頁19。

史條件下，力求在自己的小說中探索多餘人產生的社會根源，客觀評價四十年代貴族先進知識份子的歷史功績和社會價值。

從《獵人日記》到《羅亭》《貴族之家》，正像鏡子一般地反映將農奴制度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由農民形象的塑造轉向對貴族知識份子中先進形象的塑造，實質上是屠格涅夫文學創作主題的一種開拓和發展，是他對當代的一系列重要社會問題的新的捕捉、新的探索，《貴族之家》的完成更是屠格涅夫一系列「多餘人」作品的極致，自此之後，作家的創作方向轉向了新的時代人物——新人的描寫。

#### 第四節 《貴族之家》成書的經過

《貴族之家》的寫作背景是：俄國與英法等國在克里米亞的戰爭以慘敗告終，不得已在一八五六年三月簽訂《巴黎和約》，以便趕緊修補國內危機四伏的專制體制。農民的不滿和抗爭已在全國風起雲湧，先後達二、三千起事件，知識界的進步人士早已看到農奴制的腐朽，而選擇支持農民。就連俄軍總司令高爾柯夫不得不對亞歷山大二世進此忠告：「多虧我們簽訂了和約，我們沒有力量再打下去了。和平使我們有可能去「處理國內事務，這一點是必須利用的。第一件事是必須解放農民，因為這是一切禍害的癥結。」<sup>76</sup>面對先進的西歐文化衝擊，專制俄國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國內局勢逼使統治者看到現實：要不等待國內民眾流血革命，推翻農奴制及專制政權，要不就由沙皇政權順應潮流，有限度地改革，消弭革命風潮，以保證全穩固。亞歷山大二

---

<sup>76</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147。

世政權終於被迫邁出一步：決定在一八五六年開始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逐步進行廢除農奴制的準備工作。

在知識界中，是一舉推翻沙皇政權，抑或暫時實行農奴制改革，就這兩個問題，俄國知識界形成兩派：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以一批貴族作家為代表的溫和自由派，屠格涅夫屬於後一派。正當此時一八五七年，他一生最愛的維亞爾多生下兒子保羅，屠格涅夫欣喜地認為那是他的兒子，而滿懷喜悅來到她身邊探望兒子，可是他發現自己受到極度冷落，在維亞爾多的家中他像個多餘人，於是他離開傷心地前往義大利。重新見到學生時代參觀過的城市，往事一一浮現心頭，將往昔的熱情與今日的懶惰、焦慮、失望相比，發現自己到中年依然漂泊無依，一事無成，甚至越來越多想到了死。滿腹的愁緒化為一封封的信訴說自己心中的痛苦。他曾寫信給朗貝爾伯爵夫人：

生活中會有發生突變的時刻，過去會死亡、新式誤會誕生……很快就 40 歲了，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青春已經離去。我應該從此變成一個實際的人，至少知道要去向何方、想達到什麼目的。我只是個舞文弄墨的人。但直至今日，我不過是在喋喋不休。這個人未來會是另一副樣子。<sup>77</sup>

在這個永恆之城，他覺得有能力實踐這一諾言。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向朗貝爾伯爵夫人宣布已經開始一部「主人公是位極為虔誠的年輕姑娘的長篇故事」。這個長篇故事就是小說《貴族之家》，屠格涅夫滿懷幸福地投入工作，在羅馬的廢墟中描繪俄羅斯風光、俄羅斯臉孔和生活。一八五八年春天，

<sup>77</sup> 轉引自亨利·特羅亞著，張文英譯：《世界文豪屠格涅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96。



他未完成小說就離開羅馬，前往其他國家。在倫敦遇到赫爾岑，兩人熱烈討論亞歷山大在國內實施的農奴制改革計畫，屠格涅夫受到極大鼓舞，開始相信沙皇的明理和慷慨，整個俄羅斯在沸騰，也給予他充分的動力返回家園。

一八五八年六月，屠格涅夫回到俄國。這時農奴制改革的呼聲已在國內刊物上公開討論，俄國社會開始出現新的活躍氣氛。學術界自由思潮興起，一些過去禁談的主題成爲街談巷議的議題。目睹貴族知識份子及整個貴族階級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失去往日主宰的地位，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凸顯封建制及農奴制的脆弱無力和落後，他反覆思考貴族知識份子未來的命運和作用、生活幸福和社會義務等問題，不禁爲之憂心忡忡，構成他寫作這部作品的基礎。屠格涅夫回到故鄉斯巴斯科依，沈溺在狂熱的狩獵中，俄羅斯田野美景和森林氣息拂過臉龐，生活中有美酒相伴，閒暇讀書、爭論文學，構成寫作的最佳氣氛，埋頭趕寫時輟時續的《貴族之家》，終於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完成。

兩個月後，他請人代他朗誦《貴族之家》給朋友聽，受到不少褒獎，但岡察洛夫指出一些和他的小說《懸崖》的相似之處，他認爲屠格涅夫抄襲他的作品，因他曾將題綱給屠格涅夫看過。針對這個指責，屠格涅夫避開一切解釋，只爲滿足挑剔的同行而對文字進行修改。不久，爲替自己剽竊的罪名辯護，他寫信給岡察洛夫：

您要我怎麼辦？我總不能沒完沒了地重複《獵人筆記》吧！我還不想停止寫作，接受原本的我吧，或者完全不接受；但別要求我改變，尤其不要將我當作某個塔列寧。<sup>78</sup>再有，不要在討論這個話題了！這些紛擾不會有結果。我們都會死，死後都會發臭的。<sup>79</sup>

<sup>78</sup> 塔列寧：曾任法國外交大臣，以權變多詐聞名。

<sup>79</sup> 轉引自亨利·特羅亞著，張文英譯：《世界文豪屠格涅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99。

《貴族之家》於一八五九年在《現代人》雜誌發表。作品發表後，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迴響，讀者們讀得近乎瘋狂，它到處流傳，在當時，不讀《貴族之家》簡直成了一件無法容許的事。

### 第三章 《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

《貴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繼《羅亭》之後所寫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在創作的六部長篇小說中，《貴族之家》以圓融藝術技巧、富有人生思考、哀婉的情調、優美的文筆而占特殊地位，皮沙烈夫稱屠格涅夫《貴族之家》這部小說是他創作中最嚴整最完美的一部作品。<sup>1</sup>對這部小說屠格涅夫自述：「《貴族之家》是我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這部小說的出版使我躋身於引人矚目的作家之列。」<sup>2</sup>而妥斯妥耶夫斯基認為：「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是一部不朽之作，它屬於世界文學。因為在這裡第一次以其不平凡的成就和完美實現了我們所有的詩人和所有的患有思想病但又在揣度未來的俄羅斯人的預言的夢——使脫節的俄國上流社會與人民的精神和力量融合起來之夢，儘管是在文學上實現的。」<sup>3</sup>

筆者擬從小說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個人心理矛盾、階級隔閡、社會文化衝突角度，來說明形成主人公為「多餘人」的因素。再從作家在文本中描繪的外貌、言行舉止手法，展現其怯弱的個性；從求知上的積極進取，具進步意識，個性上的敏銳自省力、薄弱意志力，以致空有改革理想卻無法成功，即便與小說中其他人物相比，也顯得一無所成，來分析多餘人的具體展現。

#### 第一節 形成拉夫列茨基「多餘人」之因素

《貴族之家》主角拉夫列茨基生長在貴族的環境中，享有封建制度下的特權，原可一生無虞地過著優渥的日子，但具有善良本性的拉夫列茨基，在變動的時代中，受到西方思想的啓迪，心懷愛鄉為國奉獻的情懷，無奈卻在落後封建的俄國傳統文化中，終身理想無法實現，甚至連個人幸福亦如空中樓閣般不可得。在這主角一生的悲劇中，讀者見到了俄國社會的閉鎖，消沈人意志的一面。筆者將從文化衝突、先進意識與階級地位衝突、歷史衝突來探究造成主人

<sup>1</sup> 轉引自普斯托沃依特著 韓凌譯：《屠格涅夫評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9月，頁76。

<sup>2</sup> 趙秋長譯：〈屠格涅夫談自己的小說〉，《俄蘇文學》第5期，1983年，頁72。

<sup>3</sup> 妥斯陀耶夫斯基著，周上之譯：〈談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文藝理論研究》第2期，1983年，頁119。

公拉夫列茨基成爲多餘人的原因。

## 一、西方文化與俄國文化衝突

十九世紀初，西方文化和思潮在貴族知識份子中造成深刻的影響，俄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落後性與進步性在貴族知識份子身上衝突與融合。《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父親伊萬在彼得堡上流社會環境下成長，接受法國家庭教師西式教育，滿腦子狄德羅、伏爾泰、盧梭等西方學者思想，有自我主張，渴望追求個人權力，與俄國現實格格不入。不顧父親反對娶婢女爲妻，生下拉夫列茨基，並自豪地認爲「他沒有辜負他的導師們的教誨，果真把盧梭、狄德羅和《人權宣言》<sup>4</sup>的理想付諸實踐而且身體力行了。」<sup>5</sup>（153 頁）拉夫列茨基的父親充滿歐洲作風，「完全像一個英國人」的穿著，「專談政治和政治經濟問題的談話」，「他身上的一切都散發著大不列顛的味道，似乎全身都充滿大不列顛的精神」；但「說來真怪！伊萬·彼得羅維奇成了個英國迷，同時自覺是個愛國者」。（158 頁）拉夫列茨基的父親同其他受西方教育影響人物一樣，西方學說「裝倒是裝得滿滿的，卻並沒有注入他的血液裡，沒有沉澱他的靈魂裡，沒有變成一種堅決的信念」，造成他性格上先天不足，缺乏根基，因此形成言行不一，時而狂熱激烈，時而保守妥協的兩面性格。<sup>6</sup>顯出教育拉夫列茨基的長者在思想上存在著矛盾，隨著他成長、思想成熟，更覺察到父親言行不一，當見到剛強的父親因病而變得脆弱，他心中受到極大震撼：「他原先已經發現父親的言行不一，嘴裡奢談著自由主義的理論，行動上卻是冷酷狹隘的專制主義，但是他絕沒有料到會來這樣一個突變。冥頑不靈的利己主義者竟突然原形畢露了。」（162 頁）父親西化的教育方式和他所生長環境的格格不入，在文化上的差異，混亂拉夫列茨基的價值觀，但也使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增強，形成多餘的人性格正是這種文化接觸、撞擊與衝突的產物。

<sup>4</sup>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以孟德斯鳩、盧梭的政治學說爲理論基礎，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制憲會議通過。宣布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反抗壓迫是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作者把伊萬·彼得羅維奇和農女的結婚譏諷地說爲對上述思想的身體力行。

<sup>5</sup> 參閱屠格涅夫著，磊然譯：《羅亭 貴族之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以下文本資料引自此書。

<sup>6</sup> 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 4 期，1992 年，頁 26。

首先我要把他教育成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斯巴達人。（古希臘的斯巴達人自幼受軍事體育訓練，以培養克服困難的堅韌精神）……音樂不是男子漢該學的玩意兒，這門功課乾脆永遠取消；自然科學、國際法、數學、木工（是按照盧梭的主張）；還有紋章學，是為了培養騎士的尚武思想感情，——這些就是這個未來的“人”必須學習的課程。……“制度”把孩子弄糊塗了，腦子裡一團混亂，精神受到壓抑。……費佳<sup>7</sup>年滿十六歲時，伊萬·彼得羅維奇認為有義務及早給他激起對女性的蔑視——結果，這位年輕的、心理還懷著膽怯的斯巴達人，嘴上剛長出茸毛，渾身充滿精力和熱情，卻已經竭力裝出一副滿不在乎、冷漠而粗暴的樣子。（160 頁）

拉夫列茨基在性格遭受粗暴凌辱的條件下接受教育，媽媽婢女的身份，使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尷尬的，童年時已感受到自己地位特殊，遭人嘲諷的屈辱感吞噬他的自尊。幼年由嚴厲的姑姑照管，他最怕姑姑銳利的眼睛，「在他面前他不敢吭聲，往往的他在椅子只要稍微動一下，她馬上厲聲喝道：『往哪兒去？給我老老實實坐著。』」（159 頁）在姑姑的管教下，他沒有休閒時間，只有一位粗俗的瑞典籍女教師學習語文，在單調、沈悶的生活裡，同樣的書填滿他的空閒時間，沒有其他娛樂，一些奇怪、陰暗的思想逐漸在這孩子腦中滋長。他不受人喜愛，正如作家所言「周圍的人，他一個也不愛……一顆從小就不知道愛的滋味的心，是痛苦的！」（160 頁）兒童時期，拉夫列茨基本應該接受一般教育，去思考人民處境，有機會關懷農奴制等問題，可是，他所受的教育卻使他遠離生活。他的意志不斷遭受姑媽格拉菲拉的壓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傳統貴族社會所教養出來的孱弱後代。

這種畸形教育在精神上影響一個青年的發展，善於深思熟慮和敏感的拉夫列茨基清醒而現實地考慮到一些問題，他覺察到真實生活和父親強力灌輸的思想差距，曾經痛苦地尋找新的生活道路，迫使他成爲一位脫離人民的人。在西方文化及傳統本國文化中，一方面因身爲莊園地主，拉夫列茨基接受外來文化影響較早，文化意識中已吸收西方文化中樂觀積極精神、生命的創造及對個性

---

<sup>7</sup> 費佳是費奧爾多的小名。

和勞動的重視，學習西方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在他的深層意識中，無法抗拒本國文化中由農奴制、封建專制的社會造成的懶惰、軟弱、空想缺點。以致西方文化力量無法在本國轉化為行為的變革力量，而俄羅斯文化封建落後無法充分發展的矛盾下，出現了赫爾岑所描繪的：「他們在本國是外國人，在別國也是外國人，他們是懶惰的旁觀者。在俄國人看來，他們是讓西方的偏見敗壞了；在西方人看來，他們又是讓俄國的習慣毀壞了，他們是一種聰明的『多餘人』」<sup>8</sup>拉夫列茨基夾在兩類相互對立的文化中，位於衝突的中心，成為既非西方又非俄國的「多餘人」。「多餘人」正是在新舊時代的撞擊和交替之際出現的和交替之際出現的，從他們身上可以感受到大動盪大變化中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氣息，同時又受到舊的時代生活的牽制，在他們身上可以捕捉到舊時代的殘渣污跡，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世界邊緣」的人物。

## 二、先進意識與階級地位衝突

十八世紀，俄國貴族的特權不斷擴大，沙皇政府不斷給予貴族種種優惠待遇。貴族擁有土地、農奴、礦藏、森林、水源的壟斷權和購買村莊、房屋和開辦工廠設立市場的權利，僅須盡教育子女學會對貴族階層得體的文化義務，成為俄國社會的特權階級。至十九世紀，貴族把注意力集中於營造更加舒適的生活環境，貴族地主只有少數親自照管田野工作，大多靠管家監視生產，利用佔有的時間盡情消遣、娛樂，生活極盡奢靡之能事，大肆揮霍從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一八四八年，有一位描寫生活的作家說過：「不但彼得堡，而且整個俄羅斯都染上了奢侈和浪費，每個人只考慮閃耀一下，而不考慮要過日子和考慮將來。」<sup>9</sup>吃得香、睡得甜、打紙牌、飯前一盅酒下肚，就是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精神空虛，過著無憂無慮、遊手好閒、狂飲無度的生活。

拉夫列茨基雖是衣食無缺的貴族，但不屬於可以左右時勢的統治階層。實際上，他們處於極端保守的農奴主和受壓迫農奴間的中間階層。階級地位處於

---

<sup>8</sup> 轉引自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92年，頁25。見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文版，第108頁。

<sup>9</sup>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109-110，140。

上層，但思想意識中傾向下層的成分：低於上層，對掌握國家政權、控制經濟命脈的專制者懷有敬畏和仇恨的複雜情緒，因為封建專制政權穩固，他才能享有貴族的特權；高於下層人民，階級地位使他們對農奴有天然的優越感，因教育的啓迪，拉夫列茨基對下層人民苦難抱持同情態度。

一個鬍子濃密、頭髮凌亂、面色陰沈疲憊的農民走進教堂，他一進來就雙膝跪下，立即急忙地畫著十字，每叩拜一次就把頭向後仰，並且搖晃著頭。他的臉上和全部動作裡都表現出那樣悲痛欲絕的神情，使拉夫列茨基不禁走到他面前，問他發生什麼事。農民帶著吃驚和嚴峻的神情後退了一步，望了望他……「我的兒子死了，」他急匆匆地說了，又叩拜起來……「對於他們，有什麼能代替教堂的安慰呢？」……他的心是沉重的。(267 頁)

拉夫列茨基關懷下層人民的苦難，加深對他們的同情，出現改善人民權利想法，如此，一種革新的力量在冷漠禁錮的心中滋長。接受先進西方思想的陶冶，使得他的意識型態和階級立場在貴族中是最不穩定的，最容易產生懷疑和否定舊有制度的想法，變革的要求最易產生。他的這種雙重性——既有革命性，又有反動性，使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產生矛盾。受過廣泛教育並深受貴族意識薰陶的主人公，意識到充塞頭腦的無數之事在實際中毫無用處，縱有智慧與才能卻無用武之地。畢竟在當時的社會中大量的文盲，大部份的人民還是過著鄉村生活，人民與知識界間有相當的距離，他感受到自己和所處社會格格不入的痛苦，無事可做，在無聊的享樂中虛拋年華。在文本的描寫中，讀者可深切感受到身為莊園主的拉夫列茨基與他盼望改變其生活的農奴之間的隔閡：

費奧多爾·伊萬內奇還到村子裡走了一圈。農婦們站在自家小屋的門口，手托著腮望著他；農民們遠遠地向他行禮，孩子們跑開了，狗都冷漠地吠叫著。(183 頁)

然而，進步思潮的覺醒卻具有不可克服的侷限性。一方面拉夫列茨基對貴族階級利益的擁有權，使他缺乏果斷、勇敢的反抗精神和堅定不移的革命立場。

階級間的隔閡，使他不可能徹底擺脫本階級的觀念與下層人民思想結合，妨礙對人民的瞭解。另一方面，經濟地位使他對人民的革命抱有疑慮，雖然思想上意識到農奴制改革勢在難免，盼望封建專制的開放；但在階級地位上，本身是佔有農奴的農奴主，拉夫列茨基不會徹底背離自己階級的原則。這種思想意識的發展超越階級基礎的不平衡性，把他推到一特殊地位，在心態和行動上難免具特殊、微妙意味——主人公在貴族的陳腐土壤中生根發芽，身上流著貴族的血液，賴以生存的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就源於舊的貴族社會。同時，他們又受西方先進思想的光照和滋潤，越來越顯示脫離舊環境的態勢，甚至在精神上超越世俗。以拉夫列茨基個人的能力、才智是無法挽救處於崩潰邊緣的貴族社會及腐朽的農奴制度，尤其是他的身份所代表的是貴族階級，脫離了一般平民的本質，使他感到更茫然，找不到自己的天職，無法給人民帶來任何好處，甚至連自己的幸福都成了泡影。

總結來說，拉夫列茨基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薰陶，同時又處在俄國農奴制和沙皇專制的落後環境中，身上帶有思想啓蒙者和農奴主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是對俄國官場和他們出生的社會環境（通常是貴族社會的環境）的疏遠，對於這個環境中自己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優越意識；另一方面是心智的疲憊，深刻的懷疑、言行的脫節，對社會的消極性，這兩方面不同的性格特徵，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構成矛盾。<sup>10</sup>正如杜勃羅留波夫所說：「多餘人並不是一個在天性上已經完全失去自由活動能力的人。他的懶惰、他的冷淡，正是教育和周圍環境的產物。」<sup>11</sup>正如拉夫列茨基出身貴族階層，生活較為幸福，政治上沒有太多壓力。雖然與周圍的貴族階層無法保持一致，但又不能擺脫貴族生活的環境，這一點決定他對社會的反抗必然是軟弱無力的。這一點因階級地位的隔閡產生的距離，正與作家本身的貴族身份的侷限性相似，高爾基說：「伊凡·賽爾格葉微支·屠格涅夫是個極聰明的人，但是他有一顆模稜兩可的心靈，因此他常常嘲笑民主的思想和心情，而這並不妨礙他依然是深入骨髓的一個貴族。」<sup>12</sup>雖然拉夫列茨基充滿熱情，對俄羅斯生活中固定下來的那種停滯與普遍沈寂現象

<sup>10</sup> 郭秀媛：〈俄國多餘人二重性格成因探討〉，《岱宗學刊》第2期，2000年，頁35。

<sup>11</sup> 轉引自孟顯智：〈生命的空殼 地道的廢物——談《北京人》中的「中國多餘人」〉，《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2001年，頁48。

<sup>12</sup> 轉引自雷成德：〈論屠格涅夫小說的藝術手法〉，頁115。見高爾基著，繆靈珠譯：《俄國文學史》新文藝出版社，頁307。



不滿，渴望改變現狀，願意為大眾的利益而獻身，然而只是模糊地意識到應該做點什麼，卻不知道該做些什麼，由於他與人民相距甚遠，無法得到人民的理解和同情，憑自己的願望去幹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因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無法投身到他所醉心的改革事業中，結果當然是碰壁和失敗。

### 三、歷史使命與現實環境衝突

貴族階級的優勢地位，使拉夫列茨基有機會接受教育，接觸西方思想，能夠在普遍蒙昧的社會中擔任啓蒙者的角色，傳播自由、民主的種子，改革莊園制度，促進人民覺醒。隨著啓蒙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和自身思想的發展，無論社會或他自己都對把思想轉換為更有效行動的要求，但現實環境卻阻礙重重。一方面，封建的舊教育和社會生活造就他們性格中的懶惰、懦弱、視野狹窄和個人主義；另一方面，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思想意識領域沒有出現一種主導地位的革命思想；加上沙皇政府恐怖統治造成社會黑暗，單憑個人力量，是絕無打破黑暗、求得社會改革的可能。但拉夫列茨基仍深信俄國的未來是光明燦爛的，只要改革制度，相信人民有進步的能力，人民是有信心和勇氣去追求希望，在與潘申的論辯中，「拉夫列茨基維護俄國的青年一代和俄羅斯的獨立性。他情願犧牲自己，犧牲自己的一代而去保護新人，保護他們的信念和願望。」(222 頁)他深切體會到時代的進步，俄國未來的腳步是需要新人來推進，所以他願意成全社會改革者的理想實踐，充分體現出主人公進步的思想。但進一步探查整個俄國當時環境趨向，雖已有有志之士期許著進步份子的改革，但封建的毒瘤仍深植貴族心中。使得他雖懷有才智、理想，對社會有期許，渴望尋求新生活，卻無力衝破世俗的偏見，掙脫舊的封建傳統觀念的枷鎖，加上脫離人民，缺乏用自己的雙手改變社會的能力，要反抗社會，力不能及，要順從社會，又於心不願，於是個人反對社會的抗爭最終變為反對自己。

拉夫列茨基是他賴以生存的那個社會的叛逆者，接受歐洲先進資產階級思想，所受的教育遠遠高於周圍的人。啓蒙思想的傳播，法國大革命的感召，十二月黨人的反抗，都加速向拉夫列茨基這類知識份子的覺醒。但覺醒了的貴族青年勢單力薄地面對著強大的頑固的沙俄封建勢力。「作為那個社會叛逆者的多

餘人既不願意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又找不到可以依靠的階級力量，他們橫衝直撞，硬是闖不出一條路來。」<sup>13</sup>總之，社會一方面對貴族知識份子提出行動的要求，另一方面卻又沒有發展到可使他們實現歷史使命的成熟階段。最終造成多餘人的歷史使命與社會現實的衝突。他們是歐洲思想和俄國秩序之融合的產物，注定只能成為聰明的廢物。正如赫爾岑所說，「『多餘人』的多餘，是相對於他們安身立命的環境來說的。」<sup>14</sup>歷史的使命督促改革的腳步，但社會的現況卻是原地踏步，在這樣的拉距中，拉夫列茨基的改革願望僅能閉門造車，難以拓展了。

## 第二節 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體現

沙塔洛夫指出屠格涅夫是一位對時代非常敏感的作家，他善於通過自己塑造的生動的藝術形象反映現實生活。若把屠格涅夫塑造的人物性格綜合起來看，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第一，屠格涅夫的人物性格有著巨大的社會性，並且是豐富多樣的。第二，屠格涅夫的人物性格和情節之間是存在差異的。<sup>15</sup>他的人物性格比起情節要豐富得多、充實得多。換句話說，他塑造的人物性格比他作品中的情節給人留下的印象更充實、更深刻、更多樣。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質及言行舉止中，可窺見當代社會的影子。

認識屠格涅夫在塑造《貴族之家》主人公多餘人形象，可從二方面切入：一是外在言行舉止展現，包含在外形上的描寫，面對愛情、事業時的言行表現方式；另一方面從內在的心理矛盾來了解主人公性格的柔弱、內心的天人交戰及自我對話。對於多餘人複雜的性格，從兩個角度來揭示這種人物性格特點：一種角度是，把這些才高志大的多餘人放到社會的競技場中，極力表現他們熱情蓬勃、追求真理及富有理想的性格；另一種角度是，把這些多愁善感的多餘人放到愛情追逐戰中，表現他們情思纖細、憂鬱感傷的柔弱性格。綜合以上所述，筆者將從作家在小說中對拉夫列茨基肖像的描寫、性格表現、事業追尋及

<sup>13</sup> 張蘭芬：〈多餘人的愛情悲劇〉，《俄蘇文學》第5期，1987年，頁94。

<sup>14</sup> 郭秀媛：〈俄國多餘人二重性格成因探討〉，《岱宗學刊》第2期，2000年，頁37。

<sup>15</sup> 轉引自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頁88。

愛情成敗，來全面剖析拉夫列茨基「多餘人」形象展現，再輔以小說中其他人物的對照襯托，凸顯主人公作為多餘人形象的進步與退縮。

### 一、描寫拉夫列茨基的肖像

在小說中「人物形象構成的因素甚多，如人物的外貌、衣著、性格特徵、行為邏輯、心理意識」<sup>16</sup>。在小說形象的塑造上，高爾基曾對青年作家說：「寫作應達到這種地步：讀者所讀的用文字描寫的東西，就像可以觸摸到似的」他要求作家「使得語言能表現出一幅生動的圖畫，簡潔地描繪出人物的主要特點……要把他們描繪得『像浮雕似的』」。<sup>17</sup>屠格涅夫的小說的人物塑造具有這樣的特點，小說內容充滿抒情的氣氛，不論是敘事，還是描寫；不論是對話，還是偶然加入的插筆，總瀟灑濃烈的抒情味，作家對環境、事件、人物的描寫總是滲透著感情。

肖像描寫是屠格涅夫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他和俄國一些現實主義作家一樣，在描寫肖像上很注重社會歷史背景同人物內心世界的關係，而人物形象的內心世界必然要在他們的外表、行為、動作、衣著上得到反映。普斯特伏伊特認為屠格涅夫的肖像描寫至少有三種形式：第一，通過細節來描寫，例如描寫主人公的身材、髮式、面容、眼睛，以及一些能給讀者深刻印象的個性特徵。第二，諷刺式的肖像，這很像果戈理的手法，廣泛利用情景來間接刻畫人物。第三，同主人公內心世界相對比的肖像描寫。<sup>18</sup>雖然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很少以描繪心理衝突來反映社會衝突，很少描繪個體心理，將心理隱藏在行動中，通過行動，我們能夠窺見人物的心理。在《貴族之家》中主人公拉夫列茨基貴族式的穿著打扮，小心翼翼言行舉止，在屠格涅夫的描繪下展現其畏縮含蓄、小心謹慎的樣貌，充分體現多餘人形象。

<sup>16</sup> 吳士余編著：《小說形象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頁211。

<sup>17</sup> 轉引自張偉：〈她們集美於一身〉《西安教育學院學報》，第2期，1997年，見高爾基著 巴金譯：《回憶高爾基》，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頁390。

<sup>18</sup> 參閱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頁88-89。

### （一）外型的描寫

依照沙塔洛夫的看法，在研究屠格涅夫肖像描寫的獨特風格時，須估計到他所遵循的創造方法的深化，即人物典型化、心理描寫的程度，此外還須估計到他的構思及他對所塑造的人物性格的態度。他對屠格涅夫肖像描寫提出三點看法：第一，屠格涅夫所描寫的人物外表的細節差不多總是人物心理狀態或者性格特點的標誌。第二，屠格涅夫的肖像描寫具有繪聲繪影的特點。第三，屠格涅夫肖像描寫的長處在於他不用單一的細節，而採多種細節，每一種細節都必須同別的細節相配合……就像太陽的光譜，少了一種顏色，也不能獲得潔白的光一樣。<sup>19</sup>

透過陳述主人公的衣飾等外在形貌特徵來勾勒出其性情，透過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來表現其面貌，以對話與連串動作，細膩傳達出人物的性格，令人產生栩栩如生，如在目前之感，使讀者產生貼近感。《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擁有健壯的體態，富有剛毅豪邁的氣息，帶給人無限生機，精力充沛的感受，充滿活力的人生態度，卻在眼神及語調中突兀地顯出老態龍鍾的情態。對比之下，主人公健壯的身軀有著怯弱的心，面對事情的逃避態度，作家令人信服地描繪出他的猶豫、徬徨、幻想和痛苦，使他成為反映時代的縮影。

「他那雙頰紅潤的、純粹俄羅斯人的面孔，高高的、白皙的額頭，略微嫌大的鼻子和端正的闊嘴巴，無一不散發草原上的健康氣息，散發出強壯的、無限的力量。他體格健壯，頭上淡黃色的頭髮像少年人那樣鬢曲著。只有在那雙微鼓的、略嫌呆板的藍眼睛裡，露出又像沈思、又像疲倦的神色，他的聲音也似乎有些過於平板。」（146 頁）

「這位年輕的、心裡還懷著膽怯的斯巴達人，嘴上剛長出茸毛，渾身充滿精力和熱情，卻已經竭力裝出一副滿不在乎、冷漠而粗暴的樣子。」（161 頁）

「他的頭腦清楚，健全，雖然有些遲鈍，性情偏於固執，喜歡沈思和疏懶。……他身體健康，面頰紅潤，已經留起了鬍子，而且沈默寡言，使同學們對他產生了奇怪的印象；他們沒有料到，這個乘著寬大的鄉村雙

<sup>19</sup> 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頁89。

馬雪橇準時前來聽課、外表嚴峻的漢子，內心卻幾乎像個孩子。」(163頁)

「他那健壯、寬肩的身軀終日伏在書桌上，他那胖胖的、紅潤的、鬍子濃密的臉被字典或練習簿半遮著，令人看了真覺得有些奇怪。」(169頁)

在這些外型的描述中，讀者想像到的是一位壯碩男子漢的體態，照理應有不可一世的豪氣，卻出人意料的是位有顆稚嫩脆弱的心，慵懶淡漠言行的男子。作家刻意營造如此強烈的對比，讓讀者感受到主人公性格的軟弱面，面對愛情的畏縮，無怪乎一生無所作爲。恰如廣袤的俄國，在看似強盛的國力下，社會內部蘊藏著脆弱的體制。

## (二) 情緒反映的描寫

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寫具有自然而隱密的特點。他不是透過揭開心靈秘密的蓋子把主人公感情孕育，發展的過程展現在讀者的面前，而是通過對主人公外部姿態、姿勢、舉動和面部表情的描寫把它藝術地表現出來。在拉夫列茨基的表情上，顯現的是較含蓄的情緒反映，家庭的訓練讓他從小感受到的是陰鬱的一面。呆板的教育方式，嚴肅無趣的生活，沉悶的環境，只有同樣的幾幅畫「引起他的沈思，刺激他的想像；此外他就沒有任何娛樂。」加上父親強制嚴格的教育方式，一堆的軍事教育，使得年幼的拉夫列茨基被制度弄糊塗了，「腦子裡一團混亂，精神受到壓抑」。在小說中，我們看不到他開懷大笑、怒聲大罵、傷心痛哭的情緒宣洩，而代之以較委婉的情緒表達、憂鬱的面容，顯現出主人公不是個性獨立、敢愛敢恨、性格強悍的男子，而是溫文儒雅、舉止得體、性格懦弱的君子。也正因爲這樣的個性顯現，對於自己幸福的輕易放棄，追求事業缺乏毅力，以致一生一事無成的結果，是讀者從作家匠心獨具的筆法中可理解的。

### 1、喜悅情緒的展現

拉夫列茨基很晚才回家，他衣服也沒有脫，一手捂著眼睛，久久地呆坐著，沈醉在她的魅力之中。他覺得，直到現在，他才懂得生活的價值；他一切的打算和願望，這一切的胡思亂想，霎時間都消失了。……他感

到無比歡樂，他被幸福所陶醉；他像個孩子，完全沉湎在幸福之中……  
這個年輕的阿爾基德（即希臘神話中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也的確天真得  
像個孩子。（167 頁）

一位體格壯碩，外表十足威武的男子，內心卻是如孩子般害羞，做事畏縮，  
遇事會慌張失措的行為展現，缺乏沉穩的大將之風。讀者也難以期待他會有堅  
定毅力追求理想，排除萬難追求幸福的獨特表現。

## 2、害羞情緒的展現

當拉夫列茨基初次見到瓦爾瓦拉時，心中的悸動，內心的喜悅及羞怯，在  
屠格涅夫筆下生動地描繪著：

人為的堤終於崩潰了：他又是顫抖，又是心急如焚，……拉夫列茨基臉  
紅了，嘟嘟囔囔地說了什麼就溜掉了。他和自己的膽怯整整鬥爭了五天；  
到第六天上，年輕的巴斯達人穿上一身新制服，把自己完全交給米哈列  
維奇支配。（164 頁）

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害羞內向的男孩，面對心儀女孩的緊張情緒反映。但若  
是這位男孩已是一位二十多歲，該成為男人所表現的舉止，不免令人感受到他  
的畏縮。而這正是拉夫列茨基個性最真實的揭示，且當他正式拜訪瓦爾瓦拉家  
時，所透露出的緊張退縮，在作家筆下有更貼切描寫：

把他介紹給主人們的時候，這位斯巴達勇士不禁兩腿發軟。但是，他的  
膽怯感很快就消失了。（166 頁）

## 3、憤怒情緒的宣洩

當發現妻子的不忠行為後，滿腹的怒火讓拉夫列茨基在一剎那間的反映是：

腳下的地板好像風浪顛簸著船上的甲板在晃動。在同一瞬間，他叫喊，  
他嘆息，同時也哭了起來。……拉夫列茨基仍舊木立著，手裡緊捏著那

張致命的字條，茫然地望著地板；透過一陣黑色的旋風，他似乎看到一張張蒼白的臉；他的心痛苦地緊揪著，他覺得他在下沉，下沉，下沉……下面是無底的深淵。(172 頁)

在聽到妻子返家的聲響，拉夫列茨基渾身顫抖衝出去，「他感到，在這一剎那，他能把她撕個粉碎，把她打個半死，照庄稼漢那樣，親手把她掐死。」但這終歸只是心中的憤怒情緒反映罷了！拉夫列茨基選擇的表達方式是離家，選擇逃避，在街上遊蕩，隨意雇了一輛馬車，信步亂走，投宿到旅館去一個人憂傷，讓痛苦刺痛心扉。如文中所述「痛苦卻像鷹爪抓住小鳥似的，越來越深地扎進他的心裡」。屠格涅夫即使在描述主人公面對令人難堪的紅杏出牆的反映，仍是悶在心中的痛苦，而不是化爲外在的強烈言行表達。甚至在拉夫列茨基的心裡仍等待著、渴望妻子回信爲出軌的事情做出解釋，且常在心中思念妻子，願意不惜一切饒恕她，只爲再次聽到妻子的聲音。在此我們感受到的是拉夫列茨基內心的折磨，無力批判妻子的懦弱行爲，不堪稱爲有個性、有擔當的大丈夫，連他自己都爲心中的念頭感到慚愧。他的精神經受嚴重打擊，孑然一身，鬱鬱歸園，顯得缺少男子漢的氣概，主人公的孱弱在此更可窺見。

#### 4、憂愁情緒展現

「拉夫列茨基微微皺了皺眉頭」(145 頁)

「一種半是憂愁，半是嘲笑的表情在他的臉上掠過。」(202 頁)

「我同她談話，好像我並不是一個萬念俱灰的人」他想到。(203 頁)

「拉夫列茨基坐在一張圈椅上，臂肘撐在膝上，把臉埋在手裡。老婦人站在他面前，偶而默默地撫摩他的頭髮。」(147 頁)

這些封閉性的肢體動作，顯示主人公是位自我防衛心重的人。讀者見到主人公憂愁的情緒反映，面部表情仍是隱約的、含蓄的，具有內省性的自我內心對話，讓主人公將情緒壓抑於心中，不善於表露，像個孩兒等待安慰，從他人的撫慰獲得自信。

再一次愛情幸福從他身邊飄遠時，拉夫列茨基感到心中撕裂痛，憤怒、失望交織胸中，也再一次他選擇逃避，逃到城市中漫無目的走著：

他的心碎了，在他的空空的、好像昏昏沉沉的頭腦裡，週而復始地縈繞著同樣陰暗的、荒謬的、毒恨的念頭。『她還活著，她在這兒，』他低語著，心中的驚異也隨之遽增。他覺得他已經失去了麗莎。憤怒使他窒息；這個打擊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236 頁)

從小說中作家對拉夫列茨基形象的塑造，突顯了主人公矛盾的形象，主人公魁梧健壯的體態卻暗藏一顆羞怯的心，在喜怒哀樂情緒中也表現了畏縮性格。從這樣的形象中，讀者更易理解主人公充滿遠大抱負，卻行動力不足的矛盾行爲。

## 二、在性格表現方面

屠格涅夫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多餘人」系列作品中，凸顯出多餘人內心不平衡性、內省、優柔寡斷的性格。多餘人的特徵是頗有教養、博學多識、富於理想、能以熱情洋溢的語言啓迪人們。他們對農奴制和專制統治感到壓抑和不滿，不屑與貴族上流社會同流合污，但由於脫離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不能真正擺脫貴族的立場，對於未來的生活前景雖然充滿新的嚮往，但又缺乏實踐的勇氣。

### (一) 教養良好且博學多識

在幼年時，拉夫列茨基的啓蒙教育由三位老處女負責，枯燥乏味的學習內容，使得「一些奇怪的、同樣陰暗的思想也紛紛聚集在孩子的頭腦裡」。直到父親帶著滿腹西式教育理念歸國，對費佳的教育進行「根本的改革」，他立志將孩子教育成一個人，且「不僅僅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斯巴達人」，教導拉夫列茨基的知識是：「自然科學、國際法、數學、木工（是按照盧梭的主張）；還有紋章學，是爲了培養騎士的尚武思想感情，——這些就是這個未來的『人』必須學習的課程。」(160 頁) 這些父親認爲必備的教育，鍛鍊他具強健體魄，卻有所不足。成年後的拉夫列茨基意識到自己教育的缺陷，努力進莫斯科大學追



求學問，雖然後來因妻子瓦爾瓦拉中途放棄學業，過著奢華的貴族生活，但他仍秉持學習的熱忱，「重新拾起他認為是未完成的學業，又開始讀書，甚至著手學英語。」他也讀報吸收新知識，到巴黎大學及法蘭西學院聽課，並「留意議會裡的辯論，著手翻譯有關水利的學術名著。」從拉夫列茨基的學習歷程，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對當時貴族知識青年的影響，他吸收最新的知識，比起多數文盲的平民百姓，博學多識擴大他的視野，讓他對自己國家與進步中的歐洲世界的差距有更深的體悟。這樣的學識基礎，理當對國家的進步貢獻良多，但種種因素的限制，使得這些知識青年成了無用之人。或許如米哈列維奇所批評：

你們這批傢伙……都是些博學的懶漢。你們知道德國人的缺點，知道英國人和法國人有哪些地方不行，——於是，你們的可憐知識就來幫你們的忙，證明你們的可恥的懶惰，你們的可惡的遊手好閒是正確的。（197頁）

拉夫列茨基對人謙恭有禮，完全符合貴族儀態，即使與潘申激烈的爭辯，仍保持良好風度，對照出潘申的庸俗。

潘申激憤地、尖銳地反駁他，聲稱有識之士應該改造一切，最後，他竟忘了自己侍從官的身份和遠大的前程，狂妄地稱拉夫列茨基是一個落後的保守主義者，甚至暗示拉夫列茨基的社會地位是虛假的。拉夫列茨基沒有生氣，也沒有提高嗓門，——只是沈著地把潘申的論點逐一擊破。（222頁）

針對拉夫列茨基的教養過程而言，他的確是當代的菁英份子，擁有進步的學術，學習歐洲最紳士的儀態，言行舉止中規中矩，可說是社會新世代的典範。

## （二）薄弱的意志力

敏感、自省、自卑、憂鬱是多餘人的基本心理特徵。拉夫列茨基對事業和人生計畫的敏感，對社會現實的憂慮，對自己精神上弱點的剖析和自省，以及伴隨著挫折而來的自卑，都表現出多餘人脆弱、內向的性格特點。

一八〇七年費奧多爾（即拉夫列茨基）出生：母親是婢女，在高攀的婚姻下學會忍氣吞聲，連孩子費佳的教育都無法插手。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入侵時，父親終於返回俄國，幾乎完全西方作風的父親，對費奧多爾實行斯巴達式的教育，直到父親死後，年輕拉夫列茨基終於獲得自由。在父親匪夷所思教育下，拉夫列茨基成了一位「頭腦清楚、健全，雖然有些遲鈍，性情偏於固執，喜歡沈思和疏懶」的青年，他善於自我省察，知道自己太拘謹，「意識到自己受的教育有缺陷，立志要盡可能彌補過去的不足」。但長久軍事教育下成長的他，被迫生活在人為的孤獨之中，失去運用意志、自由行動能力，當「禁錮的魔法圈拆除時，他卻依然站在原地不動，心無旁騖，與世隔絕」。儘管他願意放下身段，不在乎他人議論，在二十三歲高齡時穿上大學生的制服，追求學問。但為了與瓦爾瓦拉結婚，他輕易地離開大學、放棄當初追求知識的熱忱，在理想追尋上的熱情都可以因為感情輕易放棄，可看出他對自我的生涯追求意志力是薄弱的。拉夫列茨基不喜歡閒散的生活，期望自己生活充實，有一番作為，但性格上的薄弱意志，讓他在面臨生活方式的改變上的抉擇時，顯出猶疑不決的態度，一方面他期望生活地積極有意義，能有所作為；但另一方面，對於從事生產，實際加入職場行列，他卻踟躕不前。在文本中，妻子瓦爾瓦拉希望他去供職，拉夫列茨基顯得意興闌珊：

「瓦爾瓦拉·帕夫洛夫娜好像燈焰吸引飛蛾那樣吸引著賓客。費奧多爾·伊萬內奇並不太喜歡這種閒散的生活。妻子勸他出去供職，他想起父親過去的情景，也出於自身的考慮，不願意去，只是為了取悅於妻子，仍舊留在彼得堡。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並沒有人妨礙他過清靜孤獨的生活，他的書房在全彼得堡堪稱是最清靜、最舒適的書房，他的體貼入微的妻子甚至樂於促使他過孤獨的生活。」（169頁）

擁有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符合進步知識份子的典型，卻在生活中處處可見其懦弱的一面，對於心中的理想，他可以輕易放棄；對於未來的目標，他猶疑不決。社會期待他能發揮所長，對人民有貢獻，但薄弱的意志力，成為推動他行動的阻力，造成他一輩子是「多餘」的。

### (三) 敏銳的自省能力

「多餘人」的意志力弱，對心理的自我認同低，自信心不足，從另一角度看，對自我尊嚴要求高，對自我尊嚴的竭力維護，勢必要求多餘人保持人的尊嚴的高貴和純潔，一旦這種高貴和純潔由於環境條件或自身原因遭到損害時，他們即自我省察來自我防衛。自我省察在多餘人身上往往以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形式出現，自尊意識要求對自我肯定，要求給予自我信心和力量，自我肯定與自我否定出現矛盾。而自我省察是多餘人發現自我、維護自我、修善自我的矛盾過程，是多餘人感受內心世界，進行精神生活的方式和途徑。<sup>20</sup>如作家在小說中所描寫的：

他生來不是一個有了痛苦不能自拔的人；他的健康的天性佔了上風。許多事情他都明白了；他覺得，使他極端震驚的那個打擊，也並非不可預料；他已經瞭解他妻子的為人了，——對親近的人，只有在和他分開以後才能充分瞭解。他又能夠學習和工作了，雖然遠不及以前那樣熱心；他的生活閱歷和教育給他養成懷疑主義，完全深入了他的心靈。他變得對一切都極其冷漠。(174 頁)

拉夫列茨基在遭受妻子不忠的打擊後，能振作起來，恢復正常的生活，表面上看來，他具有良好的挫折容忍力，能從失敗中站起來，但仔細深究，在一切恢復原狀的同時，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心中對生活、尤其是感情是充滿否定的。因為傷害讓他學會以否定來拒絕再次受挫折，這樣的結論是他自我省察的結果，而封閉心靈是維護自我尊嚴最好的防護罩。

拉夫列茨基不是完全消極的，在遭遇困難後，雖然消沈失意，但很快地，他能再尋找人生目標，也許沒有實地執行，在腦中卻是扎扎实实地督促自己一番。在個人意識中，他具有敏銳的自省能力，對自我尊嚴的維護以內心對話方式重建信心，在心深處一次次對自己勉勵，「好吧，我們還要生活下去，」他想到，「我們還沒有完全被毀掉。」督促自己不可被命運打倒、不能就此認輸。在內心的交戰之後，拉夫列茨基會為未來的道路做下結論，他應該將心思奉獻於事業中，不可因女人而被擊垮。

<sup>20</sup> 見孫慶紅：〈談多餘人的性格矛盾〉，《中文自學指導》第 12 期，1987 年，頁 17。

「到了三十五歲我還沒有別的事可幹，還要去把自己的心交到一個女人手裡嗎？」(217 頁)

又第二次與麗莎的感情，因妻子瓦爾瓦拉的不期而至又失去幸福。

拉夫列茨基想：「我就此不能自拔，為了這點……值不得一提的小事就垮了嗎？難道說，我真是個無用的孩子？……我要咬緊牙關，幹我的事業，強迫自己沈默；好在我又不是第一次使自己振作起來。我為什麼要逃避，我幹麼要坐在這裡，像鴛鴦似的把腦袋鑽在灌木叢裡？不敢正視不幸——」(256 頁)

在這樣的性格展現中，讀者見到了拉夫列茨基屬於多餘人的消極及積極個性，拉夫列茨基是貴族中較早覺醒的知識份子，相較於文中麗莎母親的傳統貴族尊貴生活、潘申汲汲營營餘個人功名利祿追求，他具有教養良好、博學多識卻能為農民百姓著想，心懷關注社會的態度，時時自我檢討的謙虛精神，雖然薄弱的意志力令他做事躊躇不前，常是言論多於行動，但筆者認為拉夫列茨基的形象在小說中及一系列多餘人性格中仍具有其積極進步性。

### 三、在個人理想的追尋方面

多餘人特徵是：「他們都是貴族出身，有一定文化素養，都懷著對現狀不滿，又無法擺脫困境，尋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儘管他們頭腦清晰，精力充沛，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但他們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在現實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感到鬱悶、孤獨、壓抑，患上憂鬱症。」<sup>21</sup>《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具有改革社會的理想，在胸中懷抱理想，在口中談論改革，在腦中汲取知識，卻在行動中缺乏堅持到底的力量，一生追求的莊園改革，雖稍有成就，卻在愛情上失敗、事業未竟全功，對年華逝去僅能徒呼感嘆。

<sup>21</sup> 王蕊：〈多餘人的悲劇成因及其社會意義〉，《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0 年 7 月，頁 22。

### （一）進步的改革社會態度

拉夫列茨基的新式教育中，接觸到歐洲進步的知識，啓發智慧，他想當個善良的地主、參加勞動、改善農民生活，鑽研農業科學，包括研究灌溉系統，也正因此他力求「著手幹一番事業」，「耕種土地」。他維護俄國發展的獨立性，號召人民認識與熱愛祖國的土地，在思想上是個斯拉夫派，對潘申的西歐派理論中的世界主義極端進行尖銳的批評。

「當潘申問拉夫列茨基：『您已經回到俄國來啦——您打算幹點兒什麼呢？』的時候，拉夫列茨基驕傲地回答說：『耕種土地，把土地盡可能耕種得更好一點。』」（223 頁）

幼兒時期姑媽的教養，青年期父親鐵的教育，自幼在他人規劃下生活的拉夫列茨基，已習慣由別人安排妥當的生活。結婚後，妻子瓦爾瓦拉為自己安排多采多姿的生活外，也不忘為丈夫安插一個悠適恬雅的生活空間，讓他樂於安穩生活中，拉夫列茨基頗能自得其樂，在自己世界中追求知識規劃未來。

至於費奧多爾·伊萬內奇，他也並不感到無聊，儘管有時他感到肩上的生活變得沉重起來——沉重，是因為它空虛。他讀報，到 Sorbonne（泛指巴黎大學）和 College de France（法語：法蘭西學院）去聽課，留意議會裡的辯論，還動手翻譯有關水利的學術名著。「我並沒有虛度光陰」他想，「這一切都有用；但是來年冬天我一定要回俄國，著手我的事業了。」很難說，他是否明確意識到，這件事業究竟是什麼；天曉得，來年冬天他能否回到俄國；目前，他要和妻子同往巴登—巴登（德國著名的礦泉療養地）……不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把他的整個計畫全給打破了。（177 頁）

在俄國未來將要選擇什麼道路的問題上，拉夫列茨基的觀點代表這一時期先進貴族革命家的正確看法。在和貴族階級中的西歐派辯論俄國的前途時，他毫不猶豫地為新人辯護，為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觀點辯護，把代表官員宣揚西

歐派觀點的潘申「抨擊得體無完膚」，表達拉夫列茨基深沈的愛國心和對自己人民光明未來的期待。

「拉夫列茨基維護俄國的青年一代和俄羅斯的獨立性。他情願犧牲自己，犧牲自己的一代而去保護新人，保護她們的信念和願望。」<sup>22</sup>「如果不真正地了解祖國，沒有對理想（哪怕是消極的理想）的真正信仰，那麼，躍進和居高臨下的改造是不可能的；他以親身所受的教育為例，要求首先要承認人民當中有真理，對這真理，必須抱有虛懷若谷的態度，如果沒有這種虛心的態度，即使有反對虛偽的勇氣也不成。」（222 頁）

潘申從攻訐青年一代開始，攻擊俄國的一切。這使得拉夫列茨基義憤填膺，與西歐派爭論中，他既否定農奴制，又捍衛俄羅斯優秀文化傳統。儘管父親的教育目的在讓他學習西歐的一切，隔絕俄國的文化；妻子瓦爾瓦拉讓他遠離祖國，消磨了他的意志、堅定的目的性及積極性，他仍未失去愛國之心。他對祖國人民的熱烈情感是在母親和僕人的影響下逐漸建立的，母親使他同人民血肉相連，從小生活的環境便同人民息息相關，因而他熱愛祖國。他不認同破壞整個制度的激烈改革，贊同以人民生活為起點逐漸加以改變，他關注人民生活，是貴族中較清醒的。俄國學者沙塔洛夫認為「文學中的英雄不只是一理想理想的化身，而且也是生活中社會典型的反映。」他認為，凡是那些對當時的社會制度起動搖作用，對人民改革有推動作用的人，都可以稱作英雄。根據這樣的觀點，拉夫列茨基進步的社會改革見解堪稱為「四十年代的英雄」。<sup>22</sup>雖然拉夫列茨基是好人，但這都避免不了悲劇的下場：事業上一無所就。

## （二）一事無成的理想追尋

屠格涅夫認為：貴族階級能夠提供的最優秀的正面典型，具高貴的性格，優良的實幹家和清醒理智的人物——便是拉夫列茨基。但這個人物歸根究柢地一事無成，只能徒勞地向未來的青年嘆息。年輕時，他如一般大丈夫懷有雄心萬丈的理想情懷，在外國追求的學問，在他胸中燃起光芒。

<sup>22</sup> 轉引自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頁90。

「拉夫列茨基忽然竟會想起羅伯特·庇爾（羅伯特·庇爾（1788—1850），英國政治家，一八四一至一八四六年任英國首相。）……想起法國歷史……想起假如他身為將軍，他會怎樣打個勝仗：他耳邊彷彿聽到槍聲和吶喊。」（180 頁）

回到莊園後的寧靜生活，讓具有內省能力的拉夫列茨基感受強烈的家鄉之愛，他看自己的莊園，遙想著經歷的情感挫敗，令他心痛如「沉到河的最底層」般的封鎖，只能順應命運的安排。畢竟他是受到軍事教育磨練的青年，受過西式教育的進步知識份子，很快地，拉夫列茨基振奮起來，看到農奴制統治下的俄國農村凋弊淒慘的景象，他深以為苦，於是矢志重整莊園，覺察到自己對這一大片莊園，該有一番作為。

拉夫列茨基又想「這裡的生活永遠是，任何時候都是這麼平靜悠閒，」他想，「誰進入它的圈子，就得順從它：在這裡，不用激動，不必苦惱；在這裡，只要像種田人犁地那樣，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就成。在這四周，有這怎樣的力量，在這無所作為的寂靜中，蘊藏著多麼健康的生命！……而為了一個女人的愛，我卻耗費了我最好的歲月」拉夫列茨基繼續想道，「但願這裡的寂寞能使我清醒，使我安下心來，鍛鍊我，使我也能不慌不忙地幹點事」於是，他又開始聆聽著那片寂靜，並不期待什麼——同時又好像在不斷地有所期待：寂靜從四面永抱著他，太陽在平靜的藍天靜靜地滑過，……好像它們知道要飄往何處，去做什麼。就在這同一時刻，在世界上其它的地方，生活在沸騰，在急急忙忙地前進，在熱火朝天；而在這裡，同樣的生活卻無聲地流過，向水流過沼澤裡的水草。（185 頁）

拉夫列茨基雖具有各種優秀品質，卻找不到自己的天職何在，他執行著事業計畫，「他勤邁地專一地料理田莊的事務」，最初也曾稍見成效。但受限於貴族身份的限制，改革莊園的理想未能如願成功，主要因為他一不會幹活，二不瞭解農民，未能做有效實際的建設計畫，改革終將無成。和米哈列維奇的一番對話，正凸顯他的改革將徒勞無功。

拉夫列茨基說「這證明，我從小就被扭曲了。」「那你就把自己糾正過來！這才不愧是個人，是個堂堂的男子漢；你有的是精力嘛！不管怎麼說，把一個所謂的個別事件提高成為一般的規律，成為確定不變的規矩，——那怎麼行，怎麼可以容許呢？」「你是個利己主義者，沒錯！」「你只要自我享樂，你希望生活幸福，你只想為自己生活……」「結果一切都欺騙了你，你腳底下的一切都崩潰了。」「……因為你沒有信念，沒有溫暖的心；你只有智力，只有不值一文錢的智力……你不過是個可憐的、落後的伏爾泰信徒。」（197頁）

屠格涅夫藉有民主情緒的米哈列維奇的口譴責拉夫列茨基的薄弱、毫無作為和他的懶惰習性。拉夫列茨基沒有在自己身上找到意志與力量來和教育他的環境決裂，他沒有向貴族農奴制社會挑戰，而是聽從於自己的命運。年僅四十五歲，便已經覺得衰老不堪，準備退出人生舞台。

拉夫列茨基是在貴族地主環境成長的溫室花朵，在封建狀態中，只靠祖先庇蔭，過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寄生生活，作為俄國貴族先進知識份子，但缺乏積極奮鬥的心，在表相上，他從小接受父親西化的教育、哲學思想的薰陶，也熱中於追求知識，但在強硬的教導方式，讓他在不安全、沒有尊嚴的環境下成長，縱有新式教育進步的行動，但在本質上，他是宿命而缺乏積極進取的心。他是孤獨的、毫無成就的，不能把群眾引導到任何地方去，因為他自己哪裡也不去，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實踐，感到自己無論在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或是個人的幸福問題上都是無能為力的，成了一個「不需要的人」，並沒有實現「把土地盡可能耕種得更好」的理想。「熄滅了吧，無益的一生」，在拉夫列茨基無可奈何的悲嘆聲中，我們看到貴族階級的黃金時代已經逝去這一歷史事實。

他的確已經不再去考慮個人的幸福和利己的目的。他已經心如止水……他不但身體和面貌衰老，他的心靈也老了；……一個人如果到老還不失去對善的信仰，不失去始終如一的毅力以及對事業的愛好。（278頁）

他的農事改革一無所成，只有徒嘆晚年的突然降臨，哀嘆時光的空逝。屠



格涅夫清楚地看到，拉夫列茨基是一個「雖然活著，卻已經退出人生戰場的人」。

《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儘管擁有各項吸引人的特質，卻在一生中找不到自己的天職何在，沒有運用才能真正為人民帶來益處，甚至連自己的幸福也成泡影，生命中一事無成。在社會上找不到可以獻身的事業，在個人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適當位置，得不到真正的愛情。正如屠格涅夫所說：「唯有卓越挺拔的人物才能夠不僅把自己的思想、見解和內容而且把他們的形式，把自己的人格流傳給後代。平凡人卻注定要湮沒在整體中。」<sup>23</sup>對於傑出的、高貴的、聰明的貴族知識份子，成了社會中多餘人的悲劇命運，充滿惋惜之情。

#### 四、在愛情的追求方面

愛情在屠格涅夫大部分小說的情節中佔有重要地位。屠格涅夫認為：愛情最能反映出一個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面貌，所以他常常把自己的主人公置於愛情的衝突之中。他的小說的愛情主題不是游離於社會生活之外，而是具深刻的社會內容。情愛與性格的矛盾衝突，是屠格涅夫對於「多餘人」形象描寫的另一種手法，愛情中充滿無限惆悵、嘆息、悲愁，在這些愛情故事裡，愛情是考驗人物意志力的界標，是對人物道德情操、生活信念和政治態度的考驗，流洩出作者對人物命運的關注。

##### （一）不健全的愛情觀

追根究柢在父親對女性蔑視的家庭教育下，造成拉夫列茨基「他不善於與人交往：已經二十三歲的人，一顆害羞的心理懷著對愛情不可遏制的渴慕，卻還不敢對任何一個女性正視一眼。」（163 頁）這樣的渴望使他對愛情的真義是不瞭解的，一旦遇到手腕好的女性，追求純潔的愛情，就容易迷失在愛的漩渦中，在愛情煉獄裡屢屢慘敗。從他見到瓦爾瓦拉之後心中的悸動，可看出他意志力是脆弱的，為了感情可以犧牲追求的學問，這樣的愛情終將是一場悲劇。

<sup>23</sup> 轉引自王湘：〈試析多餘人奧涅金和畢巧林的形象特徵〉，《長春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4 期，2002 年 8 月，頁 89。

拉夫列茨基很晚才回家，他衣服也沒有脫，一手捂著眼睛，久久地呆坐著。沈醉在她的魅力之中。他覺得，直到現在，他才懂得生活的價值；他一切的打算和志願，這一切的胡思亂想，剎時間都消失了。他的整顆心靈都融成一種感情，一種願望——嚮往著幸福、佔有、愛情，女性的甜蜜的爱情。(167頁)

對於異性的不了解，肇因於不完備的教育，形成不健全的愛情觀，無怪乎在情感世界中屢遭敗果，對人生愈加絕望，拉夫列茨基在經歷婚姻失敗後，對於愛情的永恆、幸福婚姻的嚮往產生懷疑。拉夫列茨基回到俄國後，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的關係，對於人類的愛情和個人生活的幸福已完全喪失信心。他對麗莎說：「願上帝保佑您締結更幸福的婚姻！但是請相信，什麼事都不能十拿九穩的」顯示出主人公有教養卻缺乏性格力量，充滿內心矛盾而不能自拔，總在一堆亂麻似的情感天地裡兜圈子，心中渴望人生的幸福，卻往往因缺乏決斷力和行動的勇氣，最後總是以自己退卻和無盡的悔恨告終。

## （二）畏縮退怯的愛情態度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愛情是區分人物性格，考驗人物意志力的指標。小說中各種不同人物對愛情的不同態度，不僅顯示出不同的感情世界，也是人物道德、生活信念和政治態度的總考驗。如此看來，作家筆下的愛情描寫，絕不是為愛情而愛情。他所寫得愛情是人生中的一個局部內容，是透過愛情而揭示人物的人生觀。《貴族之家》中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孱弱的性格及不健全的愛情觀，造成他在和手腕高明的瓦爾瓦拉愛情中，遭受出軌的婚姻打擊；在和純潔麗莎的愛情中，失去追求幸福的魄力，以致一生連愛情都是場悲劇。要剖析小說中主人公的愛情態度，要從主要的愛情角色：拉夫列茨基、麗莎、瓦爾瓦拉三人，對於愛情的不同態度來解析其性格，揭示其畏縮退卻的愛情態度，以愛情來對拉夫列茨基進行考驗。

### 1、勇於犧牲的麗莎反襯出畏縮逃避的拉夫列茨基

在西方追求自由思想的影響下，俄國國內漸漸地對於女性地位作了一番省思與改變。學者劉石克對屠格涅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徵作了研究，將其性格歸納為：第一，她們一生的旅途，完全是為戀愛與犧牲所織成；其次，她們還富有力量，甚至屢屢有著不屈不撓的意志；第三，屠氏的女性，比男性富有預感性，富於未來的憧憬，她們常站在男性的前頭；第四，有最深遠的意義的是她們具有能作為文化母胎的資格。<sup>24</sup>

屠格涅夫說：「光輝的未來是屬於把婦女不但擺到和男子同樣的地位，而且擺得還要高於男子地位的人民。」<sup>25</sup>他的這一觀點，反映在他的創作中，塑造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生動感人的婦女形象。杜勃羅留波夫指出：屠格涅夫「是純潔的、理想的女性之愛的歌唱家」<sup>26</sup>他筆下少女的愛情，在動人的樂章中蘊藏社會問題，在多餘人形象小說中，勇敢、堅定的婦女的愛情往往是對主人公的考驗。愛情並未讓女主角陷入狹隘的個人小天地中，而是打開她的心扉，展現新的前景，使女主角在面對愛情考驗時，忠於自己的感受，從而反映出人物性格特徵，透過她對待愛情的態度來刻畫她的性格。

《貴族之家》中的女主角麗莎正體現出這樣的形象，她是一位秀麗端莊、情意真摯、有著深刻道德感的姑娘，她對自己的行為勇於承擔道德責任，寧可隱忍也不肯刺傷別人的心。德·伊·皮沙烈夫稱之為「屠格涅夫創造的完美絕倫的婦女個性之一」<sup>27</sup>如同拉夫列茨基所說：麗莎給人的印象就是位「純潔的姑娘」「是一個正直的、嚴肅的姑娘，有著崇高的感情」順從的性格，應當擁有真正的愛情。

<sup>24</sup>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第一版，1988年12月，頁122。

<sup>25</sup> 未名：〈屠格涅夫長篇小說中的幾個婦女形象〉，《文科教學》第4期，1981年，頁50。

<sup>26</sup> 陸肇明：〈試論屠格涅夫筆下少女形象的理想化〉，《蘇州大學學報》第一期，1984年，頁53。

<sup>27</sup> 轉引自亞·費·扎哈爾金：〈貴族之家〉高文風編譯：《屠格涅夫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99。

麗莎的特點，在於她的愛情不僅細膩、熱烈，且表現為一種巨大而純潔的道德愛情，使她對拉夫列茨基的愛情注入特殊動人的光彩。麗莎從小便受到乳娘傳統宗教道德的薰陶，使她成了一個虔誠的信徒。她認為，宗教道德是人類美德的源泉，而她的感情也被這種宗教理想所滲透，有著一種巨大的道德力量，在小說中屠格涅夫詳細地展示愛情在麗莎心中的發展過程。從與拉夫列茨基相遇，麗莎心中勾勒出幸福愛情的模型，內心相當躊躇矛盾，瓦爾瓦拉的死訊未傳來時，她深深鄙薄自己內心的感情，在她看來當瓦爾瓦拉還活著的時候，有了愛的感情就是罪過，它是不符合道德規範的；就是當聽到瓦爾瓦拉的死訊後，她還是處於猶疑之中把自己的感情深藏著，可是在拉夫列茨基火熱的愛情面前，她終於拋開一切顧慮，以一位少女特有的感情深深地愛上拉夫列茨基，那是一種「忠誠的、認真的、一片癡情的、終生不渝地愛他，——不怕任何威脅；她感到，任何暴力都不能摧毀這牢牢的愛情之結」（242 頁）。她愛得那麼熱烈真摯，就連十分瞭解她的姑媽也感到萬分驚訝。顯示麗莎同所有女性一樣，期待幸福甜蜜的愛情，愛情世界中的嫉妒、佔有與犧牲的心理，深深烙印她心中，這有她真摯熱情一面，也包含她堅定勇敢的氣魄。

但當她得知拉夫列茨基的妻子瓦爾瓦拉的死訊是虛傳的時候，麗莎便立刻冷靜地面對這一事實，她澆熄心中燃起的愛情火焰，用極大力量痛苦地壓抑對拉夫列茨基的愛情，拒絕個人的幸福，表明了她純潔、無私的情感，及對其他人負責的高尚道德。放棄自己的幸福，但她的心中備受煎熬，念念不忘拉夫列茨基，心中矛盾在翻騰著：在讀了拉夫列茨基的字條後，她受到極大震撼：

她的的命運的突如其來的變化徹底震撼了她；在大約兩個小時裡，她的臉就消瘦下來，然而她卻沒有流下一滴眼淚。「我這是罪有應得」她對自己說，費力地、激動地壓制著內心一陣陣辛酸的、使她自己為之吃驚的兇狠的衝動。（245 頁）

麗莎心中追求幸福與遵從道德規範的心理站在心中拉距著：

她十分痛苦，「她感到一種異樣的麻木，一個被判了刑的犯人的麻木狀態」當她和拉夫列茨基談到他妻子時，「眼睛裡流露出來的既不是痛苦，也不

是驚慌：眼睛似乎變小了，黯淡了。她的臉是蒼白的，微張的嘴唇也沒有血色。」麗莎懇求拉夫列茨基和妻子和解：「我們倆人都要履行自己的義務。您，費奧多爾·伊萬內奇，應該跟您的妻子和解。」「幸福是由不得我們，而是由上帝作主的。」（260 頁）

麗莎深信，她的義務在退居一旁，不妨礙合法夫妻享受幸福的權利，因為他們的結合是上帝的旨意，不該由他人任意分開。她認為愛情是美好的，婚姻是上帝的恩賜、是神聖的，不可隨意違抗，只有遵循道德規範，有上帝祝福的愛情才有幸福未來。在個人幸福和宗教義務發生衝突時，她就放棄前者，深信違反上帝旨意的愛情會遭到不幸的惡果。婚姻是「上帝結合在一起的，怎麼可以拆開呢？」即使婚姻不幸福也只能「聽天由命」。對於麗莎來說，失去愛情的痛苦也許更深一些，在她一生只有一次的這種聖潔的神秘的感情剛剛在心中萌發的時候，卻遭受到無情的打擊，她不能不隱忍著痛苦，葬送自己的青春，到修道院去過麻木的沒有感情的生活。麗莎遁入空門這一選擇表面看來是消極的、走投無路的一步，卻有力地表明她忠於自己信念而做出的巨大犧牲，表現她高尚道德情懷，卻使人感到深深的痛惜。<sup>28</sup>也讓人看到在追求個人幸福與道德義務的衝突中，封建宗教意識影響力的強大。

小說中麗莎扮演一位突破傳統束縛的女性形象，也襯托出拉夫列茨基的畏縮。他沒有如麗莎般堅定意志力，不能突破社會風尚的限制，追求幸福；他沒有麗莎義無反顧的勇氣，選擇逃避來解決幸福與義務的矛盾。麗莎做為作家理想中的人物，她做了拉夫列茨基所做不到的，具備拉夫列茨基所缺少的，她在失望、痛苦之後保持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她的精神人格是高於拉夫列茨基的，她拋下母親及傳統的期待，拒絕潘申的求愛，不屈服於家長們門當戶對的安排，勇敢追求真摯的愛，追求自我的理想，她的愛情是大膽、熾烈、堅定的，而且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除了渴望個人的幸福，拉夫列茨基有什麼可以可以跟麗莎的自我犧牲精神相稱呢？屠格涅夫在《貴族之家》中給予熱情頌揚的就是麗莎這種富於自我犧牲和純潔的道德感的愛情。作為相對完美的典型，麗莎襯托出「多餘人」拉夫列茨基的侷限。

<sup>28</sup> 默語：〈優美而哀傷的歌——兼論屠格涅夫小說中的愛情主題〉，《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2期，2001年6月，頁34。

## 2、放蕩不羈的瓦爾瓦拉反襯出怯弱無能的拉夫列茨基

在塑造瓦爾瓦拉的形象上，屠格涅夫表現出巨大的寫作技巧。瓦爾瓦拉的形象象徵著當時多數貴族女性追求的虛榮生活，這樣西方化的社交模式，正是彼得一世大力西方化的產物。十八世紀彼得一世爲了建立文明的社會風尚，在生活方式方面的改革稱得上是大刀闊斧：除了提倡西歐的服飾、禮儀外，更創辦大舞會和翻譯宣傳《青年寶鑒》，要求十歲以上的貴婦均需毫無例外地出席舞會，否則將受到嚴厲懲治。<sup>29</sup>於是大批婦女走入社交場所，對上流社會影響頗巨。到了十九世紀，上至沙皇開始直至下屬官吏都把舉辦家庭舞會次數的多寡、招待名流等級高低和結識貴婦人多少作爲奢侈排場、晉升官職的階梯。這種社交文化之於女性，尤其是對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具有極強烈的吸引力，因爲貴族少女成人的標誌就是進入社交場，若能在社交場成爲眾所矚目的焦點，就意味在社交場的成功，表明她已被社會認可和接納，從而爲自己的婚姻鋪就一條錦繡的前程。<sup>30</sup>

雖然小說中對這個人物著墨不多，我們仍能活生生地想像到這個性格冷酷、腐化墮落的女人形象。瓦爾瓦拉有著俏麗的美貌，且打扮入時，妖嬌動人，但卻有著一顆虛榮、追求自己享樂的心靈，她一生除了追求享受，尋歡作樂以外別無任何其它理想，讀者對她不由產生輕蔑，甚至嫌惡之感。<sup>31</sup>美麗非凡的外貌，讓她具有吸引異性的原始本錢，她也能迎合社交場合，成爲人群中的焦點，招來異性目光，愛情對她而言是交換物質生活的交易品，她洋洋得意招了金龜婿，即使委屈自己展現賢淑體貼一面，也樂於從事。她懂得享受生活，具「很高的審美能力，非常愛舒適，且極有本領爲自己取得這種舒適」（168頁）即使到了國外，她能很快融入當地生活，爲自己及家人安排最符合時尚的生活模式，爲自己張羅多采多姿的交際。甚至背著丈夫拉夫列茨基勾搭另一男人，在東窗事發後，以悲情的低姿態爲自己辯白：

她只希望能見他一面，求他對她不要這樣絕情。信寫得冷淡勉強，雖然

<sup>29</sup> 轉引自謝季君：《安娜·卡列妮娜》女性形象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45。  
卡芬加烏茲·巴甫連柯主編：《彼得一世改革》，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冊頁6-26，下冊頁263。

<sup>30</sup> 同上註。

<sup>31</sup> 亞·費·扎哈爾金：〈貴族之家〉《屠格涅夫論》，頁206。

有的地方可以看出淚痕斑斑（174 頁）

這樣的裝腔作勢並沒有持續多久，婚姻對她僅是「享樂生活」的保障，有了拉夫列茨基的贍養費，伴侶對她而言是不乏人選的。很快地，她成了一隻異國的花蝴蝶，且「聲名遠播」。

她開始醜聲遠播，鬧得越來越不像話。最後，所有的雜誌都登載了一個悲喜劇式的故事，鬧得沸沸揚揚，他的妻子在那裡面扮演了一個令人不齒的角色。一切都完了：瓦爾瓦拉·帕夫洛夫娜成了「名人」（174 頁）

一場大病後，盛傳瓦爾瓦拉的死訊，拉夫列茨基甚至像「烏鴉等待喝血似地等待妻子確實的死訊」，以開啓人生另一段幸福美景。但瓦爾瓦拉卻似脫胎換骨地厚顏無恥回到故鄉祈求丈夫的原諒，痛責自己的過錯，以孩子為籌碼，運用親情攻勢來博取同情，卑躬屈膝取得原諒，換取她重新獲得生活保障的目的，大言不慚地說「我的心永遠屬於俄國，我沒有忘記過自己的祖國。」但拉夫列茨基對她已心灰意冷，不願信任、接受她，甚至出言嘲諷她「您是個聰明人，——沒有目的的事情您是不會做的……您還希望在大伙的心目中恢復自己的地位……」。（256 頁）

瓦爾瓦拉是一位敢愛敢恨、勇於追求、個性潑辣的女性形象，她使出渾身解數展現個人魅力，為達到目的，即使在愛情中俯首認錯，遭冷嘲熱諷，她仍義無反顧；就算情分不再、幸福不存，只要能達到目的，取回享有高級生活的保障，她就心滿意足。她的聰明和美貌被不適當地運用到獵取獵物、以遂己欲的卑俗慾望中，這樣反面的婦女形象，讓讀者對她不由產生輕蔑，甚至嫌惡之感。她丟盡俄羅斯古典文化修養，在西歐的花花世界滾得一身銅臭，毫無禁忌地縱欲和享樂。但相較起拉夫列茨基放棄渴求的愛情幸福，逃離不如意的環境，瓦爾瓦拉更具積極追求生活、達到自我人生理想的動力，即使她的價值不是一般人認同的。比起消極逃避的愛情，輕言放棄幸福的主人公來說，瓦爾瓦拉的勇於追求實不失為一位具個人風格的女性，摒棄他人的眼光，活出自己生命的價值。

### （三）一無所有的愛情悲劇

屠格涅夫通常藉助愛情波折來考驗自己主人公的意志力的。男主人在愛情上的怯懦也是他在社會上政治上軟弱性表現，因此屠格涅夫筆下的男主人往往不僅是社會上的失敗者，也是戀愛中的失敗者。拉夫列茨基和麗莎純潔和高尚的愛情，包含無限詩意，一方是拉夫列茨基認真而嚴肅探求，另一方是麗莎真摯謹慎的傾心，這樣一段完美的愛情組合，理所當然應擁有美滿的果實，卻因男主角的屈就於義務，女主角的礙於宗教情懷而無疾而終。

麗莎的出現，使對愛情頹喪悲觀的拉夫列茨基重新振作起來，兩人樸實無華、不尚矯飾的性格，共同摯愛祖國、摯愛普通人的感情，吸引著這兩個忘年的友人，終於變成心照不宣的愛情。當拉夫列茨基瞭解到自己深愛著麗莎，且他們之間的相互瞭解與日遽增，他開始幻想個人幸福對自己來說還是存在著可能性的。沈寂的心再次活躍，感受到「還沒有完全被毀掉」「我還要生活下去」（205 頁）的新生力量。

麗莎跟那一個可不一樣：她不會要求我做出可恥的犧牲；她不會使我離開我的事業；她自己會鼓舞我去從事正直嚴肅的勞動，我們倆會一同前進，向著美好的目標前進。（217 頁）

瓦爾瓦拉的死訊鼓舞了他，使他對改變生活的可能性和同麗莎的幸福產生了希望，但知道妻子亡故的消息是虛傳後，瓦爾瓦拉不期而至回到俄國，虛情假意向拉夫列茨基懺悔，使他進退維谷：是選擇他個人同麗莎的幸福呢？還是選擇對妻子和孩子的義務呢？生活的規範摧毀他美麗的幻想，義務感、道德感約束著他們，畢竟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下，男人是一家之主，對於家庭有一份不可推卻的責任。杜勃羅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文中指出：「拉夫列茨基愛上了麗莎，這個人是純潔而高尚的，但她所受的教育卻使她認為對已婚人的愛情是一種可怕的罪過。這時，拉夫列茨基在客觀上已經處於難於自己作主的情況下。他之所以不能這樣做，不僅因為他感到自己在妻子面前負有道德



上的義務，而且還由於這意味著他違反他所愛戀的姑娘的觀點去破壞一切社會道德規範、傳統和法律。他不得不同這種令人悲傷但又不能改變的環境相妥協。」

<sup>32</sup>無怪乎他認為：「拉夫列茨基處境的戲劇性已經不是因為他和自己的無力做鬥爭，而是因為跟這樣的見解和風習起了衝突——跟這些見解和風習的鬥爭是可以把堅毅和勇敢的人都嚇退的。」<sup>33</sup>

小說中的愛情結局是極其不幸的。眼看拉夫列茨基與麗莎的情愛日漸滋長，巨大的幸福就要來臨，但就在這一刻，幸福卻崩塌了，就像是雨後的彩虹，僅僅只有令人心醉的幾分鐘。拉夫列茨基最終不得不為完成義務，回到他所憎惡的不忠於他的妻子那裡，過著沒有愛情和希望的生活，愛情的幸福最終成了幻影。使他不無悲戚地想到：「難道說，我真是個無用的孩子？終身幸福的可能性，我已經看在眼里，幾乎已經捉到手裡了——可是它卻忽然消失了；就像賭輸盤賭一樣」（256 頁）這是一個感到命運的捉弄的人發出的無可奈何的悲嘆。摧毀兩人對幸福的期許後，拉夫列茨基面對著命運的捉弄，只是嘆惋著：「我們本來可以多麼幸福啊！」完全聽任命運的擺佈，在愛情考驗面前懦弱無能，束手無策，毫無抗爭。而造成幸福毀滅的原因，正是軟弱的多餘人性格。溫順的人不會有報仇，他聽之任之，但他不可能遷就邪惡，也不會在精神上對邪惡做絲毫道義上的讓步。幸福對他終究是海市蜃樓，被風吹過或陽光一照便化為烏有。

拉夫列茨基愛情的悲劇正是教育的缺陷造成他沒有行動能力，在現實問題面前一籌莫展，所以愛情的失敗也是不足為奇的。溫文儒雅，善於高談闊論，不乏對對方的愛慕之情，但一到愛情的關鍵時刻，需要他們拿出勇氣，做出果敢的行動時，便馬上變得十分軟弱，沒有絲毫意志力，充分暴露他們軟弱的本質，總在愛情的面前退縮畏怯，使對方陷入痛苦的境地。<sup>34</sup>米哈列維奇為拉夫列茨基情感上的失敗找到理由，歸咎於「環境造成不讓他接近女人，所以一碰上

<sup>32</sup> 普斯托沃依特著 韓凌譯：《屠格涅夫評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9月，頁84。

<sup>33</sup> 轉引自曹靖華主編：《俄蘇文學史》，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337。

<sup>34</sup> 默語：〈優美而哀傷的歌——兼論屠格涅夫小說中的愛情主題〉，《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2期，2001年6月，頁34。

女人，不欺騙他才怪」，他認為拉夫列茨基的熱情受到阻礙。愛情中充滿著無限的惆悵、傷感、嘆息、悲愁，不幸的愛情故事，失敗的事業有其嚴肅的思想根源和思想基礎。一個人在愛情上的不幸總是與事業上的失敗緊密相連，愛情上的不幸結局與事業上的徒勞無功完全一致。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幽會中的俄羅斯人》曾把這種人稱為戲謔地稱為「意志薄弱的貴族羅蜜歐<sup>35</sup>」，他們在愛情中的這種意志薄弱、軟弱無能，同他們在事業上的無所作為必然是一脈相通的。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對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所評論的那樣：被俄羅斯庸俗環境所腐朽的多餘人「不慣於理解任何偉大而富有生氣的事物，因為他的生活太渺小淺薄，死氣沉沉，而他習慣了的一切關係和事物同樣的渺小淺薄，死氣沉沉」這樣，他看到凡是需要巨大的決心以及高尚的冒險精神的事情，他就膽怯了，一蹶不振地退走了，這又是因為，生活只訓練他去適應一切事物中那種沒有生氣的、渺小的東西。

### 第三節 與小說中其他人物比較

依據馬爾柯維奇以社會地位、心理狀態、文化教養為標準，將屠格涅夫長篇小說中人物分成幾個等級，可歸納出《貴族之家》中人物類型有：第一類舊時代的人：拉夫列茨基的僕人安東，這類人物清楚必須按照自己所處的地位、身份來生活、處世，在他的思想裡，「老爺」和「普通平民」是截然不同的，同時又是互相關係的。第二類是人性卑下的人：拉夫列茨基的妻子瓦爾瓦拉、潘申，利己主義是他們一切行為的基礎，過富貴榮華的生活就是他們的人生目的。第三類是人性較高尚的人：米哈列維奇，為人誠實、正派，沒有低級的情

<sup>35</sup> 陳大夫：〈又偉大，又孱弱——從《貴族之家》看屠格涅夫世界觀的矛盾〉，《松遼學刊》第4期，1983年，頁43。

感和舉止，鄙棄自私和虛榮，卑下人身上存在的那種生活目的和行為準則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起作用的。第四類是高級的人：這些人物一般都是屠格涅夫長篇小說中的男女主角，起著組織小說情節的作用。<sup>36</sup>他們既有理想又有追求，同社會的陳規陋習格格不入。拉夫列茨基及麗莎屬於這類型，這種類型在同社會環境發生衝突時往往導致悲劇性結局。

《貴族之家》的情節並不複雜，有著詩一樣的單純性，故事以拉夫列茨基和兩位不同性格、不同道德的女性瓦爾瓦拉、麗莎間的愛情糾葛為主線，以貴族青年潘申先是追求麗莎，隨即又敗倒在風騷迷人的瓦爾瓦拉的裙下為副線，塑造具有對比性質的兩種男性和兩種女性的不同形象；另外再輔以一生窮途潦倒的萊姆及為理想奮鬥的米哈列維奇為陪襯，來呈現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性格形象。整體而言，小說的人物形象更加凸顯主人公的性格，果斷堅定的麗莎映襯懦弱逃避的拉夫列茨基，勇於追求的瓦爾瓦拉映襯畏縮怯弱的拉夫列茨基，急功近利的潘申映襯一事無成的拉夫列茨基，追求理想的米哈列維奇映襯言多行少的拉夫列茨基，以同樣一生潦倒的萊姆烘托一事無成的拉夫列茨基。

### 一、果斷堅定的麗莎映襯懦弱逃避的拉夫列茨基

麗莎是位天資聰穎、感情細膩、性格完美的姑娘，從小展露出和一般小孩不同的氣質，「閃耀著靜靜對人的關切和善良」。言行舉止端莊，「從不長時間地高聲大笑，舉止穩重」，她具有愛國心，受對宗教狂熱的乳母阿加菲雅影響，使她更純潔善良，在宗教中吸取她愛人類，隨時準備替他人受苦、承擔個人犧牲的理想，同情不幸者，關心普通的人民。她是貴族地主小姐，卻能出淤泥而不染，智力的成長、信念的形成不受朝夕相處的平庸的親友影響。在麗莎身上展現的是相對的人格特質：一方面有人道主義精神，為他人著想、和藹善良；另

<sup>36</sup> 轉引自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頁87-88。

一方面是對宗教義務的堅定不移，不肯妥協。

### （一）人道主義精神

麗莎擁有真摯誠懇、熱愛人民、勤苦耐勞、感情純真，關懷他人的特質，是一位當代進步婦女的代表。麗莎不具有天賦異稟，但肯腳踏實地的學習，一點一滴累積知識，「她的成績無一不是經過刻苦用功得來的」。她力求獲得知識，做一個獨立的人；「她讀書不多；她沒有“自己的語言”，然而他卻有自己的思想，她走著他自己的道路」這並不是為著自己的安樂，而是為了俄國，她愛俄國，喜歡俄國人的聰明智慧。這就是十九世紀出現的『新婦女』形象，她們的真摯、熱心、忠誠、自我犧牲，甚至獻出生命，這樣的形象是歷史上少有的精神。

她整個身心都滲透著責任感，她唯恐傷害別人的感情，她有一顆善良的、溫順的心，她愛所有的人。……每當她母親領地的管家來到城裡的時候，她沒有半點的矯飾，同她談上整整幾個鐘頭。她跟他談話好像跟自己平等的人談話一樣，沒有任何貴族的矜持。(232 頁)

她充滿關懷人民的特質，同情窮苦人民，樂於親近較低階層的民眾，不擺出高姿態，真誠關心社會，熱愛國家。書中寫道：「麗莎從來沒有自詡為愛國者，可是她的心卻是向著俄羅斯人民的。俄羅斯式的智慧、氣質令她喜悅。」正是這樣的情懷，當拉夫列茨基和西歐派分子潘辛爭論時，他站在拉夫列茨基那邊，且因此愛上他。麗莎有一顆「俄羅斯的靈魂」，當潘申在跟拉夫列茨基進行爭辯中，輕蔑地談到俄羅斯比歐洲落後，談到俄羅斯似乎沒有發明的天才，所以只好被迫模仿別人的一切時，麗莎很激動、很痛心。

從麗莎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完美的女性形象，具有真摯動人、富於自我犧

牲的愛情情懷，及深沈的人道感情，突破以往封建女性的束縛，是女性思想上的進步，呈現出新時代女性的典型。

(二) 宗教義務的堅定不移，不肯妥協

影響麗莎的思想最大的莫過於幼時的保姆，保姆有著與眾不同的身世，在農家中她是佼佼者，能言善道，聰明有智慧，能適應惡劣環境，受人信賴，毅然投身宗教中，滿懷忍讓謙卑，令人敬重，這樣的保姆以身教及言教從小影響著麗莎。

……阿加菲雅並不給她講童話，卻往往用一種緩慢的、平靜的聲音，給她講著聖母的傳記，隱士們、聖者們、女殉道者們的生平；她給麗莎講述那些聖人們怎樣住在沙漠裡、忍飢受困，而終於得到拯救贖罪——他們怎樣不畏王侯。……麗莎聽她講著——於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上帝的形象，便以一種甜美的力量進入她的心靈，使她的心靈充滿了純潔虔誠的敬畏，基督對她就成為親近的，熟悉的，幾乎像親人一般了。(231頁)

這些故事讓麗莎深受感動，她佩服聖者們樹立的苦行功績，他們所做的犧牲。在這樣耳濡目染之下，麗莎把宗教奉為人類優秀品德和行為的源泉，性格中培養成服從上帝和勇於犧牲的精神，而不是對一般人的服從，她並沒有服從反對她進修道院的親友，即使長輩認為她做太多的跪拜，不合乎貴族的規範，她仍固執、堅定、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堅持精神。

在人道關懷的人格特質及宗教思想的薰陶下，麗莎與同樣具有人道關懷特質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相契合，而產生愛慕之情，從中也烘托出主人公仁慈善良的性情，關懷社會的人道精神。因此在潘申和拉夫列茨基辯論時，麗莎站在

拉夫列茨基那邊，深深認同他的見解。再從另一角度看來，麗莎在當時貴族環境中，不受世俗環境影響，一心追求歸屬的宗教，關懷世人的表現，展現獨立堅定的精神，突破傳統規範，有獨立思考、追求生活的勇氣，充分展現名決果斷的毅力。相較於拉夫列茨基，優柔寡斷、意志不堅，受環境左右的個性，礙於社會習尚的羈絆，而輕言放棄幸福理想的追求，在精神上遠遜於麗莎的果斷。

## 二、勇於追求的瓦爾瓦拉映襯畏縮怯弱拉夫列茨基

瓦爾瓦拉是位交際手腕高明的一位女人，她知道在何時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迎合眾人的需求，吸引目光。她在完全符合貴族生活的教養下成長，懂得享受生活，追求時尚，她和多數貴族一樣，衣著上穿戴華麗、入時，追求虛華的高貴生活，如小說中所描述「瓦爾瓦拉好像燈焰吸引飛蛾那樣吸引著賓客。」在性格上，她對自己生活方式的追求比拉夫列茨基積極，她清楚自己嚮往的生活模式，且有心機地等待時機。她的一言一行都是為了某種目的而表現，在他背叛拉夫列茨基後又返回俄國尋求他原諒的卑微行爲，淋漓盡致反映這一點：

……一位穿著綴有縐邊的黑綢衣的太太，迎著他從沙發上站起來，用細麻紗手帕半掩著蒼白的臉，向前走了幾步，低下她那精心梳理、香氣撲鼻的頭——便跪倒在他腳前。(233 頁)

爲了達到期望的效果，她放下身段、裝腔作勢，以博得同情。

特奧多爾，我對不起你，非常對不起你，說得重些，我是個有罪的人；

但是，請您聽我說完。悔恨折磨著我。我成了我自己的累贅，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的處境……（234 頁）

瓦爾瓦拉知道拉夫列茨基是可靠的男人，讓她可享盡一輩子的福，所以厚著臉皮乞求和解，她確切了解拉夫列茨基柔弱善感的性格，必定會收留她。從這形象我們看到一位不守婦道的女性，不顧世俗的批判，如花蝴蝶般周旋男性間，背叛愛情，卻又寡廉鮮恥祈求原諒。她有一套生存之道，且生命力旺盛，從另依角度看來，瓦爾瓦拉的生命是充滿目的性的，雖然不見容於社會，但較於拉夫列茨基，她的生命就個人利益而言是豐富的，遠較主人公的一生多彩。但也因為這一自私自利形象的對比，顯現麗莎的人格高尚與完美形象。也襯托出主人公性格的溫厚純樸，為義務上的責任接受厚顏的妻子的偉大情懷；及雖同為貴族，能摒除個人享樂，心懷關心社會，為人民著想，想要有一番利於農民改革，主動追求新知的進步性。

### 三、急功近利的潘申映襯一事無成的拉夫列茨基

屠格涅夫深深懂得西歐文化的優秀方面對農奴制俄羅斯來說具有進步的意義。他氣憤揭示潘申和一切以文明的西歐崇拜者的假面具掩蓋著自己的地主、農奴主的本心的人們，以及一切敵視所有俄羅斯民族的東西的人們。<sup>37</sup>拉夫列茨基是一位有抱負、有學識、重感情的正值知識份子，而潘申則把知識轉化為一種現世的狡詐智術，運用到對美貌女性的獵取和對官階祿位的覬覦上。

潘申渾身散發著彬彬有禮的莊重體面，老愛搬弄是非、滑頭、胡編亂造的

---

<sup>37</sup>彼得羅夫著 張耳譯：《屠格涅夫》，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1957年3月，頁28。

人，學習貴族社交技巧、穿著打扮、談吐學識、好高談闊論、愛裝腔作勢，「善於使自己以滿懷真正的尊敬來對待這種奧秘的種種規則」麗莎給予潘申的評價是「您不過是遇事漫不經心，善忘，像所有交際場的人物一樣」，用盡心思讓自己躋身於貴族中。

潘申十五歲時就會大方走入任何一家上流社會的客廳，風度翩翩地和人打交道，在適當時機離去，有良好交際手腕，他從小就知道：生活中首要的是獲取高官厚祿。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極力培養自己多方面才華，「他多才多藝：他唱歌唱得很好，作畫揮灑，會寫詩，演戲也維妙維肖。」為了引人注目，他始終小心掌控自己行為舉止「他習慣博得一切的人——無論老少——的歡心，他自以為他善於瞭解人……即使在他不顧一切地狂飲放浪的時候，他那機靈的棕色的小眼睛也是滴溜溜地觀察著，審視著；這個大膽的、無拘無束的年輕人永遠不會完全失態，不會神魂顛倒。」（135 頁）

卑躬屈膝低崇拜歐洲的西歐派份子，與具有斯拉夫派某些優秀特徵的拉夫列茨基對比，潘申是位官運亨通、矯揉造作，該恭敬的地方，就必然十分恭敬，可以大膽的場合，也竟能敢作敢為，在必要的時候，喜歡說上一句半句德國話，在流行的法國小冊子裡獲取知識的二十七歲侍從官，他的議論沒什麼深度，在討論嚴肅話題時，他通常轉述不久前讀過的書中內容，沒有自己見解。他稱拉夫列茨基為落後的保守主義者，並浮誇地聲稱：「俄國一直落後在歐洲後面；我們得趕過它」「我們連個捕鼠器都沒有發明過」他「大肆攻擊新一代的青年，有朝一日他大權在握，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一切扭轉過來。」（222 頁）他號召俄國人不加選擇地抄襲別人的東西。潘申樂於高談「他的事業、他的人



生觀、世界觀和對官場的看法，關於俄國未來」。其實他未能瞭解俄國社會需要，僅是大放厥詞，大談當官人的改革夢想。他有自信地「大膽地、快活地、昂首闊步地勇往直前，生活在他是一帆風順」，他處心積慮追求的是「名利雙收」的人生，他為自己而活，嚮往享樂的生活。

潘申在仕途上青雲直上，已經有希望可以當上司長；他的背已經有些彎，大概是因為他脖子上掛的弗拉基米爾十字勳章太重，使他的身體要向前傾。(273 頁)

潘申頭腦裡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地主思想、習慣，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同情心、憐憫心，他不善於有深刻的感受。相形之下，從他反駁潘申的改革論點，看到拉夫列茨基為俄國著想、關懷社會的積極精神。

他向潘申證明，如果不真正地瞭解祖國，沒有對理想的真正信仰，那麼，躍進和居高臨下的改造是不可能的；他以親身所受的教育為例，要求首先要承認人民當中有真理，對這真理，必須抱有虛懷若谷的態度，如果沒有這種虛心的態度，即使有反對虛偽的勇氣也不成。(223 頁)

潘申一生為著功名利祿而活，汲汲營營是位利己主義者，讀者對他的小頭銳面的樣態不予苟同，但不可否認的，他的一生目標達到，對他而言，甚至當時社會來說，潘申是位「成功的人」。通過這個人物形象，屠格涅夫對不學無術、知識膚淺的貴族進行尖銳批評。潘申是一位自私自利、沒有明確信仰、過高估計自己才幹、放縱不羈、在人們面前裝模作樣的人。空虛、冷酷與無所事事的潘申是沒有堅定信念、除掉高官厚祿及上流社會裡精彩應酬之外別無他望的

人。「屠格涅夫藉由潘辛嘲笑那類忘記祖國、完全脫離人民的人，冷酷無情的投機客、巧於鑽營和利己主義者。<sup>38</sup>」反觀拉夫列茨基以貴族身份的優勢，進步的西方知識，關懷人民的心，改革的願望，是真正對祖國有益的人。卻在當時的專制封建思想社會中，自身缺乏意志力的因素下，成了一位感情失意、婚姻失敗，改革稍有成就卻成不了大事的人，只能隨時光流逝，長吁短嘆一事無成，成了道地的「多餘人」。

#### 四、追求理想的米哈列維奇映襯言多行少拉夫列茨基

小說中的米哈列維奇是位忠於自己思想的狂熱者，他有自己見解，勇於探索，他是一位熱情奮發的人，保持青春時期的奮鬥特質，「我仍舊相信善，相信真理；我不僅僅是相信，——我現在是有信念，是的，我有信念，有信念。」（194 頁）像羅亭一樣喜歡議論。他批評拉夫列茨基是無所做為及懶惰，他性格中繼承於前輩的貴族氣質，他批評拉夫列茨基「要不是悲觀者，就是個懷疑主義者」：

米哈列維奇對拉夫列茨基說：『你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可是你卻躺著；你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然而卻什麼也不幹；你挺著你那吃得飽飽的肚皮躺著，嘴裡說什麼：「就應該這樣躺著，因為不管人們做什麼——一切都是胡來，一切都是瞎忙。」』（196 頁）

他總是津津樂道自己的理想、充滿活力、精力充沛且熱中追求，一秉自己的熱情理想地往前衝，卻未能瞭解社會情勢。

---

<sup>38</sup>亞·費·扎哈爾金：〈貴族之家〉，《屠格涅夫論》，頁 205。

他直接揭露拉夫列茨基的消極行爲：

人們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在什麼地方，想出來要做懶漢的呀？……  
就是在我們這兒！就是在目前！在俄國！在這時候，我們每一個人對上帝，對人民，對自己，都有義務，都肩負著偉大的重任！我們在睡覺，時光在流逝，我們卻在睡大覺……（197 頁）

言論的激情在於號召爲社會服務，爲公益貢獻，信仰堅定、思想集中、行動果敢、富於忘我現身精神，「一秒鐘也不行！死亡不等人，生活也不能等待。」。對俄國某些知識份子無所作爲和消極情緒的揭露，及對工作的熱情號召，目的在告誡拉夫列茨基，提防滾進在五十年代貴族的禁錮中。雖然米哈列維奇一文不值，境況十分窘迫，如文中拉夫列茨基所觀察到的：

憐惜注意到朋友身上帶有長時間貧困潦倒的種種症狀和習慣」他的官運不亨通，僅將希望寄託在一位包稅商上，但「他依然沒有灰心喪志，仍我行我素，過著他那憤世嫉俗者、理想主義者、詩人的生活，真心真意地關心著人類的命運和自己的使命，為它們憂心忡忡；至於自己會不會死於凍餒，卻極少關心。（198 頁）

米哈列維奇認爲自己已在苦難的熔爐裡得到淨化，自稱是一個幸福的人，把自己比做天上的飛鳥和幽谷的百合花。他喊出「宗教、進步、人道主義」的口號。歌頌積極的創造性，批判消極對待生活，耽於幻想、誇誇其談，激勵這些消極人物面對現實，從事實踐，讚賞用實際行動爲善獻身的人。

米哈列維奇積極奮鬥，爲心目中理想付出，雖然不合於情勢，不見容於社

會，甚至成了商人的噓頭，以致生活窘迫，未完成理想的事業。但他不顧一切的熱情，一股熱愛生命的毅力，是拉夫列茨基性格中缺乏的。反觀拉夫列茨基雖有滿肚子「理想」，卻欠缺衝動。僅在腦中不斷計畫著自己事業，無怪乎米哈列維奇譏笑他時，他只能找藉口為自己辯護，凸顯了知識份子行動派與多餘人之間迥然不同的行動能力。

## 五、一生潦倒的萊姆映襯一事無成的拉夫列茨基

在《貴族之家》文本的所有形象當中，萊姆佔據著特殊的位置。藉由這個形象，屠格涅夫在小說中引進音樂、特殊的詩意，在詩和音樂的陪襯下，更突顯出麗莎高雅的氣質，也藉他的形象作為拉夫列茨基形象的直接補充。才華洋溢的萊姆具有很高的音樂天賦，在艱困環境中步步高升，取得樂隊指揮位置，人生本可一路順遂地前進，可是為了追求財富，追求物質利益，他離開了祖國。可是在異國他鄉，他不能如願地發財致富，一展才華，相反地他的才華卻因離開祖國土壤兒逐漸枯竭了。作家慨嘆他生不逢時，未能將才華發揮，很有才能的作曲家終生一事無成，一輩子未留下不朽事蹟。

在萊姆形象上，看到俄國社會日漸衰敗的面目，封建莊園地主的沒落，暗示俄國這塊土地是扼殺一切光明、有才華的事物，消磨人的意志，讓一位才華洋溢的外國人在俄國社會日漸衰頹，抑鬱不得志，終究一事無成而凋零。正如萊姆最終的感嘆：「一切都死了，我們也死了」

他決意留下來再碰碰運氣。二十年來，這可憐的德國人就一直在碰自己的運氣：他在各種各樣的主人家待過，在莫斯科住過，在各個省城也待

過，歷盡艱辛，飽嘗貧窮的滋味，苦苦掙扎；但是儘管受盡磨難，衣錦歸國的念頭卻一直沒有離開過他；也只有這個念頭支撐著他。然而，命運並不願意用這最後的、也是最初的幸福讓他高興一下：他年已半百，體弱多病，未老先衰，他滯留在 O 市……也只好永遠留在這裡，他已經完全失去了離開這可恨的俄羅斯的一切希望，勉強靠教課來維持自己可憐的生活。……萊姆終於萬念俱灰，而且年齡也不饒人：他變得冷漠了，僵硬了，就像他的手指變得僵硬了一般。(139 頁)

萊姆和拉夫列茨基可說一見如故。在本質上，萊姆和拉夫列茨基都是一生一事無成的人，他們兩人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失敗同樣都是脫離祖國的結果。萊姆以外國人身份到俄國追求人生理想，卻在俄國地主的裝腔作勢中以爲會功成名就。拉夫列茨基以貴族身份，受過西方教育，對俄國農民充滿同情，對萊姆滿懷熱情，胸懷對社會奉獻的愛國心，卻在社會環境及個人階級的隔閡下，理想終不能大放異彩，只在自己小莊園中稍有績效，終歸一生的夢想成空。這兩角色間以同樣失敗的一生，諷刺俄國當時環境對知識份子的扼殺。

## 第四章《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在多餘人形象的地位

綜觀十九世紀前葉俄國文學史上出現一系列「多餘人」形象：從二、三十年代的奧涅金的熱情樂觀、畢巧林的悲觀孤憤，雖出身貴族，但不滿現狀、具有反抗精神，他們否定專制制度，暴露社會黑暗，具有進步意義；到四、五十年代羅亭的空喊口號、拉夫列茨基成了「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雖不能實踐理想，但尚能熱情宣導改革的思想，對社會起一點作用；至五十年代末，奧勃洛摩夫懶惰寄生，既不能行動，也不能宣傳，成了躺在床上的廢物。<sup>1</sup>其發展軌跡是從憂鬱、徬徨走向病態。這些形象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多餘人形象，真實具體地展現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改革運動第一階段中貴族知識份子的思想探索及嬗變過程，在俄羅斯文化和思想發展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在這遞嬗過程中，俄國文學忠實地反映俄國貴族先進知識份子思想的覺醒—迷惘—求索—沒落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人物身上，性格特徵衝突的激烈程度、消長狀況，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果和社會影響又是不盡相同的。正如杜勃羅留波夫說過：「跟著時序的流駛，跟著社會意識的發展，這個典型也在改變它的形式，對於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種關係，獲得了新的意義。」<sup>2</sup>通過「多餘人」的形象，作家們歷史地反映俄羅斯社會在新舊交替中出現的矛盾，刻畫青年知識份子在歷史的陣痛中的心理動向、人生態度和精神氣質。

《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在多餘人系列中處於承上啓下階段，上承奧涅金的貴族自覺精神，摒棄畢巧林孤憤自私的態度，延續羅亭熱中社會事務的理想，讓多餘人至此達到一個較完美的性格狀態，博得更多同情的目光。也使多餘人由此往下沉淪，到奧勃洛摩夫時代，承續拉夫列茨基善良個性，卻發展為更頹廢、無用的狀態，成了更為人所唾棄的社會多餘人。

<sup>1</sup> 陳夢：〈新舊文化交替的悲劇典型——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惠州學院學報》，頁 85。

<sup>2</sup> 見《辛未艾·杜勃羅留波夫文學論文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年，頁 11。轉引自郭秀媛：〈再論多餘人〉，《河北大學學報》第 25 卷第 5 期，2000 年，頁 107。

## 第一節 繼承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自我覺醒的精神

俄國學者庫爾良斯卡亞在《屠格涅夫與俄國文學》專著中指出「屠格涅夫的藝術思維方法是沿著普希金的方向發展的。所以人們稱他爲『具有詩人氣質的散文家』」<sup>3</sup>。他也認爲屠格涅夫在塑造人物性格上也繼承普希金的傳統，把典型的社會性同人類共性結合在一起。在多餘人的系列作品中，《貴族之家》拉夫列茨基繼承了奧涅金的特點，也超越奧涅金的侷限。

### 一、厭惡人生的第一代多餘人形象——《葉甫蓋尼·奧涅金》

《葉甫蓋尼·奧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寫於一八二三年五月至一八三一年秋，一八三三年出版，是用詩體寫成的小說，也是普希金被推崇爲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的主要依據。<sup>4</sup>普希金（1799—1837年）是十九世紀俄國偉大的民族詩人、俄羅斯浪漫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以卓越的創作爲俄國文學的發展做出許多開創性的貢獻，在詩歌、戲劇、小說諸方面都取得驚人的成就，在俄國文學史上佔有光輝的地位，高爾基讚揚普希金：「他的作品是一個睿智、淵博而正直的人關於時代的風尚、習俗和觀念和寶貴證據，這些作品全是加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天才插圖。<sup>5</sup>」譽他爲「俄國文學之始祖」<sup>6</sup>。在貴族革命時期，作爲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先導者普希金，在他的詩歌、小說等作品裡不僅謳歌自由，也有力地批判憎惡的專制農奴制度，以成熟的現實主義藝術手法塑造「多餘人」的始祖——葉甫蓋尼·奧涅金形象。作者塑造了代表當時社會的典型人物，表達那時代俄羅斯青年的徬徨和苦悶，探索和覺醒，無奈和悲劇。並透過人物的生活和遭遇，展現俄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凸顯在沙皇專制統治下俄國人民生活的種種矛盾和困境。《葉甫蓋尼·奧涅金》對當時和以後的俄羅斯文學產生巨大的影響，別林斯基稱其爲「俄羅斯生活的

<sup>3</sup> 轉引自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頁87。

<sup>4</sup> 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台灣：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30。

<sup>5</sup> 引自桑淑鈞：〈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濟南大學學報》第12卷增刊，2002年，頁23。

<sup>6</sup> 錄自張皎玲：〈奧涅金：一代貴族青年的肖像〉，《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9卷第4期，頁27。

百科全書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sup>7</sup>。

奧涅金生活在俄國改革運動開始高漲的年代，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入侵，偉大的衛國戰爭激發起俄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加上受到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使反對俄國農奴專制制度的社會運動日益發展起來。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建立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國家，從而解放農奴，把俄國改變為民主自由的國家。並有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發動的十二月黨人武裝起義，起義由於脫離人民群眾而失敗，但民族的覺醒、時代的前進，喚醒一些尚有思想的貴族青年。<sup>8</sup>奧涅金出生於貴族家庭，十八歲受完教育後，開始進入上流社會。風雅的姿態、精美的衣飾、純熟的法語、機智的談吐，使他在上流社會生活的漩渦裡很快嶄露頭角，整天沈溺於醇酒美女之中，過了八年花花公子的生活。但他逐漸地對上流社會的浮華感到厭倦，對貴族階級的虛偽也已洞若觀火，進而苦悶和憂鬱，他覺悟到貴族生活的空虛，希望自己幹一番事業，但貴族生活塑造自私的性格，讓他一生無為。在當時環境，俄國專制農奴制度已暴露其腐朽性，許多貴族青年對於現實社會已經懷疑、失望，苦悶不安，感到需要尋找出路，這是他們開始覺醒的表現。因此，奧涅金的「憂鬱症」是當時貴族青年的「時代病」<sup>9</sup>，很有典型意義。

整部作品中呈現兩類俄羅斯文化典型：一類是俄國農奴制文化的代表，即俄羅斯舊式地主的群像，主要有女主角達吉亞娜的父母和親戚，奧涅金在鄉間的那些面目可憎的鄉鄰們。與這些凡俗之人相比，奧涅金作為進步知識份子的特徵，哲學的思維、經濟的頭腦、深沉的性格，都被映照得十分鮮明。但與另一類俄羅斯文化典型，即作為俄羅斯優秀文化傳統和俄羅斯人民意願代表女

<sup>7</sup> 轉引自張皎玲：〈奧涅金：一代貴族青年的肖像〉，《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9卷第4期，頁27。

<sup>8</sup> 郭雪六：〈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6年，頁120。

<sup>9</sup> 詳見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31。



主角達吉亞娜相比，奧涅金更多地顯示出孱弱的特徵。達吉亞娜對俄羅斯古風古俗的熱愛、對大自然的陶醉、對田園生活的眷戀和對京都生活的厭惡，都表現出她作為「俄羅斯靈魂」的文化特徵；而她對西歐進步小說的迷戀和對奧涅金這個新派人物的追求，做為一種藝術象徵，則表現了俄羅斯人民對新生活新文化的尋求。奧涅金把追求自由與家庭幸福對立起來，表現西方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而達吉亞娜對家庭道德義務的服從，則表現俄羅斯的群體文化的道德觀念。在這個衝突中，作者明顯地站在達吉亞娜一邊，形成抑奧揚達的文化態度。

奧涅金作為第一代多餘人，知識份子剛覺醒的徬徨無助，讓他失去追尋理想的能力，即便如此，仍具有進步的意義。正如別林斯基揭示多餘人的時代特徵指出：「奧涅金不是模仿，而是反映，不過，這不是詩人幻想的反映，而是詩人通過詩情長篇小說的主人公加以描繪的那個現代社會的反映。和歐洲日益接近起來的這一點，應該會特別鮮明地反映在我們社會中，——而普希金是憑著偉大藝術家的天才本能，通過奧涅金這個人物，抓住這種反映。<sup>10</sup>」

## 二、繼承自我覺醒的精神

奧涅金是俄國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覺醒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貴族知識份子的典型，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多餘人」形象。奧涅金身上反映出俄羅斯社會具體歷史時刻的特徵，他是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的時代英雄，一個身上包含無數矛盾和可能性的歷史人物。總括來說，奧涅金在時代意義上，有其正面的作用，他有一定的理想追求，具有探索人生真理的性質，不貪圖功名利祿，不想做達官貴人；覺察到社會的缺陷，對現實持批評態度，不滿意平庸的生活

<sup>10</sup> 參閱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頁 360。轉引自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 4 期，1992 年，頁 26。

環境，追求、徬徨、漂泊、探索，帶有一種群體的使命感，他的社會教養高于同時代的一般貴族。

奧涅金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是塊可怕的「空白地帶」——缺乏合理的工作和高尚的理想，厭惡陳腐的封建制度，於是他痛苦地尋找著出路，他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開始埋頭讀書，試圖藉讀書和創作來填補心靈的空虛，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思想、拜倫充滿自由激情的詩篇都使他感動，使他不滿現狀，憤世嫉俗。他常用「辛辣的俏皮話」和「惡毒的陰鬱的警句」嘲諷時弊；開始在自己的莊園裡實行從事農業改革，他曾經嘗試過減少家奴的地租，也曾與好友慷慨激昂地探討祖國和人民的命運，但他並沒有也不可能歸附到更有生機的階級中去，相反卻幾經掙扎之後又回到好不容易才走出片刻的那個「狹小圈子」裡。他「創建一種新的制度」，打算「用輕的地租來代替古來徭役的重負」，<sup>11</sup>這是社會進步思潮的反映。

奧涅金雖高出一般貴族一等，歸根到底仍是貴族圈子裡的一員，注定他與一般貴族沒有多少本質的區別。奧涅金生活空虛，沒有從事真正的事業，沒有獨立工作的能力；一切的計畫都不了了之，缺少同現存社會作正面的公開的政治鬥爭的膽識；只是憂鬱、厭倦、孤獨、冷漠和沉思。貴族的教養使他不務實際，貴族生活的寄生性，貴族教育的空泛性，使得他毫無毅力和恆心，不能處理任何實際工作。他頂多只是高談闊論，做什麼事都缺乏恆心和毅力，辛勤的勞動使他厭倦，他的筆沒有寫出一點東西，讀書也沒有系統，不久便丟下書籍，至於莊園的改革，也僅是紙上談兵。他並不是想對社會做些有益的貢獻，而只是「爲了消磨時光」，所以很快夭折了。他一生空忙，一事無成，夾在貴族的庸眾中間無聲無息地消失掉。正如詩中敘述他的大半生涯：

奧涅金

自從在決鬥中殺死了朋友，  
無目的、不勞作地活到今天，  
他已經整整活了二十六年，  
無聊的閒散中他覺得難受，

<sup>11</sup> 陳夢：〈新舊文化交替的悲劇典型——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惠州學院學報》第22卷第5期，2002年10月，頁85。

沒有個妻子、事業，或職位，  
無論幹什麼事，他都不會。<sup>12</sup>

他鄙視貴族社會的庸俗和虛偽，不願意和貴族社會同流合污，但又無法掙脫這社會的牢籠。奧涅金從思想上脫離他所屬的階級，而行爲、生活、習慣上又依賴他所屬的階級，正如赫爾岑所指出：「奧涅金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因爲他從來不做什麼事，他在他所處的範圍內是一個多餘的人」，這個形象所體現的，是十九世紀初葉俄國貴族青年的肖像，這類人物在二十年代的俄國社會是常見的，如赫爾岑所說：「在俄國每走一步都會碰見他」「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都是奧涅金」<sup>13</sup>。這種人在教養上高於周圍的人，一方面他們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啓蒙，不滿於現實，鄙視貴族社會，力圖有所行動；另一方面，他們未能突破貴族階級的侷限，又遠離人民，缺乏行動起來的勇氣和能力，無所作爲，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摸不到出路。甚至走上自我否定的道路，結果只能孤芳自賞，苦悶徬徨，成爲貴族社會的「多餘人」，這種人「永遠不會站在政府方面」，同樣也「永遠不能夠站到人民方面」<sup>14</sup>。

雖然奧涅金的一生終歸是空忙一場，個人事業成空且無益於人民，但他的進步思想具有積極意義。奧涅金是剛覺醒的知識份子，敏銳覺察貴族生活的浮華空虛，嚮往有意義的生活，他讀書充實自己，也開始能關心社會，實地改革。但因爲剛覺醒，因爲反覆無常、見異思遷、不負責任的性格，及貴族生活的惡習影響，無法落實真正行動。第四代多餘人拉夫列茨基的覺醒更爲強烈，從個人知識的覺醒開始，他明確了解自己知識的不足、生活的缺陷，畸形的家庭教育並未閉鎖他的心靈，他滿懷求知慾到大學上課，追求學問，關心社會時事。對於社會，表現知識份子對封建制的不滿及對農奴制的反感，拉夫列茨基關懷弱勢人民，他覺悟到貴族地主的不公平社會現象，願意屈身傾聽奴僕的心聲，主動接近莊園農奴，滿懷理想，希望有所作爲，並曾在莊園實際改革且稍具成效，「他真的變成了一個好的當家人，他真的學會了種地，而且，他勞動不單是爲自己，他還竭盡全力保證和鞏固他的農民的生活」這一點比起奧涅金發展更

<sup>12</sup> 普希金著，盧永編選：《普希金小說戲劇選》，台北：光復出版社，2001年，頁153。

<sup>13</sup> 轉引張皎玲：〈奧涅金：一代貴族青年的肖像〉，《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9卷第4期，頁27。

<sup>14</sup> 詳見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33。

進一步，他的多餘人形象更具意義。

除了繼承奧涅金第一代多餘人貴族初步覺醒的態度外，拉夫列茨基在性格上的怯弱，侷限在貴族生活圈中的習性，並未完全滌除，他期待自己做一番事業，卻遲遲沒有實際行動，全心在愛情事業上，改革建設成了空中樓閣，雖然在期許的愛情美夢失敗後，他確實在莊園實施改革且稍有成效，但對於這樣的理想實際，屠格涅夫僅以寥寥幾筆帶過，顯現的是這事件的微不足道。就整部小說而言，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仍是一位理想高於實際，缺乏恆心毅力，而致一事無成，和奧涅金同樣是社會的多餘人。

### 三、超越冷漠的愛情態度

相較於奧涅金冷漠的愛情態度，拉夫列茨基具有追求愛情的熱情。奧涅金不但在社會問題上只停留在個人的不滿和苦悶，沒有發展到對大眾疾苦的同情，而且愛情問題上的忽冷忽熱，隨心所欲，充分表現他自私自利為己的心態，只為自己喜樂，不顧他人感受的個人主義。<sup>15</sup>他離開都市來到鄉間，和連斯基成了摯友，兩個貴族青年討論社會、歷史、科學和人生，極為投機。他結識純潔、真摯的達吉亞娜，她不滿於地主生活的平庸，想突破生活的束縛，敢於大膽地向奧涅金傾訴愛情，但遭到他以「過來人」的態度加以拒絕，把她真誠、坦率的求愛視同社交界仕女的逢場作戲。他又惡作劇戲弄達吉亞娜的妹妹奧麗加，被惹惱了的奧麗加的未婚夫連斯基要求與之決鬥，結果他還是屈從於貴族階級所謂維護「名譽」的偏見，接受挑戰，在決鬥中打死自己的朋友。奧涅金只好離開莊園，孑然一身，浪跡天涯，誰也不需要他。奧涅金是孤獨的，雖然逃離喧囂的都市，將舞會、劇場、佳酒、美人甩到身後，但孤獨卻與他行影相隨。幾年後他重返彼得堡，見到嫁給一位將軍的達吉亞娜已成為社交界的明星，他

---

<sup>15</sup> 參見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 31。

又是出於虛榮心要征服這位舞會上的女皇，狂熱地向她求愛。如此等等都說明奧涅金仍沒有擺脫貴族階級的惡習，他憤世嫉俗，自私爲己，同時又遠離人民，空虛無爲，對愛情態度輕率，下場只能是悲劇，沒有出路。

奧涅金時代，先進的貴族青年剛剛覺醒過來，期待並爭取自由民主在俄國的實現。然而他們所期待的「迷人的幸福的星辰」還沒來得及升起就殞落了，隨之而來的是無邊的黑暗和難以忍受的窒息。<sup>16</sup>他的心中充滿苦悶，展現在情感上是不負責任的輕率態度。在情感上奧涅金遊戲的心態縱橫情場，在異性中獲得青睞，造成他對愛情的態度是輕率的，不相信真愛，也失去真正愛人的心，缺乏追求幸福的毅力，他只想在征服女人中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自私自利，忽略他人感受。

相較於對愛情冷漠自私的奧涅金，拉夫列茨基雖因教育中的缺陷，對異性缺乏了解，加上呆板的性格，對異性了解十分淺薄，以致誤入美麗的陷阱中，來不及認識真愛，即受到婚姻的傷害。等到真愛來臨時，卻因社會現實的羈絆及柔弱的心而沒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機會而成愛情失敗者。但這過程中，拉夫列茨基所展現的是主動追求愛情的魄力，對於瓦爾瓦拉，他主動提出認識的要求，而成了眷屬；對於麗莎，他雖擔心受傷害，卻也主動示愛，勇於追求愛情，採取有效行動。較奧涅金遊戲情場，貶低愛情的偏激態度，拉夫列茨基的行動具有積極性。在愛情的態度上，他的熱情程度與奧涅金自我防衛的心態，有相當大的突破。

#### 四、超越憤世嫉俗的自私心態

---

<sup>16</sup> 桑淑鈞：〈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濟南大學學報》第12卷增刊，2002年，頁。

奧涅金的「俄羅斯式的憂鬱病」的病源主要是對野蠻的憂鬱，是一個心靈受到西歐進步文化啓迪的人在黑暗、愚昧的專制農奴制的俄羅斯、時時感到窒息，時時感到在「清醒的墮落」的那種無以名狀的憂鬱<sup>17</sup>。奧涅金厭惡的是作為半文盲的俄國農奴主上流庸俗社會圈子的愚昧與庸俗。他頭腦聰明、自視清高，才智過人、富有教養，但他的生活空虛，沒有為人生積極奮鬥的目標，不知道需要什麼？追求什麼？缺少和社會公開對抗的勇氣，只是憂鬱、孤獨、冷漠，缺乏行動的毅力，最終成為一個「聰明的廢物」。儘管如此，他不失為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俄國貴族的優秀代表，在他身上集中那個時代先進貴族青年具有的才氣和劣根性，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但又冷酷無情、愛慕虛榮，他沉緬於上流社會的生活又厭憎上流社會；為自己的靈魂空虛而苦惱可是精神上卻又無處依托；貴族的家庭及教育給他帶來致命的弱點，即遠離俄國現實及民族傳統，養尊處優、不勞而獲，脫離社會實踐。他沒有工作的習慣，拿起書來就打哈欠，提起筆什麼也寫不出……沒有任何做實際工作的能力，又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和理想。「於是憂鬱、煩悶、懷疑、惆悵等精神上的危機，使他染上當代的社會病——憂鬱症。」<sup>18</sup>由於對生活的厭倦，以致熾熱的愛情也燃燒不起他那顆趨於冷卻的心，是情場浪子，但又不失真情體恤；善於深入思考，但又茫然失落。這一代人物身上，埋藏根深蒂固的利己主義思想，他們遊戲人生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常常使他們的行動損人利己，造成善良無辜者的悲劇。

到了第四代多餘人拉夫列茨基成了一位性格善良、溫和的男子，他默默接受環境所給予他的教養甚至挫折，不怨天尤人，尚能保持奮發努力的心，以突破自己的困境，讀者見到的是一位積極努力的生活鬥士。無奈性格中的孱弱本性，雖賦予他善良本質，卻也使他在愛情中遭受挫折。拉夫列茨基不因個人遭遇對社會抱持反面的抗爭，覺醒後的認知並未造成他徬徨不安，他不像奧涅金

<sup>17</sup> 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92年，頁27。

<sup>18</sup> 郭雪六：〈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6年，頁120。

以逃避來防衛自己，相反地，他走入人群中，以仁民愛物之心關懷社會，為農奴著想，他不會傷害其他人，反而受到妻子無情拋棄。他不再是自私自利的貴族知識份子，而是一位走入人群，為人著想，對家庭盡義務的負責男子。這展現的是這一代多餘人趨於沈寂軟弱的行爲，不再像奧涅金反叛性行徑，損人利己，而是扮演一位受害者的角色，在沈重打擊後，仍黯然接受命運的安排。

## 第二節 摒棄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玩世不恭的心態

### 一、孤憤淒涼的第二代多餘人形象——《當代英雄》畢巧林

小說《當代英雄》是萊蒙托夫（1814-1841年）的代表作，發表於一八四〇年。萊蒙托夫生於莫斯科一退伍軍人家庭，繼承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的文學傳統，和普希金不同的是，他在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的黑暗統治年代成長起來的。「由於精神上的憂傷和痛苦，他早期寫的抒情詩有表現不安、焦急、疑惑和消極情緒的，也有渴望自由、表現叛逆精神的。在他的作品中，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現實主義逐漸佔上風，而以詩歌《祖國》和長篇小說《當代英雄》為代表。<sup>19</sup>」《當代英雄》塑造了典型人物畢巧林——繼奧涅金之後出現的第二個「多餘人」形象。作者譏諷地稱畢巧林為「當代英雄」並且指出他的典型意義：「這個肖像是由我們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發展了的缺點構成的。

<sup>20</sup>」

《當代英雄》由五部獨立的中篇小說《塔滿》《梅麗公主》《貝拉》《宿命論

<sup>19</sup> 詳見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124。

<sup>20</sup> 見萊蒙托夫著，翟松年譯：《當代英雄》，台北：光復出版社，2001年，頁261。以下文本資料皆引自此書。

者》和《馬克西姆·馬克西米奇》構成，由主人公畢巧林把它們貫穿成爲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所反映的時代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強化專制統治的時候，是俄國農奴制最黑暗最反動的年代，十二月黨人的革命風暴的影響還在激勵著年輕的貴族青年，他們不滿沙皇的高壓政策，表現出對自由強烈地追求，在反動年代的殘酷現實中，更看不清出路。<sup>21</sup>在健全社會活動遭到壓制，貴族中進步的代表人物普遍受到懷疑和監視，紛紛回到各自的農莊，對社會事業幾乎不敢存有希望的時代重壓下，使「多餘人」身上更多地體現出一種孤憤悲涼的情緒。

《當代英雄》的主人公畢巧林生長在彼得堡的富有世家，是一名貴族軍官，他天資聰穎，才智出眾，有過理想和抱負，或者要像拜倫一樣追求自由，或者要像十二月黨人那樣「爲人類的幸福」而獻身。<sup>22</sup>他有充沛的精力，過人的膽量和冷靜的頭腦，具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堅強意志及敏銳的觀察力，但他的所作所爲卻與他的才智全然不符。畢巧林青年期就在上流社會消遣度日，但不久他開始感到厭煩，厭倦空虛無聊的生活，卻又無力改變，以致於玩世不恭地將聰明才智浪費在無聊卑下的瑣事上，他希望在戰鬥和危險中擺脫這種感受。這時的畢巧林強健、聰明，有沸騰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遇到什麼危險都不低頭。調到高加索幾乎使他快活起來，然而戰鬥的生活不能長久吸引他，他比從前還要厭倦，只好以尋求奇遇、驚險和富有刺激性的生活，暫時減輕糾纏著他的憂鬱。在《貝拉》中描寫他以不正當手段騙來一位美麗的姑娘貝拉，煞費苦心地贏得她的愛，但四個月以後他就變了心，他的薄情間接導致貝拉的慘死。他的心靈疲憊了，「我的靈魂已被塵世所毀，思想騷亂不安，心靈永遠得不到滿足」。而在溫泉療養地他百般挑逗並不喜愛的梅麗公爵小姐，利用他向梅麗求愛的假象作爲他和舊情人維拉幽會的掩護，他的自私和冷酷深深地傷害深情的梅麗。畢巧林空虛的精神在尋找寄託，旺盛的精力渴望風暴，有如災星般到處給人帶來災難與不幸，愛他的女人瑪麗和維拉都因他淪於痛苦的絕境。畢巧林漠視他人的痛苦，對自己的生命也從不愛惜。有一次當他路過塔曼小城時，他受了好奇心的驅使，去跟蹤一夥走私販子，害得其中一老一小失去依靠，他自己也險

<sup>21</sup> 郭雪六：〈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6年，頁120。

<sup>22</sup> 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35。



些被拋進大海裡淹死。在礦泉，他懷著舞會散場後回家的從容心情去和人進行一場決鬥，對生死大事抱持冷漠的態度。在《宿命論者》中，畢巧林由於精神無所依託，拿生命作為冒險，證明了宿命的存在，開始對宿命論深信不移了，這是他走向頹廢、滅亡的宣言。畢巧林自己也知道這些行為是錯誤的，內心的矛盾折磨著他，使他感到一種人格分裂的痛苦，有時產生「我是誰」的疑問。最後，在大自然裡，畢巧林體會到瞬間的陶醉，他把遠方旅行當成唯一出路。畢巧林此刻已是「直挺挺的軀幹彎曲得像脊背上沒有一根骨頭似的，他周身的姿態表現出一種精神衰弱的樣子，額上布滿彼此交切著的皺紋的痕跡。」「走起路來懶洋洋的，心不在焉的樣子，當他笑的時候眼睛卻不笑。」（300頁）對友情淡然，成為一個冷血動物了。他自己不明白為什麼要往波斯去，他說：「也許會死在路上的。」果然，在波斯的歸途中，意外的死亡結束這位不安分的英雄的放浪和苦惱。

俄羅斯多餘人形象的發展過程中，從第一代奧涅金到第二代畢巧林，在形象塑造上具有共同的性格特徵，亦有更消極的行為展現，從了解這兩代多餘人的發展脈絡後，得以深入分析拉夫列茨基和畢巧林這兩位不同時期的多餘人代表的差異性。

（一）奧涅金和畢巧林相同點：具有高學識但滿腦空想的利己主義者

畢巧林和奧涅金一樣受過良好的教育，天資與才華都高過周圍的貴族青年，有著過人的精力。但生活在當時的那個窒息的社會裡，貴族階級的傳統勢力及偏見，洗脫不掉的上流社會惡習和好高騖遠的青年通病，使他遠離人民，不允許他們從事有意義的事業。奧涅金、畢巧林傾向於心理衝突，他們的新意識促使他們與社會分離，然而舊經驗與舊的思想模式又時時在他們的行動中充當裁判的角色，使他們不但懷疑社會，且深刻地懷疑自身，造成心理上的極度矛盾和人格分裂。在兩者衝突不能最終導向一種新的文化心理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精神無依托的虛無狀態，或者妥協，或者冷漠遁世，或者尋求刺激，玩世不恭，或者索性轉向對某種超自然、超社會力量的皈依，以擺脫心理上無家可歸的游離狀態。<sup>23</sup>但他們的歷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他們一生無所作為，一方面由於完全實現他們思想的條件還未充分具備；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理想超過現實生活，而現實生活對他們的觀點和感情只具削弱作用，所以

<sup>23</sup> 郭秀媛：〈再論多餘人〉，《河北大學學報》第25卷第5期，2000年10月，頁108。

他們腦中只能空想。畢巧林與奧涅金一樣，一切從個人出發，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利益，對他們來說都是淡漠的。正如畢巧林自己所說的：「說老實話，除了自己以外，我們對一切都相當冷淡」。甚至當破壞別人幸福的家庭時，他也心安理得地認為：「人類的歡樂和悲哀關我什麼事呢？」

## （二）奧涅金和畢巧林相異點：多餘人形象的往下沉淪的發展

畢巧林屬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先進的貴族知識份子，感受到是一八一二年十二月黨人起義被鎮壓之後的陰影，前期「多餘人」身上存有的那種「十二月黨人」式的激情和樂觀的情緒，此時已被殘酷的專制統治蕩滌得乾乾淨淨。<sup>24</sup>畢巧林反映的是奧涅金這類「多餘人」的未來走勢畢巧林比奧涅金更狂熱、更玩世不恭、更損人利己、更具有破壞性，表現地更為孤獨、更為憂鬱。他的痛苦和失望比他的先輩奧涅金深沈得多，對周圍腐敗的現實，常是懷著悲哀和絕望的心情，去復仇、去對抗，狂熱地追求冒險和刺激，以填補精神上的空虛。在個性上，與第一代相比，「多餘人」到畢巧林時期，在思想性格上有很大發展：他們思想更敏銳，對自己有更為嚴酷的解剖和更為清醒的認識，有勇於承擔和勇於創造的積極，也有敏感同情、洞察世態的清醒，反抗意志更強烈，畢巧林沒有奧涅金那種冷漠和寡情，能比奧涅金更為嚴厲地審判自己。畢巧林在日記中的思考，同魏納醫生的談話，以及與格魯尼茨基決鬥時表現的勇敢和堅定，都是奧涅金時代的人們所缺乏的。在他們身上消極成分多於積極因素，對社會的不滿使他消沉，找不到前途出路使他，周圍環境使他窒息。於是他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尋求刺激，一切從自我出發，對社會不負任何責任。他們身上有的是空虛、冷漠、自私和厭世，行動中則有更多的損人利己、不顧後果的表現。如果說第一代「多餘人」與上流社會在許多方面還或多或少有些瓜葛的話，那麼第二代則表現出與之決裂的態度。

## 二、承繼厭棄功名的情操

畢巧林鄙視功名富貴，不趨炎附勢，探索著人生的道路，正因為如此，他

<sup>24</sup> 王曉春：〈殘酷時代裡的悲劇——評俄羅斯文學中的四代多餘人〉，《外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90年，頁84。

常常被流放。他說：「我為什麼不願踏上命運為我開啓的有恬靜的快樂和心靈的安寧等待著我的那條道路呢？不，我不會乖乖地順從這種命運！」他感到痛苦、絕望。他不滿現實，也譴責自己，但又不能窺見美好的前程，成為具有雙重性格的畸形的「多餘人」是其必然結果。

這樣出眾的貴族青年無法施展其才能，而且由於他厭惡庸俗的上流社會，對達官顯貴採取諷刺的態度，竟被貴族階級視為「古怪的人」，以致斷送輝煌前程。這個不同上流社會合流的人物處處受到環境的壓抑，只能讓自己的才能向畸形的方面發展。善心和良好的感情沒有人呼應，他只好變成仇視一切的人；說真話不受信任，他只好學會作假騙人；知識和學問沒有價值，他倒領略了耍手腕是成功的秘訣。長久下來，他的心隨著時光流逝逐漸「變得像鐵一樣又硬又冷」；但他不甘心沈淪下去，於是掙扎、苦悶、徬徨，精神上痛不欲生。這一切的過錯，不在於畢巧林個人，而是那個窒息一切生機的俄國貴族社會。<sup>25</sup>

畢巧林說：「……我本來很純樸，可是大家說我很滑頭：我就不再那樣坦率了。我本來在感情上善惡分明，可是沒有誰愛護我，大家都侮辱我：我就變得容易記仇了。我從小鬱鬱寡歡，別的孩子都快快活活，有說有笑；我覺得自己比他們好，別人卻說我比他們差：我就變得喜歡嫉妒了。我很想愛全世界，可是沒有誰了解我：這樣我就學會了恨。我的黯淡無光的青春，就在跟自己和跟社會的鬥爭中逝去了。我有美好的感情，因為害怕嘲笑，就埋藏在心的深處，美好的感情也就在那兒死去了。我說實話，人家不相信我，我就開始騙人了。在看透世態炎涼之後，我就精通處世之道了，但我看到別人不通此道也很走紅，而且毫不費力地享受我苦苦追求的那些好處。於是我胸中產生了絕望情緒——這不是手槍槍口所能醫治的那種絕望，而是心灰意冷，用彬彬有禮、和藹可親的微笑掩飾著的絕望……」（349-350 頁）

描述了畢巧林在當代的歷史條件下心靈中真善美與假惡醜之間激烈的搏鬥

<sup>25</sup> 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 36。

過程，描繪由本性善良發展到玩世不恭但天良仍未泯滅的情景。<sup>26</sup>

在多餘人的發展中，第二代多餘人摒棄功名利祿的態度，為第四代所繼承。對於擔任官職，礙於見到父親的不良效應，拉夫列茨基對於擔任官職並沒有多大興致，雖然他沒有如畢巧林對官職有激烈厭棄心態，但對於當官基本上是排斥的。

妻子勸他出去供職，他想起父親過去的情景，也出於自身的考慮，不願意去，只是為了取悅妻子，仍舊留在彼得堡。(169 頁)

除了對於供職的排斥外，拉夫列茨基在與小說中官場人物代表潘申不佳的印象及激烈爭辯中，顯出他對於官職的不友善態度。他寧願選擇把土地耕種得好些，站在農民的陣線中，為他們設想，也不願當任追求名利的官職，也顯出拉夫列茨基的進步性。

### 三、揚棄損人利己的行徑

在《當代英雄》中，我們看到主人公畢巧林不斷追求刺激放蕩冒險行爲，以絕對自由主義的姿態向現存制度挑戰。這種反抗雖然具有進步性，但最後只使弱者成爲犧牲品，受到更多傷害，無損於封建制度的一根毫毛，畢巧林的當代英雄之名，無非成了一大諷刺。別林斯基曾說：「長篇小說的中心思想就表現在主人公畢巧林身上‘當代英雄’是我們時代的哀思。」<sup>27</sup>相較於小說中其他

<sup>26</sup> 顧蘊璞：《萊蒙托夫》，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130。

<sup>27</sup> 轉引自曹陽、廖祥紅：〈淺析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丹東師專學報》第24卷第1期，2002年3月，頁14。

人物，畢巧林這位不像英雄的怪人比起來，周圍的各種俗人顯得卑微，彰顯他「英雄」的美名。別林斯基第一個揭示畢巧林的典型特徵：「一個意志堅強、勇敢、好招風惹事的人。」<sup>28</sup>畢巧林一生都處在難以扼制的精力宣洩和騷動之中，這種精神極度苦悶下的消極反抗，是那年代進步貴族青年的典型心態特徵。

在畢巧林身上，仍可發現多餘人的怯弱和不負責任，他對真摯而高尚的公爵小姐梅麗，熱情而富於犧牲精神的貴婦維拉，好強而單純的美麗小女貝拉的心靈騷擾，充分表現多餘人難以自我負責的本性。他在當時環境支配下的那種空虛無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沒法擺脫，因此苦悶彷徨，甚至玩世不恭。畢巧林有一句名言：「幸福就是自尊心得到滿足」這種強烈的自尊心常常支配和規定著多餘人的行動，乃至他們的精神探索。畢巧林把自尊心「看做是維持精神的養料」，甚至面對可能的死亡時，他還在鏡子裡自我欣賞：「我那張……失眠痕跡的臉上蒙著一層灰白色，而我的眼睛……卻閃耀著驕傲和剛毅的光芒。」狂熱好動與人格分裂是他的兩大個性。也善於自我剖析，他一面對社會不滿，一面也對自己不滿，在他抨擊社會的虛位和道德的淪喪時，又極嚴厲地批判譴責自己的所作所為。他通過不斷自我剖析，把複雜的內心矛盾與痛苦充分暴露出來，深刻地揭示出「多餘人」的性格特徵。<sup>29</sup>畢巧林身上這種嚴重、複雜的矛盾，別林斯基曾稱之為「深刻的天性和可憐的行動之間的矛盾。」<sup>30</sup>他不滿社會，也不滿自己，看不起別人，也瞧不起自己。畢巧林生長在十二月黨人失敗的陰影下，當時的環境讓覺醒的進步知識份子感到改革的無望，對社會進步抱持消極看法，但自身以啓發的思想不容許他們噤不作聲，這樣的矛盾衝突，讓他以消極反抗方式凸顯自己異於他人之處。就像一個青春期中的叛逆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只想與眾不同，不屈從於社會常態，卻走不出自己的路。畢巧林以惡抗惡，輕忽自己生命的價值，所以拿性命和人打賭；他不知愛情在生命中的意義，所以他玩弄女性的感情。他像掃把星造成別人的痛苦，不滿封建時代的壓抑，以激烈方式表達不滿，具有才華，卻對社會毫無助益。

<sup>28</sup> 轉引自曹陽、廖祥紅：〈淺析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丹東師專學報》第24卷第1期，2002年3月，頁14。

<sup>29</sup> 郭雪六：〈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6年，頁122。

<sup>30</sup> 轉引自陳鴻：〈迷惘、墮落的英雄——評萊蒙托夫筆下的多餘人形象〉，《南昌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2001年12月，頁64。

畢巧林接受西方先進的自由主義思想，在生活中，敢於抨擊社會現實。他的內心潛藏一股否定力量，總是不斷地探索反抗。文化衝突集中地通過比奧涅金更深刻的心理悲劇揭示出來。畢巧林的心靈被這種文化衝突撞擊成兩半，一半被西方利己主義的消極思想所侵蝕，另一半為俄羅斯文化的沃土所滋養，仍然活著，在批評心靈的另一半，積極地尋求真理和人生的崇高目標。<sup>31</sup>一個是行動者，另一個卻看著一個人的行動評論他們。一面攻擊貴族社會的偽善，厭棄貴族追名逐利的庸俗生活；另一方面卻無法擺脫貴族的生活習性，遊手好閒、玩世不恭，作威作福，損人利己，把自己的享受建築在農奴痛苦的基礎上。把過剩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華耗費在無謂的冒險上，拿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開玩笑，既害人又害己。正如文本中所描述：「我活著是為什麼呢？我生來是為什麼目的呢？……啊，真的，目的一定有過，並且真的，命運留給我的，一定是一種崇高的使命，因為我在我的心靈裡感到無窮無盡的力量，……但是我卻不能猜到這種使命。」（371 頁）他熱情的火焰無法照亮別人，最後無息的熄滅了，沒留下一點痕跡，沒有人會說他給人類歷史留下什麼。這種對歷史的責任，對個體存在價值的思索，畢巧林有、奧涅金有、連懶惰成性的奧勃洛摩夫也有。畢巧林為追求肯定的東西去否定，為追求崇高的信仰而懷疑，他的否定中有肯定的因素，其心靈的向下滑行總是伴隨著向上的奮揚。是一種美麗而充滿詩意的否定，正如別林斯基所說：「即使是他的惡習也顯示出一種偉大的東西，像閃電穿過烏雲一樣」，「他的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壞的現在，約許著美好的將來」<sup>32</sup>。

第一代多餘人奧涅金表現出孤憤的態度，第二代多餘人延續這樣的態度，且更加激烈的態度，不僅反抗社會也成一顆災星般造成別人傷害。到了拉夫列茨基，不再是光芒萬丈的貴族公子哥兒，他生長在受壓制的家庭環境中，姑母權威式的教養壓抑他的活力，父親軍事化教育造成他思想上的矛盾。直到成年後，拉夫列茨基才自覺教育上的缺失而極力彌補，他不再是引人注目的社交寵兒，而是默默耕耘的知識份子。多餘人到了這一代光芒消逝了，性情變得沉穩且貼近群眾，在愛情世界裡不再是他人幸福的主宰者，而是期待幸福的等待者。拉夫列茨基這代多餘人揚棄一、二代掃把星般地造成他人傷害，成了一位具人

<sup>31</sup> 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 4 期，1992 年，頁 28。

<sup>32</sup> 見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頁 358。引自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 4 期，1992 年，頁 28。

道精神、爲人著想的成熟人，不再是帶給人災難的亂源，把自我拋到腦後，變的較沈穩，爲了愛情犧牲學業，爲了義務犧牲真愛，這是多餘人演進中積極正向的一面。

#### 四、超越愛情的責任感

畢巧林在社會的多餘，是俄國專制制度崩潰過程中的社會衍生物，是貴族走向沒落過程中分化出的人物，正如高爾基指出：「這些人不能爲生活而鬥爭，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地認識到個人存在之無目的，於是把這種無目的只是了解爲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和整個歷史過程之無意義。」<sup>33</sup>他覺得自己的生活是侷促的，自己在社會裡是多餘的，他們想替自己在社會裡尋找舒適的地方，然而卻找不著。他們又不願同所敵視的社會妥協，於是只有墮落到酗酒、玩世不恭或走上自殺的道路。對畢巧林的思想行爲，萊蒙托夫顯然抱著批判的態度，對他冷嘲熱諷，挖苦揶揄。爲此高爾基曾這樣說：「普希金還是欣賞奧涅金的，而萊蒙托夫對畢巧林已經抱著一半冷淡的態度。」<sup>34</sup>

在愛情上畢巧林認爲去佔有一個含苞待放的心靈真是莫大的快樂，這完全體現他做爲貴族階級的自私性、殘忍性。他把貝拉、梅麗、維拉都看作是所存在社會的一部份，表現他對黑暗現實的破壞性反抗，結果是可悲的，無辜者成了犧牲品。看來，他並不是女人的福星，而是她們的災星。畢巧林一段自白中說：「我是爲了自己才愛別人，爲了滿足自己心靈中的一種怪癖的需求。」的確，他捨生忘死的愛是爲了自己，在愛情中排遣苦悶，一旦得到女人，就棄之如敝屣。

<sup>33</sup> 陳鴻：〈迷惘、墮落的英雄——評萊蒙托夫筆下的多餘人形象〉，《南昌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2001年12月，頁64。

<sup>34</sup> 見《俄國文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頁285。引自桑淑鈞：〈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濟南大學學報》第12卷增刊，2002年，頁23。

杜勃羅留波夫一針見血地指出多餘人對待愛情態度的實質。他說：「一切奧勃洛摩夫們<sup>35</sup>在對待女人的態度上，也都要弄出可恥的樣子來。他們簡直就不會戀愛，而且也不知道在愛情中可以找尋一些什麼，正像他們在生活中一樣。當他們把女人當作依靠彈簧而動作的玩偶的時候，他們是不會拒絕去奴役一個女人的心的……」<sup>36</sup>畢巧林玩弄女性感情，爲了證明自己的存在魅力，用盡心思擄獲女性的心，然後再棄之不顧，造成他人失去幸福，家庭破碎。愛對他而言，不是生命中必須的，卻是一種生活的娛樂，他輕忽愛情，一輩子飄飄蕩蕩，不曾爲誰而停留。相較於畢巧林掃把星般地造成他人災難，對自己生命輕忽的態度，拉夫列茨基就像一個性格完美的多餘人，行事謹慎，懂得自我反省，對情感態度單純，不具心機，關懷社會將理想付諸行動，他的人生有較清楚的目標，雖然一切的結局最終是幻影。拉夫列茨基的生命中，愛情左右他生活的幸福，他的悲是因妻子的背叛，他的苦是因爲放棄真愛，他的一事無成是因爲幸福愛情不可求，但對於感情，他的態度是認真的；對於家庭，爲了顧全世俗的要求，他犧牲幸福保全對家庭的義務。不再像畢巧林爲一己之樂，造成他人的災難痛苦。

### 第三節 超越屠格涅夫《羅亭》以言代行的空想

《羅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於一八五五年，一八五六年發表於《現代人》雜誌的第一、二期上。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隨著貴族革命

---

<sup>35</sup> 泛指多餘人。

<sup>36</sup> 見《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頁210。引自張蘭芬：〈多餘人的愛情悲劇〉，《俄蘇文學》第5期，1987年，頁91。



時期即將過去，革命民主主義力量逐漸興起，社會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要求民主的和自由的呼聲日漸高漲，局勢的稍微好轉使作家塑造出真正思想上的鬥士形象——羅亭，他是一位從貴族革命時期過渡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個典型的貴族知識份子形象，是一個語言多於行動，已經擔負不起改革現實任務的多餘人的形象。第四代多餘人拉夫列茨基身上避免了羅亭的某些弱點，如不尚實際，誇誇其談，比羅亭瞭解生活，更能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自己，清醒地評估自己的能力，衡量現實環境，他的一事無成及被畸形的教育與環境所糟蹋了的生活的全部悲劇越來越鮮明地、越來越深刻地被顯露了出來。

### 一、爲俄國革命搖旗吶喊的第三代多餘人——《羅亭》

小說的主人公羅亭是一位出身破落地主家庭的貴族知識份子。一次偶然的機會使羅亭來到女地主達里亞·米哈伊洛夫娜的莊園。在女主人的客廳裡，羅亭很快就以雄辯的口才和滔滔不絕的言詞吸引人們的注意，他談笑風生，言詞好像左右逢源地湧向唇邊。他的熱烈的話語撥動人們的心弦，尤其對女主人的女兒——娜塔利雅產生深刻影響，點燃她胸中追求真理的火焰。這個天真純潔的少女把羅亭看做崇高理想的化身而愛上他，她準備爲了他犧牲一切，離家出走，跟隨羅亭去實現他宣揚的崇高理想和偉大目標。娜塔利雅與羅亭的戀愛遭到母親反對後，她要求羅亭做出最後決定。然而，羅亭卻出乎意料地勸她說：「屈服，當然，只有屈服。」<sup>37</sup>這時，她才恍然大悟原來羅亭只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不久，羅亭離開莊園，繼續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他曾有過改良農田、疏通河道、改革教育等宏偉計畫，但所有這些致力於公益事業的計畫全部

---

<sup>37</sup> 屠格涅夫著，磊然譯：《羅亭 貴族之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84。以下《羅亭》文本資料引自此書。

失敗了。一八五六年版本的《羅亭》以列日涅夫在省城旅店裡與羅亭邂逅相遇為結束。一八六〇年作家在尾聲之後又加了一個結尾：「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巴黎，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高舉紅旗，在攀上街壘時被法國士兵開槍擊中。這個漢子就是羅亭。」

羅亭的世界觀及性格是在四十年代莫斯科大學和柏林大學的進步青年中形成的。因此，他善於思考，內心熱血沸騰，有著甘為祖國和人民獻身的忘我犧牲精神和熱情，並有能言善辯和出色的演說才華。在黑暗政權的年代，在言論受限制，任何行動都不可能進行的條件下，羅亭勇敢號召前進的言論具有特殊意義，激起他人的熱情：他的言論觸動了娜塔利亞的生活，喚醒她優美情感和企望。受到高深教育的羅亭不能從事實踐活動，他會深刻思考、熱烈爭論，卻不會做任何事情。羅亭想要行動並想取得實際效果，但這種企圖終於成了泡影：使河流通航的打算遇到磨坊佔有者的反對而破產；想在農村進行農藝學教育也沒能實現；教育活動由於中學領導人的因循守舊而失敗。他痛苦地認識到那「只是些空話，全都是空話，什麼都沒有做」，浪費了自己的生命。生活之於羅亭就如同一個「怪圈」，不管他怎麼走，最後總是不自覺中返回到原地，他自己也說：「有多少次我像一隻鷹那樣飛出去——卻像一隻被人砸碎外殼蝸牛那樣爬回來。」羅亭實實在在反抗過，只是跳不出貴族階級狹小的世界，掙不脫殘酷時代的羈絆。他們單憑主觀熱情是找不到改造社會的正確途徑的，所以只能在生活和事業的外圍周旋徘徊，一事無成，絕望之餘，他只好承認自己的「無用」與「多餘」，「生來就是無根的浮萍」。<sup>38</sup>

羅亭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繼奧涅金、畢巧林之後又一位「多餘人」形象。雖然他們在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等方面有許多相同之點，但由於羅亭與奧涅金、畢巧林所處時代和環境不同，使他又不同於前二位多餘人。在羅亭身上看到以

<sup>38</sup> 桑淑鈞：〈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濟南大學學報》第12卷增刊，2002年，頁24。

往「多餘人」才氣橫溢，性格軟弱、猶豫不決、自我反省，不乏遠大理想，渴望在社會上有所作為，在社會上找不到自己位置，卻因貴族階級的劣根性使他們意志薄弱，缺乏毅力，於是理想終於變成幻想，終其一生全都一事無成，在事業和愛情上失意等基本特徵。羅亭與周圍的貴族世界格格不入，卻又無法擺脫它；他與貴族社會沒有共同語言，卻始終在貴族圈子裡打轉。他和他的前任「多餘人」奧涅金、畢巧林、一樣庸庸碌碌，一事無成，終於變成一群「聰明的廢物」，成爲「既非烏鴉，又非孔雀」，最終爲社會所拋棄的「多餘人」。

## 二、對社會事業的滿腔熱情

屠格涅夫在《羅亭》中在展示知識份子的思想運動時，旨在探討羅亭在三四十年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這時的貴族知識份子身上雖然流著地主的血液，但已不再是花花公子，差不多已窮困潦倒，腦子裡充滿浪漫主義幻想，卻不只是心理和邏輯的分析家，他們不滿現狀、努力學習、尋求新的方向。他們的演說中充滿勇敢的思想、未來的藍圖……在喚醒沉睡的人們、在揭露農奴制問題上，他們是對社會有用的積極力量。羅亭是一個聰明、高尚而有才華的人，熱愛真理的火焰從未在他身上熄滅。他津津有味談論人的崇高使命、科學和教育的意義、人民的未來，痛責懦怯和懶惰，喜歡音樂，評論詩歌和美，準備隨時犧牲個人利益，「夢想各種各樣的改善革新」，計畫「規模龐大」，滿腔熱情，把「力量都用到公共事業上去」。羅亭不僅在思想理論上戰勝俄國傳統貴族，對青年一代，羅亭是人生的導師和思想的啓蒙者，他在他們心中播下真理的種子。

儘管羅亭的活動傾向是進步的，但它並未帶來實際效果。在沙皇制度的統治下他沒有發揮才能的地方，但他聰明、熱情、勇敢、嚮往真理、憧憬未來，善於喚醒人們爲崇高的理想而奮鬥。屠格涅夫從兩方面解釋這情況：（一）主人公羅亭性格脆弱：他的不堅定的自由主義讓他在困難面前膽怯，他與所有的多

餘人一樣，不瞭解自己的祖國，也不瞭解自己的人民，往往是想入非非，他是軟弱無力的。儘管他高談闊論，侈談人生和自我犧牲的價值和意義，但在他需要行動時，既無動力又無明確的目標。只是一位空喊激烈口號、言行脫節、用空話代替行動的典型人物，無任何行動的毅力，每當遇到阻礙時，沒有任何抵擋的能力，只有屈服。<sup>39</sup>（二）當時俄國現實的歷史條件：當時環境不是發展個人才能的良好條件，貴族知識份子高度發展的天才個性同社會生活的矛盾，使得他們成為多餘人或不需要的聰明人。<sup>40</sup>羅亭是貴族知識份子中的先進者，自視清高，對於腐朽的當權者，他既不願同流合污，更不願賣身投靠，一心想憑自己的智慧致力於社會改革事業。然而他的社會地位與階級侷限性，使他脫離喘息在封建制度下的人民，他不了解俄羅斯，不了解人民，不知道俄國社會之所以腐朽的根源所在，脫離俄國現實和群眾的處境，毫無工作能力的本性。因此，他既缺乏清醒的頭腦，又缺乏堅強的意志，他仍然生活在貴族的庸眾中間，以言論代替行動，靠幻想生活，善於辭令而不善於行動，當現實逼迫他非做出實際行動不可的時候，他便紛紛席捲而逃，以致一事無成。

在俄國多餘人形象發展中，到了羅亭這一代，「多餘人」進入更自覺的反抗時期，羅亭反映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的理想、追求及幻滅過程。羅亭比奧涅金、畢巧林等「多餘人」政治頭腦清楚，對沙皇專制認識深刻：相信科學、熱愛生活，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熱愛公眾利益，忘我工作，為自己的事業和信仰而獻身。「在羅亭那裡，我們可以看到斯坦科維奇、巴枯寧甚至赫爾岑的某些思想的閃爍。他渴望自由、熱愛科學、追求真理，曾經沈醉於德國詩歌、德國浪漫主義人品和德國哲學的天地中。<sup>41</sup>」

他的朋友稱讚他「有天才的稟賦」「他有熱忱，而這一點……正是我們時代最可貴的品質。」善於用關於自由、關於自我犧牲和關於工作樂趣的言詞，去

<sup>39</sup> 郭雪六：〈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6年，頁122。

<sup>40</sup> 參閱劉念群：〈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多餘人——《羅亭》與《沉淪》之比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8年，頁54。

<sup>41</sup> 陳夢：〈新舊文化交替的悲劇典型——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惠州學院學報》第22卷第5期，2002年，頁86。

感召和點燃青年的心靈，播下積極奮發的種子，使之萌生出高尚的思想和感情，儼然一個不甘沈淪，雄辯滔滔的宣傳家和鼓動家，他知道如何喚醒人民對真理的熱愛，他的「每一個字都好像徑直從他的靈魂深處噴湧出來，燃燒著全部信仰的火焰」，激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去行動的願望，這是他高於二、三十年代的多餘人之處。羅亭比前人們更富於思想、信念和追求，他也比前人更明確意識到自己在言論上和行動上的差距，他是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的新典型，是時代的英雄，又是時代的犧牲者。羅亭固然有他的弱點，但是也替他的國家盡了力量，他喚醒能夠行動起來的力量。

羅亭能夠突破前兩代「多餘人」狹隘的個人主義圈子，不追求金錢財富和個人地位，熱情投身社會生活，與貴族保守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這在當時是有積極作用的，也許很難說這代「多餘人」中的哪一位，為未來的俄國改革做過什麼具體的實際工作，可是他們騷動不安的掙扎與反抗，卻是人類改革事業中的一顆閃亮的露珠。」<sup>42</sup>高爾基曾有過論述：「如果考慮到時代的各種條件……我們就應該承認：在那個時代，理想家羅亭比實踐家和行動者更有用。」

「理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傳播者，現實的批判者，可以說他在耕耘處女地，當初的實踐家又能做些什麼呢？」<sup>43</sup>如果說奧涅金、畢巧林對農奴制俄國的抗爭還很不自覺，幾乎沒想到社會問題，那羅亭對這個黑暗社會的憎恨更自覺，且能積極宣揚崇高的理想，獻身於公眾事業，這說明四十年代的多餘人有了新的時代特色。羅亭的空喊口號，始終醉心公益事業，不倦地忘我工作，一輩子為思想服務。他滿懷理想，卻是無法落實的夢想，在生活的實際行動中，因為不了解社會實際需要，一事也不成功。羅亭有著豐富思想，他的世界主義雖然有些空泛，卻包含對人類的美好理想與崇高使命的執著追求，走出自我，投身於為

<sup>42</sup> 王曉春：〈殘酷時代裡的悲劇——評俄羅斯文學中的四代多餘人〉，《外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90年，頁85。

<sup>43</sup> 轉引自桑淑鈞：〈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濟南大學學報》第12卷增刊，2002年，頁24。

思想服務的事業。羅亭的悲劇在於，當他試圖從反省的人轉變為行動型的人時，卻力不從心了。在思想的天地、精神的生活中，羅亭得心應手，才華洋溢，思路敏捷；但一到實際生活中，他總是不知所措，碰到阻礙就瓦解了。

拉夫列茨基承繼羅亭具崇高美德、嚮往浪漫主義的優點，富有理想和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也不同于羅亭，他「要求首先得認清人民的真理，並在這真理面前順從下來」，在同潘申爭論時，拉夫列茨基把這個問題提到重要地位，顯示新一代多餘人在思想上更親近人民，不再是在象牙塔裡空談計畫。拉夫列茨基在年輕時就懷著滿腔為社會貢獻的抱負，在屢受牽制下，仍念念不忘心中的社會事業。在外國生活的時光中，他惦念著「……來年冬天我一定要回俄國，著手我的事業了。」他將眼光放在社會中，關心人民的需求，為弱勢的農民設想，能充實自己知識，具有實用性的學問，且在自己莊園中實施而稍有成效。從這一點可看出，在一系列多餘人發展過程中，多餘人愈來愈接近群眾中，對社會的關懷也愈多。

### 三、超越愛情的怯弱

羅亭在愛情上畏難膽怯，他的性格是軟弱的，他與娜塔利雅相愛，可是一遭到她母親反對，就屈服了，只是哀嘆命運的不公。辜負娜塔利雅期望。正如他給娜塔利雅的信中所說：「我始終將是一個半途而廢的人，正如從前一樣……只要碰到第一個阻礙——我就完全粉碎了；我和您之間的經過就是證明。」（97頁）羅亭一生沒有做成功一件事，關於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是的，自然稟賦給我的很多；但是我將碌碌而死，連一樁和我的能力相稱的事也做不出。」（96頁）然而，這並不全是羅亭的過錯，主要囿於當時的社會條件，加之本人脫離

人民、缺乏毅力，使他無論是在社會事業上還是在愛情事業上都碰了壁，遭到慘敗。羅亭在對待愛情的問題上，屈從於貴族的習慣和偏見，與奧涅金有相似點。與娜塔利雅相比，羅亭顯得渺小、軟弱，在需要行動時，是那麼無能為力。

我傷心的是我錯認了您……我來求您的主意，而且在這種時刻，可您的第一句話就是屈服……屈服！原來您就是像這樣來實踐您所高談的什麼自由呀！犧牲呀！（84頁）

羅亭對於情感的態度在挑起女性的情感後，隨即畏縮，擔心影響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不敢承擔愛情的責任，面對熱烈的愛情時，他驚慌失措地逃避了。不敢追求所愛，卻熱中於挑起他人的激情，充分展現多餘人軟弱的一面，即使如此，較之前兩代多餘人對於女性的濫情，羅亭對愛情的看法是神聖純潔的，他不隨意玩弄女性間，具有較崇高的情懷。而到了拉夫列茨基這代，更往前邁進一步，他能主動追求愛情，雖然內心膽怯，仍具有行動能力，且如願得到美人歸，只怨所遇非良婦，在愛情受到背叛的挫折。心中縱然痛苦無奈，仍能振作奮發，直到再遇麗莎，激起生命中的浪花，以更謹慎的心思，具體的行動，追求心中所屬的愛。又無奈敗在世俗牽絆下，自動退縮，放棄真愛。拉夫列茨基的愛情雖以失敗告終，但他主動追尋愛情的精神，遠較羅亭具有行動力，有積極意涵，他能省察自我心意並有所行動，且專情對待，是多餘人在愛情上進一層的發展。

羅亭與拉夫列茨基在愛情的態度上有相同之處，即為道德意識和情慾本能間的矛盾：羅亭拒絕娜塔利雅追求，出於一種傳統上的道德責任，因為自己是個窮人，是個漂泊者，對未來命運沒有絲毫把握，他所從事的事業不知結果如何，所以不能連累她；《貴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在妻子死訊傳來後，他才決定與麗莎在一起，不料妻子突然歸來，礙於責任他又回到妻子身邊。其中選擇的關鍵點，在於道德理念與傳統義務觀念。這顯現了這兩代多餘人更貼近現實

社會的規範，貴族知識份子率性而為的不負責態度正逐漸蛻變。

## 第四節 開啓萎靡不振的奧勃洛摩夫

### 一、萎靡不振的第五代多餘人——奧勃洛摩夫

岡察洛夫長篇小說《奧勃洛摩夫》（一八五九年）主人公奧勃洛摩夫是最後一個多餘人典型，尤其齷齪不堪，主要特徵是無可救藥的惰性。小說情節簡單，分四部分：杜勃羅留波夫做了這樣的概括：「奧勃洛摩夫在第一部中躺在沙發裡；在第二部中他到了伊林斯基家裡，愛上了奧爾迦，她也愛上了他；在第三部中她發現自己；看錯了奧勃洛摩夫，他們便分手；在第四部，她嫁給；奧勃洛摩夫的朋友斯托爾茲，而奧勃洛摩夫卻娶了他的房東太太。」塑造一個剝削階級寄生蟲的典型形象。

奧勃洛摩夫雖說生性善良、頗有教養，但由於祖傳的莊園領地和三百多個農奴供其享用，故無憂無慮，無所事事，天長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興趣，養成了悠閒散漫、好喫懶做的習慣。生長的环境因有無數的農奴不斷奔忙和勞動，使得地主老爺們四肢不動，好逸惡勞，坐享清福，害怕新事物與變動。在這塊與世隔絕領地上，奧勃洛摩夫家族幾乎與世隔絕，陶醉於美味佳餚及昏睡的悠閒生活中，只扮演人生三幕劇——生育、結婚、安葬。把生活看作是安靜與無為的理想，迴避勞動，不願動腦思考，正是這種「腐敗的農奴制」下的社會環境孕育出奧勃洛摩夫這個「怪胎」。從童年時代起全家大小就開始提醒他，他是個少爺、老爺，自己動手做事是可恥的，有事只要吩咐奴僕就行了，而父母和保母又寸步不離，不准他一人去玩，他從小就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甚至還以自己不會穿襪子為光榮。無論友誼、愛情都沒法使他振作，從早到晚都在昏睡中度過，頂多從床上移到沙發裡，躺臥成了他的常態，「吃」和「睡」成為他生活的全部內容，他成為一個懶惰的寄生蟲，直到最後默默地離開人世。



他根本不出門，懶得穿禮服、打領帶，整天穿著一件磨光了的睡衣；他的房間從不打掃，四壁結滿了蜘蛛網，鏡子積滿厚厚的灰塵，已經照不出東西來，卻可用來寫字。他另一特徵是寄生性，想要什麼東西一眨眼就有三、四個僕人跑過來伺候，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養成他寄生蟲的性格，還大言不慚地說：「托天之福，我這輩子還沒有自己穿過襪子呢！」他不但喪失生活的能力，甚至不會辦理最簡單的事。唯一的生活能力是幻想：想像自己是「一位所向無敵的統帥」，或是「榮獲桂冠的大思想家或大藝術家」，且在床上一次又一次制訂「整頓和改良領地的計畫」，不過這一切都只是遐想，從未實現過。「這個人物反映了當時俄國生活的停滯，他是貴族地主階級懶惰、守舊、消極、寄生性的集中體現，而他身上的所有病症都是農奴制的產物，說明社會上要求變革現狀的願望。<sup>44</sup>」

列寧曾深刻指出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奧勃洛摩夫特徵：「俄羅斯已經起了三次革命，但奧勃洛摩夫還保留下來，以迄於今，因為不僅地主中間有奧勃洛摩夫，而且在農民中間也有奧勃洛摩夫，不僅農民中間有，而且知識份子中間也有，而且不僅知識份子中間有，而且工人與共產黨員中間也有。只要看看我們怎麼辦公、開會，怎樣在各個委員會工作，就可以說，老奧勃洛摩夫還依然是有的，應當長久地沖刷他、督促鞭策他，以期成爲另一種有用的人。」<sup>45</sup>

## 二、延續拉夫列茨基善良本性

我們不能否認，奧勃洛摩夫還屬於貴族中優秀人物，他溫柔敦厚、平和恬淡，曾經對生活抱持批評態度，也曾有過做點什麼的願望。頭腦中充滿理想，他曾在腦袋中一次又一次制定整頓自己領地的種種改良和變革的計畫，預備施用各種嶄新的、經濟的、嚴格管理的和其他辦法。這一切都因他「奧勃洛摩夫性格」而沒有與生活做任何力所能及的奮鬥。如果說奧勃洛摩夫之前的「多餘人」的形象還在不同程度上能與本階級產生裂痕，有些進步的願望和作為，那

<sup>44</sup> 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頁 70。

<sup>45</sup> 見列寧：〈論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際與國內形勢〉一文。轉引自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 4 期，1992 年，頁 31。

到奧勃洛摩夫就完全喪失其進步性，只剩下躺臥不起的寄生性，這正說明俄國農奴制已經到了崩潰與瓦解的末日。<sup>46</sup>屠格涅夫《貴族之家》為貴族階級唱出輓歌；到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則判決多餘人：「你早已死去了。」無情地道出多餘人的極限。奧涅金、畢巧林、羅亭、拉夫列茨基之輩，在巨大的時代痛苦重壓下，儘管充滿困頓和惶恐，畢竟還未束手待斃，他們還做絕望的掙扎苦鬥，人們至少還能從他們那裡看到憤怒的火花，聽到幾聲不安的吶喊，從而得到一些啓迪。到了第五代多餘人形象中的所有積極因素幾乎已經消失殆盡，貴族知識份子已經完全隨著貴族社會日益沒落。奧勃洛摩夫身上只剩下貴族地主末代子孫的無能和慵懶，寡廉鮮恥的寄生和無可救藥的墮落，把他身上的一切活力沖刷地一乾二淨，生活顯得更為枯燥、頹唐、腐朽、沒落，完全成為對社會無用、對自己無益的廢物了。

奧勃洛摩夫繼承拉夫列茨基的善良溫和的本性，固守著家園，保持長久的習慣，對社會不做激烈抗爭，沒有轟轟烈烈的行動，一輩子沒有積極建樹。如果說，以前的多餘人都把精神探求的目光轉向西方，在那裡尋找信仰和精神生活的樂土，那奧勃洛摩夫則與之相反，在俄羅斯古樸鄉村中尋找心靈的寄託。承繼拉夫列茨基對國家眷戀之情，身在異國、心繫家鄉，期許自己幹一番事業，對家鄉國土的熱愛之情，奧勃洛摩夫在家鄉國土中成長，不離開莊園一步，像守護貴族最後一道權威似地堅守岡位。

### 三、多餘人形象的悲歌

奧勃洛摩夫作為多餘人文化類型的延續與發展，不但具有與以前多餘人相同的一些特徵，且具有與之不同的新質。他不同於以前多餘人那種與相互對立的兩種文化相衝突與碰撞為結構，而是遠離文化衝突核心形成一種自我滿足、穩固的生活方式。缺乏以前多餘人探索生活、介入生活、改造生活的熱情，而是退出生活，旁觀生活，陶醉在自己精神生活的象牙塔中。<sup>47</sup>如果說羅亭是「在

<sup>46</sup> 郭雪六：〈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6年，頁124。

<sup>47</sup> 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92年，頁30。

應該行動的地方習慣於反省」，那奧勃洛摩夫的缺點在於從內心生活完全取代行動，把內心生活看成是一種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

在愛情問題上的失敗表現了多餘人在時代生活中主角地位的喪失。《奧勃洛摩夫》仍採用與多餘人小說通過愛情關係揭示多餘人性格的模式凸顯主人公性格，但男女主角在愛情中的位置與關係卻完全改變了。以前多餘人在小說中總是作為時代英雄獲得優秀貴族少女的真摯愛情，但奧勃洛摩夫則成為落伍的人物，不為少女所愛，在性格上不如少女，終不能得到幸福愛情，成為愛情中的悲劇人物。

作為時代和作家頭腦共同作用的產物，「多餘人」形象系列，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變化，不同的時代烙印，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使他們成為各自時代條件下的「這一個」。如別林斯基所說：他們既是「一個特殊世界的人們的代表，同時還是一個完整的個別的人」<sup>48</sup>在生長在二十年代普希金那裡，正值「十二月黨人」帶來光明之際，他身上必然地奔流著「十二月黨人」的熱血，因而他的反抗充滿激情、樂觀和浪漫色彩。作家在塑造奧涅金時，更多把筆墨集中於表現人物騷動不安的反抗情緒上，顯現出其無所事事，精神空虛的狀態。而畢巧林屬於更晚的時代，奧涅金身上存有的十二月黨人式的激情和樂觀情緒，此時已被殘酷的專制統治掃除的乾乾淨淨。健全的社會生活遭到尼古拉一世殘酷鎮壓，貴族中進步的代表人物普遍受到懷疑和監視，對蓬勃的社會事業幾乎不敢存有任何希望。這樣的時代重壓，使多餘人身上更多體現出一種孤憤悲涼的情緒。萊蒙托夫採用對話、獨白、心理描寫等「心靈剖析」的手法，表現「多餘人」此一時期性格分裂的巨大痛苦，為滿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惜犧牲別人。羅亭的時代是社會有所轉機的階段，四十年代爭取民主自由的社會意識普遍覺醒，為他的反抗和追求提供肥沃的土壤，使他能更自覺地走自己選擇的道路。《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形象以極大的藝術力量體現出

<sup>48</sup> 王曉春：〈殘酷時代裡的悲劇——評俄羅斯文學中的四代多餘人〉，《外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90年，頁86。

四十至五十年代貴族知識份子的典型特點，屠格涅夫描摹出主人公的猶豫徬徨、幻想、痛苦，把他寫成是反映整整一個時代的縮影。屠格涅夫通過對主人公短短七天生活的描寫，把「多餘人」充滿時代熱情，積極衝破環境的壓制，追求人生理想，為民主革命吶喊卻無力落實美好願望的性格表現得活靈活現，卻被孱弱的性格所打敗，愛情幻滅，改革不完全成功，仍堪稱是多餘人中最完美的一位。不管在事業上及愛情上，拉夫列茨基展現的都超越前三代多餘人，可說是多餘人形象中最頂峰的發展，同處於封建時代貴族圈中成長，軍事化的教育未泯滅他的同情心，具反省力、敏銳觀察力，追求進步知識，為社會人民設想，將理想化為行動，都較前三代具有意義。

## 第五章 結 論

### 一、俄國文化形成多餘人形象

俄國封建制度的階級腐化，加深下層農民與貴族間的隔閡，貴族新一代知識份子受鄰近歐洲文化影響，思想啓發，具進步改革意識。成長過程中，養尊處優的生活，已養成他們孱弱性格，在拋不下舊包袱，加上新文化刺激下，對國家不滿的情緒矛盾，造成內心的矛盾掙扎，終生無所適從，不僅一事無成，連個人幸福的愛情也如泡沫般幻滅，成爲社會的「多餘人」。形成俄國十九世紀文學所特有的文學典型，僅有在俄國如此的環境氣氛中，會發展這樣獨特的性格形象，這與俄國文學爲人生的實用性是息息相關的。也正是在這生活氣氛中塑造出屠格涅夫這位關懷社會，以現實手法爲創作主調的作家，寫作「多餘人」文學形象，文學史上曾有人把屠格涅夫稱爲「多餘人」的歌手。<sup>1</sup>本論文主題《貴族之家》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形象以極大的藝術力量體現出四十至五十年代貴族知識份子的典型特點，屠格涅夫描摹出主人公的猶豫徬徨、幻想、痛苦，把他寫成是反映整整一個時代的縮影。

綜觀「多餘人」家庭的成員，雖然各處不同的時代，但他們的思想性質是一脈相承的，在塑造這批人物形象時，作家們把主要筆墨傾注在形象的共性上。這一家族的成員都是貴族知識分子，他們有知識，甚至博學多才、才智非凡，目光敏銳，不爲官職錢財所利誘，既能敏感覺察時代的步伐、社會的前進，能看出現實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自覺地對社會抱批評態度，但又脫離人民，脫離社會實踐；既厭惡貴族社會，又無力與本階級決裂；既痛恨貴族社會的虛偽與庸俗，又掙脫不掉這個社會的傳統和偏見；既不滿足於自己的上流社會，又不能跳出這種生活的小圈子與人民結合，陷在盲目和失敗的痛苦裡，碌碌地

---

<sup>1</sup> 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頁89。

生過之後又默默地死去。他們頭腦聰明，自視甚高，不願虛度一生，希圖擺脫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渴望尋求一種新的生活，但空泛的貴族教育和好逸惡勞的貴族生活，雖有變革現實的抱負，但缺少實踐。生活空虛，毫無毅力和恆心，沒有向貴族社會抗爭的勇氣，只是用憂鬱、彷徨的態度對待生活，無明確的生活目標，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他們反抗或積極或消極，在他們身上體現「多餘人」無根浮萍的飄移不定性。在無謂的獵奇中尋求刺激，白白浪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他們一代又一代地找不到在這個世上的位置，成為「聰明的廢物」，在社會上無所作爲，就成了社會上「多餘」的人。這樣的形象不僅是時代產物，也是真實人生的寫照，如赫爾岑說：「『多餘人』形象是這樣的富於民族性，在一切凡是俄國多少得到認可的長篇小說和長詩中，都可以見到，這不是因爲他們想抄襲它，而是因爲你經常可以在自己身邊或者在自己本身找到他。<sup>2</sup>」

## 二、《貴族之家》是多餘人形象的轉捩點

客觀而論，這些貴族知識份子對社會具有啓發的積極意義，安年科夫在《軟弱的人的文學典型》文中強調「多餘人」的進步作用，他以爲這類人的才華得不到發揮，是因爲環境扼殺他們。赫爾岑也曾說過：「多餘人的表現是什麼也不追求，珍惜自己的無拘無束；不追求地位，所有這一切在專制皇朝統治下就被稱作是反動派。<sup>3</sup>」像奧涅金、畢巧林、羅亭這樣出類拔萃的人物，縱有非凡才智，不願虛度年華，幻想建功立業，但在普遍停滯、一片蕭條的當代社會裡，是無法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和崇高事業，無法從事有意義的社會活動的。他們脫離舊的生活軌道，但又看不到變革現實的道路，在生活中找不到適當的位置，

---

<sup>2</sup> 轉引自同上註。

<sup>3</sup> 陳夢：〈新舊文化交替的悲劇典型——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惠州學院學報》第22卷第5期，2002年，頁85。

精神上無所寄託，因而苦悶徬徨、鬱鬱寡歡，患了時代的憂鬱症，成為「既非孔雀，又非烏鴉」的中間人物。

《貴族之家》多餘人生活在階級地位衝突、文化衝擊及歷史地位、矛盾的時代環境中，塑造出他矛盾的性格，文化的刺激鼓舞他前進，為社會貢獻心力，但貴族教育造成他怠惰個性，不願放棄已得利益，壓制他的行動能力。小說中呈現一個外型強健、內心羞怯的人物肖像，初步顯示出不對襯的形象，加上在個人理想追尋上的失敗，愛情上的退縮，更凸顯拉夫列茨基一生的無成，相較小說中其他人物的善惡性格、悲喜人生展現，他顯得更為多餘，僅堪稱是道地的社會「多餘人」

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多餘人系列形象中，從貴族初步覺醒的第一代奧涅金，玩世不恭的第二代畢巧林，到第三代空談的羅亭，第四代畏縮的拉夫列茨基，至第五代頹廢的奧勃洛摩夫，在此群像中，拉夫列茨基扮演一轉捩點的角色。他繼承前幾代多餘人覺醒的精神，不滿於貴族浮靡奢華生活，關懷社會，將視野伸展到下層民眾之中，且較前幾代具有積極性地努力求知，滿懷理想地想實行於莊園中。雖小有所成，但整體而言，仍步上多餘人的後塵，軟弱無能，在事業上終未能大放異彩，對社會有所貢獻。在愛情上，拉夫列茨基突破奧涅金的冷漠無情，畢巧林的玩弄感情，羅亭的逃避愛情，積極付諸行動，追求感情。當真愛來臨，幸福唾手可得那一刻，現實的壓力，讓他屈服了，終未能有圓滿愛情。

「多餘人」在俄國歷史的進程中畢竟起過某些進步作用，它表現沙皇統治下先進知識份子對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強烈不滿和反抗，並探尋俄羅斯的前途和命運，儘管這些不滿和反抗是消極的，探索是軟弱的、模糊的。在多餘人傳承上，《貴族之家》主角拉夫列茨基具有積極意義及行動力的多餘人，是多餘人形象的巔峰，以其鮮明的個性，多采的風姿和異常的豐富性，永遠在世界文

學寶庫中佔有一席光輝的地位。

### 三、俄國文學多餘人形象的現代意義

作家藉由多餘人形象小說揭示俄國社會的種種矛盾，批判和譴責專制農奴制和腐朽的貴族階級，探討貴族先進知識份子的社會歷史作用，以及這一進步作用的消失和平民知識份子取而代之的必然歷史過程。「多餘人」畫廊為我們提供一部俄國貴族革命形象化的歷史，對我們認識俄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特點有很大的藝術價值。多餘人的價值在於「他們在這樣一個時代生活著、思想著：他們的豪言壯語，他們對專制的農奴制的現實的批判態度，他們的思想都是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同時，也是歷史上所必需的事業。」<sup>4</sup>我們在為這組形象的悲劇感嘆時，也從歷史反思的角度，對他們及其時代有了一個本質的了解。

多餘人形象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典型形象，在當代文學為人生的寫實文學風潮下，屠格涅夫《貴族之家》多餘人形象呈現了社會中貴族知識份子在環境遽變，西方文化刺激下，內心無所適從，從而迷失人生方向，一事無成的樣貌。「多餘人」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整個俄羅斯文學，就是以形象探討這一悲劇的根——「誰之罪」的問題：「農奴制是一切罪惡的病根。」通過展示「多餘人」家族性格的形成發展和走向毀滅的歷史過程。作家們通過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現實的黑暗，希望改變現實，扭轉時局。或許人們會認為這樣的形象已是歷史中的足跡，實際上多餘人命運跨越時空和國界的命題，即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國度裡，在代表未來的青年團隊裡，會出現類似本分的優秀青年和拉夫列茨基幾近的熱寫青年間的矛盾和內在緊張。

「多餘人」並非一個世紀所有，更非一個國家所為，也絕非一個文學作品獨具。即使到了喧囂的二十世紀，在高科技發展、競爭壓力加劇的情況下，人心得不到平靜，人類的自我認同及自身定位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迷失於廣漠人海中，找不到生命的出口，「我是誰？我在何方，我該何去何從？」，一種



喪失自我、尋找自我、尋找精神寄託的「孤獨」情節便應運而生，甚而成了人群中的活死人，終生一事無成。以致現代堅守立場的知識份子有類似「多餘人」的感受和感慨——是逆水行舟繼續承擔文化英雄的社會角色，還是退守書齋，獨善其身做一位知識崗位模範呢？如何抉擇，游移中間灰色地帶卻是極無奈、痛苦的，因而為避免悲劇重演，仔細認識多餘人，對現代知識份子確立自我定位是有意義的。

---

<sup>4</sup> 郭秀媛：〈再論多餘人〉，《河北大學學報》第 25 卷第 5 期，2000 年 10 月，頁 107。

## 附錄：屠格涅夫大事年表（1818年—1883年）

- 1818年 1歲 10月28日（11月9日），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誕生於奧廖爾城。
- 1827年 10歲 屠格涅夫全家遷居莫斯科。屠格涅夫進入威登加麥爾寄宿學校。
- 1829年 12歲 8月—11月，於亞美尼亞學院的寄宿學校學習。
- 1833年 16歲 9月20日（10月2日），考入莫斯科大學語文系。
- 1834年 17歲 秋，轉入彼得堡大學哲學系語文專業。9月—12月，寫作詩劇《斯捷諾》。
- 1836年 19歲 6月9日（21日），畢業於彼得堡大學哲學系。
- 1837年 20歲 1月底，在恩格利加爾特大廳舉行的上午演出會上邂逅普希金。  
1月底，參加普希金告別式。  
6月24日（7月6日），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兩年間寫了近百首短詩。
- 1838年 21歲 4月，《現代人》第一期首次刊載屠格涅夫的作品：詩歌《黃昏》。  
5月15日（27日），出國去柏林大學聽課。與格蘭諾夫斯基和斯坦科維奇（二人與別林斯基等均係當時莫斯科哲學—文學小組領導者）交往密切。
- 1839年 22歲 秋天回國。12月，兩次見到萊蒙托夫。
- 1840年 23歲 1月，自彼得堡出國去義大利。  
5月—12月，僑居德國，在柏林大學研究哲學、語言文學和歷史等學科。  
與巴枯寧相識並成爲好友。
- 1841年 24歲 5月21日（6月2日），回彼得堡。  
9月—12月，留居莫斯科。在莫斯科葉拉金娜家兩次見到果戈理。  
《現代人》和《祖國記事》分別刊載屠格涅夫的詩歌。
- 1842年 25歲 4月—5月，順利通過哲學碩士學位的考試。  
4月26日（5月8日），屠格涅夫的女兒波琳娜誕生。  
5月—7月，留居莫斯科，與赫爾岑相識。
- 1843年 26歲 2月，與別林斯基相識，交往日益密切。  
4月，長詩《巴拉莎》出版單行本，署名“屠·盧·”。  
6月，任職於內務部。

- 10月28日(11月9日)，與波麗娜·維亞多的丈夫路易·維亞多相識。
- 11月1日(13日)，與法國著名女歌唱家波麗娜·維亞多相識。
- 1844年 27歲 在彼得堡帕爾戈洛沃別墅度夏，幾乎每天與別林斯基見面。
- 《祖國記事》與《現代人》刊載屠格涅夫的《現代人》詩歌，《祖國記事》第11期刊載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安德烈·科洛索夫》與涅克拉索夫交往密切。》
- 1845年 28歲 1月，長詩《談話》出版單行本。
- 4月18日(30)，辭去內務部職務。
- 5月—11月，在法國旅行。
- 11月，回彼得堡，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識。
- 1846年 29歲 1月，《祖國記事》第一期刊載屠格涅夫的長詩《安德烈》。
- 《彼得堡文集》刊載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三幅肖像》、長詩《地主》以及拜倫、歌德詩歌的譯文。
- 8月，在《現代人》雜誌社當編輯，與涅克拉索夫、別林斯基經常見面。
- 10月，《祖國記事》第10期刊載劇本《囊空如洗》。
- 1847年 30歲 1月初，《現代人》第1期刊登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霍爾和卡里內奇》(《獵人筆記》的第一篇小說)。
- 《祖國記事》第1期刊載中篇小說《好決鬥的人》。
- 1月下旬，去德國柏林。
- 2月，《現代人》從第2期起連載刊登《獵人筆記》中的各短篇小說。
- 1848年 31歲 全年僑居巴黎，常與赫爾岑、巴枯寧來往。
- 11月，《現代人》第11期刊登喜劇《麻繩專在細處斷》。
- 撰寫喜劇《食客》。
- 1849年 32歲 全年僑居法國。書刊檢查機關禁止上演喜劇《食客》。
- 7月，喜劇《貴族長的早宴》完稿。
- 9月，《現代人》第9期刊登劇本《單身漢》。
- 10月14日(26日)，彼得堡亞歷山大劇院舉行《單身漢》首場演出。
- 12月，彼得堡上演《貴族長的早宴》。
- 1850年 33歲 3月，劇本《大學生》(《村居一月》)完稿。
- 4月，《祖國記事》第4期刊登《多餘人的日記》。

書刊檢查機關查禁劇本《大學生》。

6月，屠格涅夫回國。

10月，送女兒波琳娜去巴黎維亞多夫婦處。

11月16日（28日），屠格涅夫的母親去世。屠格涅夫去莫斯科奔喪。

1851年 34歲 1月，《祖國記事》第1期刊登喜劇《外省女人》。

1月18日（30日），出席莫斯科小劇院舉行的《外省女人》的首次演出。

11月3日（15日），出席果戈理親自朗讀《欽差大臣》的文學會。

12月10日（22日），彼得堡亞歷山大劇院首次演出喜劇《麻繩專在細處斷》。

1852年 35歲 1月，彼得堡首次演出喜劇《囊空如洗》。

2月，《現代人》第2期刊登短篇小說《三次相會》。

3月6日（18日），書刊檢查機關准許《獵人筆記》出版單行本。

3月13日（25日），《莫斯科新聞報》第32號刊載屠格涅夫悼念果戈裡的文章《彼得堡來信》。

4月16日（28日），因發表悼念果戈裡的文章，屠格涅夫被捕。

4月—5月，撰寫短篇小說《木木》。

5月16日（28日），獲釋。

5月18日（30日），被放逐到斯巴斯科耶，流放期為一年半。

8月，《獵人筆記》出版單行本，批准該書出版的圖書檢察官沃夫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撤職。

1853年 36歲 7月，費特米到斯巴斯科耶。屠格涅夫與其相識。

12月，流放期滿，獲准離開斯巴斯科耶。

1854年 37歲 1月，《現代人》第1期刊登中篇小說《兩個朋友》。

3月，《現代人》第3期刊登短篇小說《木木》。

9月，《現代人》第9期刊登中篇小說《僻靜的角落》。全年常與涅克拉索夫交往，並成為知己。

1855年 38歲 1月，《現代人》第1期刊登劇本《村居一月》。

4月，《祖國記事》第4期刊登中篇小說《雅可夫·巴森科夫》。

6月—7月，在斯巴斯科耶撰寫長篇小說《羅亭》。

10月3日（15日），初次致函托爾斯泰，希望與其往來。

- 11月21日(12月3日),托爾斯泰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屠格涅夫處小住。
- 1856年 39歲 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奧斯特羅夫斯基和格里戈羅維奇簽訂自1857年起與《現代人》雜誌合作四年的《四君子協議書》。
- 1月—2月,《現代人》第1、2期連載長篇小說《羅亭》。
- 7月21日(8月2日),自彼得堡出國旅行。
- 8月—10月,在倫敦多次會見赫爾岑。
- 11月,出版《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
- 1857年 40歲 3月,在法國經常與托爾斯泰見面。
- 撰寫中篇小說《阿霞》,並開始寫長篇小說《貴族之家》。
- 1858年 41歲 1月,《現代人》第1期刊登中篇小說《阿霞》。
- 2月—6月,去義大利各城市旅行,後又去維也納、倫敦、巴黎。
- 5月底,自巴黎回彼得堡。
- 6月—10月,住在斯巴斯科耶,加緊寫作長篇小說《貴族之家》。
- 1859年 42歲 1月,《現代人》第1期刊載長篇小說《貴族之家》。並開始寫長篇小說《前夜》。
- 4月—9月,僑居國外(巴黎、倫敦)。
- 8月,《貴族之家》出版單行本。
- 9月—11月,住在斯巴斯科耶。《前夜》完稿。
- 1860年 43歲 1月,《現代人》第1期刊載《哈姆雷特和唐吉訶德》一文。
- 2月,《俄羅斯導報》第1期刊載長篇小說《前夜》。
- 1月—3月,撰寫中篇小說《初戀》。要求涅克拉索夫不發表杜勃羅留波夫批評《前夜》的論文《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
- 3月,《讀書文庫》第3期刊載中篇小說《初戀》。
- 3月29日(4月10日),仲裁法庭審理岡察洛夫對屠格涅夫的起訴。岡察洛夫控告屠格涅夫在小說《前夜》中抄襲他尚未發表的小說《懸崖》的情節。法庭認為屠格涅夫沒有抄襲。兩位作家絕交。
- 4月,自彼得堡出國。
- 8月,開始構思長篇小說《父與子》。
- 10月,致函巴納耶夫,表示不再為《現代人》撰稿。
- 11月24日,屠格涅夫在科學院俄羅斯語文學部會上正式當選為通訊院

士。

1861年 44歲 2月—3月，十分關注俄國公布廢除農奴制以後的形勢。

4月30日（5月12日），回彼得堡。

5月—8月，住在斯巴斯科耶，從事農事改革，調整與農民的關係。

5月26日（6月7日），與托爾斯泰同去費特的領地斯捷潘諾夫卡看望費特。

5月27日，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之間發生爭吵，幾乎引起決鬥。

7月30日（8月11日），長篇小說《父與子》完稿。

9月16日（28日），去巴黎。

1862年 45歲 2月7日（19日），彼得堡亞歷山大劇院首次演出《食客》。

3月，《俄羅斯導報》第2期刊載長篇小說《父與子》。

5月，抵達倫敦，與赫爾岑、巴枯寧多次會面。

6月—8月，在國內停留。

9月，首次出版《父與子》的單行本。

1863年 46歲 1月，與路易·維亞多合作將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成法文。

年初，《屠格涅夫選集》法文版出版。

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國療養地巴登—巴登拜訪屠格涅夫。

1864年 47歲 1月4日（16日），屠格涅夫回彼得堡。

1月21日（2月2日），屠格涅夫與岡察洛夫言歸於好。

2月，《時代》雜誌第1期刊載短篇小說《幻影》。

2月28日（3月11日），抵巴登—巴登。

與赫爾岑絕交，因赫爾岑在《警鐘》上發表文章反對屠格涅夫對沙皇的態度。

4月，《聖彼得堡新聞報》第89號刊載屠格涅夫的文章《論莎士比亞》。

1865年 48歲 1月—5月，住在巴登—巴登，曾去巴黎參加女兒的婚禮。

5月19日（31日），自巴登—巴登回國。

7月，屠格涅夫以散文形勢所譯萊蒙托夫的《童僧》法文版在巴黎出版。

7月6日（18日），去德國巴登—巴登。

11月—12月，寫作長篇小說《煙》。

- 1866年 49歲 全年僑居巴登—巴登，繼續寫作長篇小說《煙》。剛察洛夫專程去巴登—巴登拜訪屠格涅夫。
- 1867年 50歲 3月，屠格涅夫與皮沙烈夫開始交往。
- 4月，《俄羅斯導報》第3期刊載長篇小說《煙》。
- 5月5日（17日），給赫爾岑寄去一本《煙》。並建議恢復通信關係。不久收到赫爾岑同意和解的回信。
- 6月28日（7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訪屠格涅夫，二人發生爭吵。
- 11月，《煙》第一次出版單行本。長篇小說《煙》譯成法文（梅里美主編）。
- 1868年 51歲 1月，《歐洲導報》第1期刊載短篇小說《旅長》。《俄羅斯導報》第1期刊載短篇小說《葉爾古諾夫中尉的故事》（寫於1867年）。
- 1869年 52歲 1月，《俄羅斯導報》第1期刊載短篇小說《不幸的少女》。
- 4月，《歐洲導報》第4期刊載《憶別林斯基》。
- 1870年 53歲 1月，《歐洲導報》第1期刊登短篇小說《奇怪的故事》。抵達巴黎，看望病中的赫爾岑，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會面。
- 10月，《歐洲導報》第10期刊載中篇小說《草原上的李爾王》。撰寫中篇小說《春潮》。
- 1871年 54歲 2月13日（25日），回彼得堡。
- 2月27日（3月11日），在畫家俱樂部出席為義大利加里波的義勇隊募捐的文娛會，會上親自朗讀《總管》。
- 3月22日（4月3日），自彼得堡出國。
- 11月，遷居巴黎。
- 1872年 55歲 1月，《歐洲導報》第1期刊載中篇小說《春潮》。與左拉、都德相識。《村居一月》在莫斯科首次上演。
- 2月，開始撰寫長篇小說《處女地》。
- 9月，屠格涅夫看望喬治·桑。
- 1873年 56歲 全年都在國外，撰寫長篇小說《處女地》。多次與喬治·桑和福樓拜會面。
- 1874年 57歲 3月，《集資》文集（為飢餓者募捐）刊載短篇小說《骨瘦如柴的人》。

4月，《歐洲導報》第4期刊載短篇小說《普寧與巴布林》。開始舉辦“五人聚餐會”（屠格涅夫、福樓拜、龔古爾、左拉和都德）。

5月7日（19日），回彼得堡。

7月20日（8月1日），自彼得堡出國。全年都在撰寫長篇小說《處女地》。

1875年 58歲 9月8日（20日），遷入巴黎近郊布日瓦爾的新居。在國外與皮謝姆斯基、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見面。

1876年 59歲 1月，《歐洲導報》第1期刊登短篇小說《鐘》。

5月24日（6月5日），回彼得堡。

6月6日—7月17日（6月18日—7月29日），住在斯巴斯科耶，繼續寫作長篇小說《處女地》並最後脫稿。

7月25日（8月6日），去法國布日瓦爾。

12月，在巴黎會見莫泊桑。

1877年 60歲 1月，《歐洲導報》第1期刊載長篇小說《處女地》的第一部份。

2月，《歐洲導報》第2期刊載《處女地》的第二部分。

5月22日（6月3日），回彼得堡。

6月初，看望生命垂危的涅克拉索夫。後來屠格涅夫在散文詩中曾描寫過這次會面（《最後的會晤》）

1878年 61歲 在這一年裡寫了多首散文詩（最後幾首寫於1882年）。

5月，托爾斯泰致信屠格涅夫表示和解。

6月，在巴黎召開國際文學大會，屠格涅夫當選為大會副主席。

8月8日—9日（20日—21日），在托爾斯泰的莊園雅斯那雅·波良納作客。

9月9日（21日），抵巴黎。

1879年 62歲 2月—3月，莫斯科、彼得堡舉行大會慶祝屠格涅夫榮獲“俄羅斯語文愛好者協會”榮譽會員稱號。在會上屠格涅夫致答詞並朗讀自己的作品。

3月24日（4月5日），抵巴黎。

6月，牛津大學決定授與屠格涅夫法學博士學位。屠格涅夫赴英並出席授予博士學位儀式。



- 1880年 63歲 4月，赴莫斯科參加紀念普希金委員會會議。
- 6月6日（18日），在莫斯科參加普希金紀念像落成典禮。
- 6月7日（19日），在“俄羅斯語文愛好者協會”的大會上宣讀論文《論普希金》。
- 1881年 64歲 5月31日—8月21日（6月12日—9月2日），最後一次回斯巴斯科耶。托爾斯泰、格里戈羅維奇、薩文娜到斯巴斯科耶看望屠格涅夫。
- 9月1日（13日），抵布日瓦爾。
- 11月，《歐洲導報》第11期刊登短篇小說《愛的凱歌》。
- 1882年 65歲 1月，《歐洲導報》第1期刊登短篇小說《一個無可救藥的人》。
- 3月，屠格涅夫開始患脊椎癌。
- 9月，中篇小說《死後》完稿。
- 12月，《歐洲導報》第12期刊登五十篇《散文詩》。
- 1883年 66歲 1月，《歐洲導報》第1期刊登中篇小說《死後》。
- 6月5日（17日），波琳娜·維亞多根據屠格涅夫口述將隨筆《海上烈火》記錄成文。
- 6月27日（7月9日）前後，給托爾斯泰寫最後一封信，請求他重新從事文學活動。
- 8月，波琳娜·維亞多根據屠格涅夫口述將短篇小說《末日》記錄成文。
- 8月22日（9月3日）下午2時，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與世長辭。
- 9月19日（10月1日），根據屠格涅夫的遺囑，他的遺體經巴黎北站運送回國。
- 9月27日（10月9日），在彼得堡沃爾科夫墓地舉行屠格涅夫安葬儀式。

## 參 考 書 目

(依出版年代排列)

### 一、原典

屠格涅夫著《羅亭》，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

屠格涅夫著，江子野譯《貴族之家》，台北：大漢出版社，1980年。

屠格涅夫著，江子野譯《獵人日記》，台北：大漢出版社，1980年。

屠格涅夫著，江子野譯《羅亭》，台北：大漢出版社，1980年。

屠格涅夫著，耿濟之譯：《獵人筆記》，台灣：漢風出版社，1991年。

屠格涅夫著，磊然譯：《羅亭 貴族之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萊蒙托夫著，翟松年譯：《當代英雄》，台北：光復出版社，2001年。

普希金著，盧永編選：《普希金小說戲劇選》，台北：光復出版社，2001年。

屠格涅夫著，石國雄譯：《羅亭》，台北：臉譜出版，2002年。

### 二、專書

彼得羅夫著，張耳譯：《屠格涅夫》，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

屠格涅夫：《世界文學名著鑑賞》，台北：黎明出版社，1972年。

史朗寧著，張伯權譯：《俄羅斯文學史》，台灣：楓城出版社，1975年。

林致平譯：《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代表作》，台北：五洲出版社，1976年。

侯立朝：《現代蘇俄文學論》，台灣：楓城出版社，1977年。

許仁圖：《屠格涅夫》，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

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全集》，台北：龍記出版社，1981年。

普斯托沃依特著，韓凌譯：《屠格涅夫評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吳宗蕙：《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高文風編譯：《屠格涅夫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李衍柱，朱恩彬主編：《文學理論簡明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
- Isaiah Berlin 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
-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
- 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 李兆林，葉乃方編：《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 馬家駿：《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孫乃修：《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
- 曹靖華主編：《俄蘇文學史》，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台北：書林出版社，1993年。
- 普希金著，鄭清文譯：《永恆的戀人：尤金·奧尼金》，台北：志文書局，1993年。
- 普希金著，馮春等譯：《普希金詩選》，台北：桂冠書局，1994年。
- 徐稚芳編著：《俄羅斯文學中的女性》，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羅 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趙 威：《俄羅斯史綱要》，台北：明文書局，1995年。
-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
- 鄭體武編：《普希金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
- 普希金著，盧永譯：《普希金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顧蘊樸主編：《萊蒙托夫全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逢塵瑩：《法國文學面面觀》，台灣：志一出版社，1997年。
- 李明濱：《俄國近現代文學經典》，台灣：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
- 劉 寧：《俄國文學批評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
- 韓 秀：《俄羅斯的大橡樹：小說天才屠格涅夫》，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
- 亨利·特羅亞著，張文英譯：《世界文豪屠格涅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
- 鄭錚譯：《普希金抒情詩選》，香港：文學報社出版，2000年。

編寫組編著：《戈寶權紀念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李明濱：《俄羅斯文化史》，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2年。

李明濱：《世界文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顧蘊璞：《萊蒙托夫》，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俄語語言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蕭素卿：《論《戰爭與和平》主題思想》，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

申丹 秦海鷹主編：《歐美文學論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

### 三、論文

余敏玲：《十九世紀俄國知識份子的覺醒—別林斯基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1年。

張淑伶：《魯迅小說受俄國文學影響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

涂玉萍：《巴金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秀珍：《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份子對中國文明的評價》，台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2年。

蕭國貞：《論《安娜·卡列妮那》的家庭主題思想》，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3年。

謝季君：《《安娜·卡列妮那》女性形象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3年。

### 四、期刊論文

- 朱憲生：〈屠格涅夫筆下的兩類女性〉，《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80年。
- 朱金順：〈巴金和屠格涅夫〉，《社會科學》第6期，1981年。
- 未名：〈屠格涅夫長篇小說中的幾個婦女形象〉，《文科教學》第4期，1981年。
- 莫泊桑，張靜雲譯：〈屠格涅夫與法國〉，《春風譯叢》第2期，1981年。
- 莫泊桑，張靜雲譯：〈莫泊桑論屠格涅夫〉，《春風譯叢》第2期，1981年。
- 羅嶺：〈屠格涅夫的《羅亭》〉，《名作欣賞》第4期，1982年。
- 羅嶺：〈屠格涅夫的《漢尼巴誓言》〉，《藝譚》第1期，1982年。
- 王文生：〈讀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藝譚》第1期，1982年。
- 趙秋長譯：〈屠格涅夫談自己的小說〉，《俄蘇文學》第5期，1983年。
- 沈渝來譯：〈屠格涅夫大事年表（1818年—1883年）〉，《俄蘇文學》第5期，1983年。
- 張鴻楨編：〈屠格涅夫年表（1818年—1883年）〉，《河北大學學報》第1期，1983年。
- 歐品聖：〈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5期，1983年。
- 陀斯妥耶夫斯基著，周上之譯：〈談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文藝理論研究》第2期，1983年。
- 智量：〈論屠格涅夫思想的兩個主要方面〉，《文藝理論研究》第1期，1983年。
- 普斯托沃伊特著，江文琦譯：〈現階段屠格涅夫作品的研究〉，《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報》第6期，1983年。
- 李兆林：〈蘇聯的屠格涅夫研究近況〉，《蘇聯文學》第五期，1983年。
- 杭夢寧：〈眉宇間留著一條深深的皺紋——紀念屠格涅夫逝世100週年〉，《環球》第7期，1983年。
- 斯洛尼姆，戴耘譯：〈論屠格涅夫的創作個性〉，《文藝理論研究》第2期，1983年。

- 葉乃方、陸力媛：〈屠格涅夫作品的思想性〉，《天津社會科學》第6期，1983年。
- 陳元愷：〈屠格涅夫與中國作家〉，《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83年。
- 李 路：〈“多餘人”的精神個性〉，《青年文摘》第8期，1984年。
- 陳大夫：〈又偉大，又孱弱——從《貴族之家》看屠格涅夫世界觀的矛盾〉，《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4年。
- 陸肇明：〈試論屠格涅夫筆下少女形象的理想化〉，《蘇州大學學報》第1期，1984年。
- 谷慶軍：〈屠格涅夫給小說人物寫日記(作家小故事)〉，《山東文學》第2期，1985年。
- 陸人豪：〈論屠格涅夫創作中的客觀態度〉，《蘇州大學學報》第1期，1985年。
- 繆軍榮：〈屠格涅夫和郁達夫的“多餘人”比較研究〉，《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第3期，1985年。
- 孫鑫亭：〈屠格涅夫筆下少女形象〉，《殷都學刊》第4期，1985年。
- 陳大夫：〈屠格涅夫小說的新意〉，《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1985年。
- 張玲霞：〈俄羅斯女性與多餘人〉，《外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86年。
- 孫乃修：〈巴金與屠格涅夫〉，《外國文學》第11期，1986年。
- 郭宏安：〈多餘人抑或理性的人——談談加繆的《局外人》〉，《外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86年。
- 郭雪六：〈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7期，1986年。
- 春 生：〈屠格涅夫在中國〉，《俄蘇文學》第5期，1986年。
- 張蘭芬：〈多餘人的愛情悲劇〉，《俄蘇文學》第5期，1987年。
- 孫慶紅：〈談“多餘人”的性格矛盾〉，《中文自學指導》第12期，1987年。
- 盧兆泉：〈浮現作家自我的一種色素——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反諷藝術〉，《外國文學評論》第3期，1988年。
- 劉念群：〈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多餘人——《羅亭》與《沉淪》之比較〉，《貴州師

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8年。

張洪榛：〈屠格涅夫是俄國六十年代的啓蒙者〉，《河北大學學報》第2期，1988年

林亞光：〈不同凡響的柔情曲(關於屠格涅夫的《初戀》)〉，《外國文學研究》第6期，1988年。

王曉春：〈殘酷時代裡的悲劇——評俄羅斯文學中的四代多餘人〉，《外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90年。

劉道泉：〈論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的戲劇化特徵〉，《許昌師專學報》第2期，1990年。

岸波：〈屠格涅夫小說的獨創性〉，《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1990年。

陳恭懷：〈試談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8期，1991年。

朱憲生：〈屠格涅夫的美學思想初探〉，《外國文學研究》第3期，1991年。

于勝民：〈俄國多餘人與文化衝突〉，《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92年。

周新建：〈試論屠格涅夫、鬱達夫、巴金早期小說中的「多餘人」形象〉，《外國文學研究》第9期，1992年。

張承菊：〈世紀兒·多餘人·零餘者〉，《外國文學研究》第8期，1994年。

吳嘉祐：〈試論屠格涅夫的悲觀主義〉，《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1994年。

蔡偉清：〈近十年我國關於屠格涅夫研究的新發展〉，《汕頭大學學報》第10卷第4期，1994年。

李子遲：〈淺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幾位多餘人形象〉，《湘潭大學學報》增刊，1998年。

劉久明：〈郁達夫與屠格涅夫〉，《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2000年。

葉笛：〈中外小說上「多餘的人」系譜之探索——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和《羅亭》《貴族之家》《奧勃洛莫夫》《浮雲》的比較〉，《文學台灣》33卷，2000年。

郭秀媛：〈俄國多餘人二重性格成因探〉，《岱宗學刊》第2期，2000年。

- 馬小朝：〈《局外人》：存在主義哲學意蘊的詩性彰顯〉，《山東師大學報》第5期，2000年。
- 潘一禾：〈一代人的肖像——看《當代英雄》中的不多餘的人〉，《浙江學刊》第5期，2000年。
- 郭秀媛：〈再論多餘人〉，《河北大學學報》第25卷第5期，2000年10月。
- 王蕊：〈多餘人的悲劇成因及其社會意義〉，《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4期，2000年7月。
- 王立業：〈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比較〉，《國外文學》第3期，2001年。
- 曹學英：〈淺談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形象〉，《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第17卷，2001年。
- 董文波：〈多餘人與零余者〉，《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期，2001年。
- 丁國強：〈郁達夫與屠格涅夫筆下多餘人形象之比較〉，《湖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2期，2001年4月。
- 默語：〈優美而哀傷的歌——兼論屠格涅夫小說中的愛情主題〉，《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二期，2001年6月。
- 張皎玲：〈奧涅金：一代貴族青年的肖像〉，《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9卷第4期，2001年8月。
- 蔡少薇：〈談《沈淪》中的零余者形象和憂鬱美〉，《孝感學院學報》第21卷第5期，2001年10月。
- 張立群、張蔚里：〈時代的零余者靈與肉的衝突——談郁達夫小說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深層內涵〉，《瀋陽教育學院學報》第3卷第4期，2001年12月。
- 陳鴻：〈迷惘、墮落的英雄——評萊蒙托夫筆下的多餘人形象〉，《南昌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2001年12月。
- 孟顯智：〈生命的空殼 地道的廢物——談《北京人》中的“中國多餘人”〉，《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2001年。



- 張堅強：〈試論屠格涅夫的抒情小說〉，《華東船舶工業學院學報》第1卷第3期，2001年。
- 吳桂華：〈零余者與多餘人——郁達夫和屠格涅夫作品中人物形象比較評析〉，《克山師專學報》第一期，2001年。
- 王福和：〈世紀病患者的心路歷程——從多餘人到局外人〉，《外國文學研究》第2期，2002年。
- 趙舒云，孫彥波：〈多餘人形象的進步意義〉，《貴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2002年。
- 康 澄：〈試析洛特曼對《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第4期，2002年。
- 曹陽，廖祥紅：〈淺析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丹東師專學報》第24卷第1期，2002年3月。
- 賈淑芬：〈俄國十九世紀的知識份子與人民解放運動——論屠格涅夫和他小說的主人公〉，《遼寧大學學報》第30卷第4期，2002年7月。
- 王 湘：〈試析多餘人奧涅金和畢巧林的形象特徵〉，《長春大學學報》第12卷第4期，2002年8月。
- 陳 夢：〈新舊文化交替的悲劇典型——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惠州學院學報》第22卷第5期，2002年10月。
- 傅守祥，應小敏：〈論俄國文學中多餘人形象的演化與內蘊〉，《瀋陽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2002年12月。
- 桑淑鈞：〈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濟南大學學報》第12卷增刊，2002年。
- 李 丹：〈關注生存的小說創作——《吶喊》《徬徨》的另一種闡釋〉，《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4月。